

北京市文物局 主办  
北京燕山出版社

# 北京文博

文丛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北京文博·文丛

二〇一三年第三辑

北京燕山出版社

# 北京文博

文丛



北京市文物局 主办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文博文丛. 2013. 第3辑 / 陈晓苏主编. — 北京 :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3.

ISBN 978-7-5402-3402-7

I. ①北… II. ①陈… III. ①文物工作—北京市—文集

②博物馆—工作—北京市—文集 IV. ①G269.27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86422号

责任编辑: 李 涛

ISBN 978-7-5402-3402-7



北京文博文丛 (2013 \*3)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53号 100054

新华书店经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邮箱)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787×1092 16开本 7.5印张 181千字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 15元

# 北京文博



## 目 录

2013年第3辑 (总73期)

### ● 文物工作

- 高山景行 京都守护神——悼念侯仁之老先生·····北京市文物局 (1)  
创意时代的博物馆文化创意·····于 平 (5)

### ● 博物馆学

- 利用古建筑展厅举办展览的一点思考  
——以北京市古代钱币展览馆为例·····焦晋林 (11)  
谈藏品原始信息的收集——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国礼为例·····王鹏远 (17)

### ● 考古简报

- 北京市大兴区高米店北齐、唐、明、清墓葬发掘简报·····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23)

### ● 文物研究

- 唐故蓟州司仓参军李洪墓志考·····张云燕 (36)  
金《武德将军幢记》相关问题再辨·····王玉亭 (43)  
白塔寺诸天造像名称考辨·····孙 涛 (45)  
明朝川扇进贡宫廷珍品·····刘精义 刘燕平 (60)  
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唐云麾将军李思训碑”拓本浅识·····  
·····韩建识 (63)  
首都博物馆藏《西陂六景诗卷》文物名称辨析·····李文琪 (68)

## ● 北京史地

- 慧思与静琬“师徒”关系考辨……………张爱民 尤 李 (75)
- 《宋辽金元建制城市研究》读后……………于德源 (80)
- 前公用胡同15号调查记——兼谈四合院调查和分析方法……………李卫伟 (84)
- 清末各省捐资修正阳门之始末……………贾若钜 (91)
- 文津街至景山前街沿路古建拆除纪实……………孔庆普 (98)
- 探索建筑文化的力作——《王世仁中国建筑史论选集》读后……………晋宏逵 (102)

## ● 文物保护

- 首都博物馆文物保存环境监控简述……………何海平 (106)

## ● 资料信息

- 北京市文物局2013年二季度文博事业大事记……………尹 君 (111)

## 《北京文博》编辑委员会

顾问：侯仁之 李学勤 吕济民

主任：宿 白 副主任：舒小峰 孔繁峙 廖静文 王世仁 曹子西 齐 心 马希桂

编委会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平 王 丹 王丹江 王玉伟 王有泉 王志平

王 岗 王培伍 王清林 巴爱民 卢迎红 田淑芳 白 岩 吉晓平 向德春 刘建业

刘素凯 刘超英 齐东发 祁庆国 关战修 许立华 许 伟 杨玉莲 杨曙光 李 青

李建平 李 晨 吴志友 吴梦麟 何小平 何 沛 沈其顺 宋大川 张若妮 张树伟

张 展 范 军 赵建明 郝东晨 哈 骏 侯兆年 侯 明 郝志群 姚 安 耿春卫

徐 明 高小龙 高凯军 郭小凌 郭 豹 姬脉利 崔国民 葛英会 谭烈飞 薛 俭

主 编：陈晓苏 执行主编：韩建识 编辑部主任：高智伟

本册责编：韩建识 陈 倩 高智伟

主办单位：北京市文物局 编辑出版：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北京文博》编辑部

北京文博网网址：<http://www.bjmuseumnet.org>

《北京文博》电子邮箱：[bjwb1995@126.com](mailto:bjwb1995@126.com)

#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NO. 3, 2013

## Contents

### ● *CULTURAL RELICS WORK*

Respect Mr. Hou Renzhi as to Look up to High Mountains, He is the Patron Saint of the Capital of Beijing—To Mourn Mr. Hou Renzhi.....  
.....by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1)  
Museum Culture Creation in the Creation Time.....by Yu Ping(5)

### ● *MUSEOLOGY*

Respect on Using the Ancient Architecture Exhibition Hall to Hold the Exhibition—A Case Study of the Elementary Exhibition in Beijing Ancient Money Exhibition Building .....  
.....by Jiao Jinlin(11)  
On the Collection of Original Information of the Collections—A Case Study of the National Presents Collected in the China National Museum.....by Wang Pengyuan(17)

### ● *ARCHAEOLOGICAL REPORT*

Brief Report on Excavation of Tombs of Northern Qi, Ta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Gaomidian,Daxing District, Beijing City.....  
.....by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Research Institute(23)

### ● *CULTURAL RELICS RESEARCH*

Study on the Epitaph of Li Hong,Sicang Canjun of Jizhou of Tang Dynasty...by Zhang Yunyan(36)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Relevant Questions of Records of the Stone Pillar of the General Wude of Jin Dynasty.....by Wang Yuting(43)  
Discussion on the Names of All the Gods Statues in the White Pagoda Temple...by Sun Tao(45)  
Chuan Fan Treasures as Tributes Paid to the Palace in Ming Dynasty.....  
.....by Liu Jingyi,Liu Yanping(60)  
Shallow knowledge of the Inscriptions of the Stele to Li Sixun,General of the Cloud-Like Flags of the Tang Dynasty Collected in the Book and Data Centre of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Cultural Heritage.....by Han Jianshi(63)  
Discrimination of the Cultural Relics Name of *the Xipi Six Sceneries Poetry Volume* Collected in the Capital Museum.....by Li Wenqi(68)

## ●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BEIJING*

- Study on the Mentor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Huisi and Jingwan .....by Zhang Aimin, You Li(75)  
After Reading the Book of Research of *Organizational System City of Song, Liao, Jin and Yuan Dynasties*.....by Yu Deyuan(80)  
Report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No.15 of Qiangongyong Hutong—And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Method of the Courtyard .....by Li Weiwei(84)  
The Whole Story of Zhengyangmen's Repairing Donated by Provinces in Late Qing Dynasty .....by Jia Ruofan(91)  
Documentary of Demolishing the Ancient Architecture along the Road from Wenjin Street to the Jingshan Front Street.....by Kong Qingpu(98)  
Masterpiece of Exploring the Architecture Culture—After Reading the Book of *Anthology of Chinese Architectural History Theory of Wang Shiren* .....by Jin Hongkui(102)

## ● *PROTECTION OF CULTURAL RELICS*

-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Monitoring of Preservation Environment for the Cultural Relics  
.....by He Haiping(106)

## ● *DATA AND INFORMATION*

- Chronicle of Events Concern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of th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Cultural Heritage (2nd Quarter of 2013) .....by Yin Jun(111)

### **EDITORIAL BOARD OF BEIJING WEN BO**

**Advisors:** Hou Renzhi, Li Xueqin, Lv Jimin

**Chairman:** Su Bai

**Vice-chairmen:** Shu Xiaofeng, Kong Fanzhi, Liao Jingwen, Wang Shiren, Cao Zixi, Qi Xin, Ma Xigui

**Members:** Yu Ping, Wang Dan, Wang Danjiang, Wang Yuwei, Wang Youquan, Wang Zhiping, Wang Gang, Wang Peiwu, Wang Qinglin, Ba Aimin, Lu Yinghong, Tian Shufang, Bai Yan, Ji Xiaoping, Xiang Dechun, Liu Jianye, Liu Sukai, Liu Chaoying, Qi Dongfa, Qi Qingguo, Guan Zhanxiu, Xu Lihua, Xu Wei, Ynag Yulian, Yang Shuguang, Li Qing, Li Jianping, Li Chen, Wu Zhiyou, Wu Menglin, He Xiaoping, He Pei, Shen Qishun, Song Dachuan, Zhang Ruoni, Zhang Shuwei, Zhang Zhan, Fan Jun, Zhao Jianming, Hao Dongchen, Ha Jun, Hou Zhaonian, HouMing, Xi Zhiqun, Yao An, Geng Chunwei, Xu Ming, Gao Xiaolong, Gao Kaijun, Guo Xiaoling, Guo Bao, Ji Maili, Cui Guomin, Ge Yinghui, Tan Liefei, Xue Jian

**Editor-in-chief:** Chen Xiaosu

**Executive editor:** Han Jianshi

**Director of the Editorial Office:** Gao Zhiwei

**Managing Editors of this volume:** Han Jianshi, Chen Qian, Gao Zhiwei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Beijing Wen Bo, Book and Data Centr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Cultural Heritage

**URL:** <http://www.bjmuseumnet.org>

**BEIJING WENBO E-mail:** [bjwb1995@126.com](mailto:bjwb1995@126.com)

**编者按：**我国历史地理学巨擘侯仁之先生于2013年10月22日下午在京逝世。侯先生一生成就卓越，把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发展为现代历史地理学，开启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研究先河，开始对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首都规划建设比较研究，率先展开中国世界遗产的保护与申报工作，对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北京的名城保护做出过重大贡献。

自1995年《北京文博》创刊以来，

侯仁之先生一直担任《北京文博》顾问，对《北京文博》杂志的发展给予了关心和支持。为了纪念侯仁之先生对北京名城保护的卓越成就，并表达对侯先生的深切怀念，本刊特约了一篇对侯先生的怀念文章《高山景行 京都守护神——悼念侯仁之老先生》，并刊载侯先生为《北京的城墙和城门》（20世纪80年代翻译出版）一书所作的序言，共同缅怀这位远去的大师。

# 高山景行 京都守护神

—— 悼念侯仁之老先生

北京市文物局

10月22日下午，阴霾天空洒下濛濛细雨，给秋色渐深的京城平添几分寒意；秋风秋雨愁煞人。是的，这一天，侯仁之侯老走了……

一个可敬的老人，走过了一个世纪的沧桑和奋斗，终于要歇一歇了。他生命时钟停在了2013年。这一年，他天享102岁，这一年，正值他倾注半世研究心血、无比热爱的北京城建都860周年。

侯老生命中最后几年曾多次报危，但每次，生



侯仁之先生

命顽强的老人都挺过来了，给热爱、关心他的人们带来了希望和欢欣。但这一次他不再挺了，他似乎要用烛光燃尽的生命之觞，在这有意义的特殊时刻，为他热爱的北京做最后的呼吁、呐喊：关注古都，关注名城保护，关注我们的精神家园！

侯老是学术大家，是有国际影响的地理学家，我们可以一串辉煌的学术成就来铺陈：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84年



被英国利物浦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称号。1999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999年，美国地理学会授予“乔治·戴维森勋章”，这是设立于1946年的国际地理学界权威奖项，侯老是获此殊荣的第六人。2011年，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授予“2011年度研究与探险委员会主席奖”，以表彰他在历史地理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侯老是学者，一生著作等身，研究不倦。他曾担任过多种社会职务。如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地理学会联合会（IGU）及科学历史与哲学国际协会常任委员，全国政协三届至七届委员，北京人大一届至五届代表，兼任燕京研究院院长等等。但侯老生前担任过一个职务却不太为人熟知，这个职务一直伴他去世，就是北京市文物古迹委员会主任委员。众所周知，侯老是研究历史地理的，何以会与文物保护发生关系呢？了解侯老的人都会知道，他担任这个职务，实在是实至名归、深孚众望的，因为侯老对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北京的名城保护做出过重大贡献。

他是“中国申遗”第一人。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侯老功不可没。1984年，侯老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学时，在与同行进行学术交流时，了解并接触到《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他以学者敏锐的洞察力，认识到尽管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还很落后，文物和遗产保护尚未引起广泛的重视，但保护文物、保护遗址，维护历史的连续性，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加入这个公约刻不容缓。于是，侯老回国后联合罗哲文、郑孝燮、阳含熙等几位老先生给全国政协写提案，提出中国要尽快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从此，中国才开始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和遗产项目的申报。

侯老不仅呼吁，还身体力行积极推动中国遗产保护工作。

1984年，为了推动长城的保护，在“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社会赞助活动中，

侯老不仅以夫妻名义捐款赞助，而且争取了许多专家学者大力支持，形成国家重视、学者支持、社会关注、群众响应的氛围。现在长城早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北京段长城保护取得的成绩与侯老的关注和大力推动是分不开的。

白浮泉是大运河的水源地。侯老听说白浮泉遗址正在整修，喜出望外，特地撰写了《白浮泉遗址整修记》，为今天大运河申遗工作打下基础，为运河遗址的完整保护倾注心血。

如今，中国的遗产申报与遗产保护成绩斐然，这其中就有侯老的开拓之功！

侯老对北京名城保护工作也倾注了大半生的心血，对深爱的北京城，他将自己的历史地理研究与北京城市建设紧密联系，提出了许多深刻、卓识的见解。侯老认为研究一个城市就要深入了解这个城市的起源、城市选择的地理条件及社会因素，进而了解不同时期城市职能的发展、城市形态特点以及供水、排水和交通条件。以此为基点，侯老进一步开展对北京的历史地理的专题研究，从而开拓了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新领域。

在一系列如《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元大都城与明清北京城》、《北京旧城平面设计的改造》、《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等著述里，侯老以自己独特的学术视角，深厚的历史地理学理论揭示了北京城的环境特点、作为帝都的起源、发展，以及鼎盛的地理原因。侯老的这些研究也直接影响了北京市的城市建设。

在北京城市建设中，侯老十分注重运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为北京的名城保护、文物保护提出了前瞻性建议。在北京西客站建设中，侯老多次呼吁要对这个地区进行考古勘探，指出“此区域涉及北京建城、建都的文物古迹很多，如蓟城、蓟丘，城外四坛（天、地、日、月）一个都不知道位置，此地可能涉及月坛”，并不顾八旬高龄、身体虚弱，多次到现场进行调研。

最终在他的呼吁和指导下，取得了金中都建都的珍贵实物材料。

侯老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为实践服务的学术思想和学术实践，使我们了解北京都城的由来，使我们成为名城保护的明白人。考证莲花池的水域位置和面积，确认莲花池是北京城的“生命之源”；发现废弃的引水工程的遗迹，通过鱼藻池的定位分析，准确勾勒出金中都的位置；卢沟桥及宛平城对于金中都的重要意义。这些都是侯老告诉我们的。

1992年，为推进北京文物保护的发展，市政府聘请各方面专家成立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当时真是群贤毕至，有侯仁之、罗哲文、吴良镛、张开济、张鎔、郑孝燮、李准、赵冬日、单士元等。当会议进行到选举主任委员议程时，一位老先生提议道：“不用选了，就请侯老当吧。”与会老专家纷纷响应。侯老用他特有的洪亮声音推辞：“我才疏学浅，不能胜任，谢谢，谢谢大家。还是选能胜任的同志吧，比如吴老（吴良镛）。”吴老连忙摆手，“不行，不行。不是我推辞，还是您最胜任。”这时，罗老的一句话让大家颌首称是：“侯老，您不要推了，我们只是研究一个个建筑，您是研究北京城的，研究北京城历史的！”在大家的一致推举下，侯老同意了：“我比大家年长几岁，这副担子我挑了。这副

担子很重啊，大家一起帮我挑！”

应该说，历史地理学是冷僻学科，侯老也是低调踏实的学者，不显于公众关注的视野内。但在这些正直、学识渊博的老先生心中，他们十分清楚侯老对北京城的贡献，侯老学术研究对北京城的意义，十分敬重侯老的学识、人品，这才有成立大会上众人推选的一幕。

还有一件事要说，20世纪80年代初，侯老为做好北京城墙的保护，将他在国外留学时从伦敦以重金购买的奥斯伍德·喜仁龙先生所著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拿出来，委托人翻译出版，公之于众。并为此书作序：“我们的首都也有保存得比较完整的城墙与城市，同样是工事宏伟的古建筑，显示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力。”虽然现在北京城墙绝大部分已经拆毁，但这本书的图文、照片为我们提供了北京城门、城墙最为翔实的记录，为北京城墙的保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现在，这位北京城的守护者走了。留下他对北京城的卓识远见和无比热爱，也留下了对后进的殷殷期待和沉甸甸的责任！

侯老，您放心，我们将以个体的微薄之力汇聚成群体绵绵不尽的力量，做好我们古老北京城的守卫者！

侯老，走好！

## 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序

远隔重洋，忽得国内来信，欣悉瑞典喜仁龙(Oswald—Siren)教授的旧作《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已经译为中文，即将付印。译事进行之快对我来说，确实有些意外。欣慰之余，一件往事又忽然闪现在我眼前。

那已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我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对当时被称作文化古城的北平，心怀向往，终于在一个初秋的傍

晚，乘火车达到了前门车站（即现在的铁路工人俱乐部）。当我在暮色苍茫中随着拥挤的人群走出车站时，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我眼前。一瞬之间，我好像忽然感受到一种历史的真实。从这时起，一粒饱含生机的种子就埋在了我的心田之中。在相继而来的岁月里，尽管风雨飘摇、甚至狂飙陡起摧屋拔木，但是这粒微小的种子，却一直处于萌芽状态。

直到北平解放了，这历史的古城终于焕发了青春，于是埋藏在我心田中并已开始发芽的这粒种子，也就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中，迅速发育成长起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对北京这座古城的城墙和城门，怀有某种亲切之感，是它启发了我的历史兴趣，把我引进了一座富丽堂皇的科学探讨的殿堂。但是，我对北京这座古城的城墙和城门本身，却没有研究。还是在北平解放的前夕，我偶然在伦敦一家旧书店里发现了喜仁龙教授的这部《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并以重价把它买下来，通夜加以浏览，我才开始意识到这一组古建筑的艺术价值。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对于考察北京城墙与城门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这在我们自己的专家中恐怕也是很少见的。而他自己从实地考察中所激发出来的一种真挚的感情，在字里行间也就充分地流露出来。他高度评价这组历史纪念物，同时也为它的年久失修而伤心。在考察中，他的观测细致、记载不厌其详，这是十分可贵的。当然在记述历代城址的变迁上，由于引证的材料不尽可靠，错误之处也是难免的，但这无损于全书的价值。我个人的看法如此，读者会作出自己的判断，这里也就无需多说什么了。

记得早在50年代初期，当首都的城市建设正在加速进行的时候，城墙存废的问题也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时梁思成教授就曾提出过改造旧城墙的一种设想：考虑把宽阔的城墙顶部开辟为登高游憩的地方，同时把墙外的护城河加以修砌，注以清流，两岸进行绿化，这样就无异于在北京旧城的周围，形成一个具有极大特色的环城公园，犹如一条美丽的项链，璀璨有光（其部分设想，有专文发表，并有附图，可惜不在手下，据所记忆，大体如此）。我认为这一设想，是符合“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原则的。其后，我也曾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上，就北京城墙的存废问题，提出了一些个人的看法。我认为我国有一条“万里长城”，被公认为世界“奇观”

之一；我们的首都也有保存得比较完整的城墙与城门，同样是工事宏伟的古建筑，显示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力。因此，我还以喜仁龙教授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为例，借以说明它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现在，事隔三十多年，北京的城墙早已拆除。今天幸而保留下来的正阳门内外城楼、德胜门箭楼以及东南城角楼，经过重修之后，也还是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保存了一点极为鲜明的历史色彩！同时这也足以说明只要认真贯彻“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历史上一切劳动人民心血的创造，都应该在社会主义的新时代重放光辉。请看：就是深埋在地下两千多年且已受到破坏的秦始皇陵的兵马俑，不是经过发掘清理和重新修整之后，也已经成为轰动世界的一大艺术宝藏了吗？可惜的是北京旧日的城墙与城门，除去上述几例之外，都已荡然无存（内城西南角尚有一点残迹，有待考虑如何处理）。因此，主要是在实地考察下写成的这部《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就格外值得珍视了。把它译为中文，如果说在实物存在的当年，并非十分必要，可是在今天，却有了它的重要意义。它为我们提供了在所有的有关资料中最为翔实的记录，有文、有图、有照片，还有作者个人在实际踏勘中的体会和感受。作为一个异邦学者，如此景仰中国的历史文物，仅这一点也是足以发人深省的。不过作者并不是单纯地凭吊过去，他也确实希望这一重要的历史纪念物有朝一日能够得到保护和维修。现在这样一个时期已经真正到来，可是旧的城墙和城门除个别者外，都已不复存在，这就是令人惋惜不置的了。但愿这类情况今后不再发生。只有这样，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在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才能得到进一步地发扬和光大！

侯仁之

一九八四年五月十日写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

# 创意时代的博物馆文化创意

于平

## 一、新时期博物馆发展的背景分析

2013年10月12日，刘延东副总理在山东调研时指出：“繁荣文化事业，振兴文化产业，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服务中国梦。”博物馆是文化事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国家的重要文化设施，也是文博工作的重要着力点之一。

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博物馆应该充分利用馆藏文物资源，充分释放自身研究成果，充分吸纳社会文创力量，有效开发文物价值，设计、制造文化产品（包括视觉的、体验的、阅读的、生活消费的），从而引领文化消费，跻身高端文化产业，更好地服务大众，使文化得到广泛传播与传承。

### （一）硬件建设基本完成

截至目前，全国博物馆总数已超过4000个，平均每40万人拥有一个博物馆，并且还在以每年100个左右的速度增长。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近年来，各地博物馆大力发展硬件设施建设，改善参观环境，增添现代化设施，使博物馆在硬件上基本实现现代化。

### （二）博物馆发展迈向新阶段

2008年，中央四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



博物馆的发展迎来黄金时期。2008—2011年，全国1804座免费开放博物馆在做好基本陈列的同时，累计举办临时展览33452个，每馆年均举办临时展览4.64个，尤其是省级以上博物馆，年均办展数更是高达13.09个，其中许多展览是通过馆际合作

或与考古及文物收藏机构合作举办，这为博物馆发展迈向新阶段提供了条件：

一是观众数量大幅上升。免费开放以来，全国博物馆年均接待观众4亿人次，每馆比免费开放前平均增长了50%—70%，博物馆人气的增加，提供了在博物馆消费的社会条件。

二是经费得到保障。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单位，门票收入减少部分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运转经费增量部分，由中央财政分别按照东部20%、中部60%、西部80%的比例进行补助，博物馆经费得到了保障，提供了博物馆运营的经济条件。

三是专业人才的储备增加。截至2013年，开设博物馆学专业的高等院校共39家，若按每年每校毕业50人，每年可输出博物馆学本科人才1950人。2011年，首批28家高等院校获得授权，开展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首批培养258名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研究生。如此算来，每年一共输出本科以上博物馆专业人

才 2208 人。虽然目前人才输出数量与我国博物馆数量相比仍存在差距，但博物馆专业的报考热情和招生规模正在逐年递增。本科教育若达到每年每校输出 100 人，则每年可输出 3900 名本科人才，基本满足每个博物馆每年引进一名人才的需求。博物馆专业人才储备的增加，提供了开展学术研究的人力资源条件。

总之，博物馆发展开始迈向由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的发展阶段。

### （三）文化创意产业兴起

文化创意产业，是一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以创造力为核心的新兴产业，强调将一种主体文化或文化因素，依靠个人或团队通过技术、创意和产业化的方式，开发、营销为知识产权的行业。

文化创意产业是 21 世纪世界发展最典型的时代特征，各种优秀的文化产品与具有创新意识的高新技术层出不穷，3D、4D 显示、触控等高新技术已经从昔日的神坛之上走到我们的生活之中，应用在手机、电视、电影、电脑、交通、医疗、金融等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生活中最常见和最常使用的日常用品和文化消费品，甚至有些文化产品已经须臾不可或缺。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但方便了公众的生活，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同时也提高着公众对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提高了公众对公共服务设施、尤其是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文化服务机构文化含量和质量的要求。

中国悠久的历史孕育了独特而丰富的文化资源，博物馆是保藏文物的重要机构，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然而，任何文化遗产或资源，并不能天然地成为当今人们享用或消费的产品或商品，只有经过一定形式的再创造，才能成为具有丰厚知识产权的文化产品。因此，博物馆还必须要积极开展文化产品的研发、设计和市场推广。这就对博物馆提出新的职能要求。

目前，我国博物馆发展已进入转型期，作为文化产品的产出地之一，博物馆发展

不能单纯追求数量，更要关注它的运营、发挥它的特有功能。

## 二、博物馆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从数量上看，中国已经逐渐跻身于世界博物馆大国之列。但是，从博物馆功能的发挥和对文化产业的贡献率上看，与国际先进水平之间还有不少差距。在面对这些对文化理解认知日益加深、科学文化素质越来越高、对文化生活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的参观者的时候，我们的博物馆如果还是以传统的展馆、展柜、说明牌的“三合一”的平面的、传统的、呆板的方式进行展览，摆出阳春白雪、高高在上的姿态，公众还会走进博物馆吗？答案一定是否定的。在文化产业方兴未艾的大背景下，我国博物馆还存在不少问题，如：博物馆学术研究成果与社会契合度不高，对社会公众文化需求的研究薄弱，文物资源利用的方式、方法单一，局限于出版物、陈旧的展览形式等。

在博物馆文化产品的研发、设计、制作、营销方面，行业内部还不能够主动借助社会机构或人才进行文物价值开发与产品制造，市场化程度低。这些问题，说明博物馆的文化创意产业参与度较低。

由此导致的结果，从社会效益角度看，博物馆蕴含的巨大文化资源未得到有效开发，未产生较大社会效益。从经济效益角度看，博物馆文化产业经营运行不畅，一些博物馆还在“捧着金饭碗要饭吃”，未形成良性循环。由此进一步导致博物馆难以聚拢社会人才，难以开展大型项目。与文化、旅游、教育等其他行业相比，博物馆社会影响力明显微弱得多，存在较大差距。

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博物馆机构的观念陈旧、封闭。近些年，博物馆过于重视硬件建设，重视文物的学术研究，忽视了当下公众文化需求和引导文化消费的研究。

而在运营方面，博物馆机构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不足，思想观念保守陈旧，缺乏现代经营理念，缺少运用市场手段经营博物馆的概念，不善于利用文物资源、科研成果和社会资源开发文物价值，设计文化产品。导致博物馆很少与其他行业合作，博物馆文化产品（包括视觉的、体验的、阅读的、生活消费的）单调乏味，以至于博物馆还是游离于文化创意产业的边缘，难以形成独具特色和规模化发展。

### 三、有益的探索

博物馆现在不是缺观众，缺的是观众想要体验和消费的好产品。聚集社会资源，开展“跨业、跨界、跨域”的合作，形成专业化、高水平的独具特色的博物馆文创产业业态，将是我们必须积极探索的新课题。

社会资源包括社会智力资源和社会资金资源。以北京为例，在社会智力资源方面，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拥有的众多高校提供了社会智力资源的储备。同时，与博物馆相关的其他文化产业发展繁荣，如传媒、设计、艺术、高新技术等等，为博物馆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在政策导向与资金方面，市政府大力扶持文化产业发展，从2012年起，北京市政府设立了每年100个亿的文化发展专项资金。同时，北京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社会资本充足。

由此可知，北京有条件聚集社会资源进行文物资源的价值开发，创造、生产博物馆独特的文化产品。在传播、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促进博物馆对展览设计、制造工艺、高新技术、新材料应用、文化娱乐消费等相关行业的拉动作用，带动相关行业的提升，使博物馆真正成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推动博物馆事业可持续发展。

近些年来，北京地区的博物馆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以下举三个例子：

#### 1. 恭王府

恭王府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北京现存的清代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曾先后作为和珅、永璘的宅邸。1851年恭亲王奕訢成为宅子的主人，恭王府的名称也因此得来。恭王府历经了清王朝由鼎盛至衰亡的历史进程，承载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故有“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的说法。清室覆亡后，府邸的产权曾归属辅仁大学，20世纪90年代，恭王府花园对外开放，2008年恭王府完成府邸修缮工程后，作为文化部直属事业单位全面对外开放。



恭王府在发展过程中，首先立足于学术研究，挖掘自身的文化内涵。2010年起，恭王府出版了《清代王府文献资料汇编》共300卷。同时，成立王府文化学术委员会，树起王府文化研究大旗。在专家的指导下，主动征集历史老照片和清光绪恭亲王自刊《萃锦吟》等一批填补空白的王府历史文献资料。向实现建设中国王府文化的研究中心、收藏中心、展示中心的目标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充分研究自身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恭王府在学术成果转化方面做出

了尝试。2008年恭王府全面对外开放后，发掘了自身的“福文化”内涵，并据此开发了具有恭王府特色的旅游纪念品，迄今已逐渐形成完善的产品开发和销售体系。

“福文化”来源于恭王府秘云洞内珍藏的一块号称“天下第一福源”的福字石碑。这块碑已有近400年历史，为康熙御笔。是康熙为祖母孝庄太后“请福续寿”所题，一直是大清国宝，珍藏于紫禁城内。

康熙十二年（1673年），孝庄太后六十大寿将至，不料突染重疾，太医束手无策。百般无奈之时，康熙查知上古有“承帝事”请福续寿之说，意思是真命天子是万福万寿之人，可以向天父为自己“请福续寿”，遂决定为祖母请福。沐浴斋戒三日后，一气呵成了这幅倾注了对祖母挚爱的“福”字，并加盖了“康熙御笔之宝”印玺，取意“鸿运当头、福星高照，镇天下所有妖邪”。孝庄太后自得到了这“福”字，百病全消，15年后，在75岁高龄时得以善终。民间俱称这是康熙“请福续寿”带来的福缘。事后康熙几番重提御笔，却再也写不出其中的神韵，所以民间盛传此福为“天赐鸿福”。乾隆时期，此碑神秘失踪。

1962年，周恩来总理批示重修恭王府，考古人员在王府后花园的秘云洞内意外地发现了失踪的福字碑。总理得知后欣然将其命名为“中华第一福”，又称“天下第一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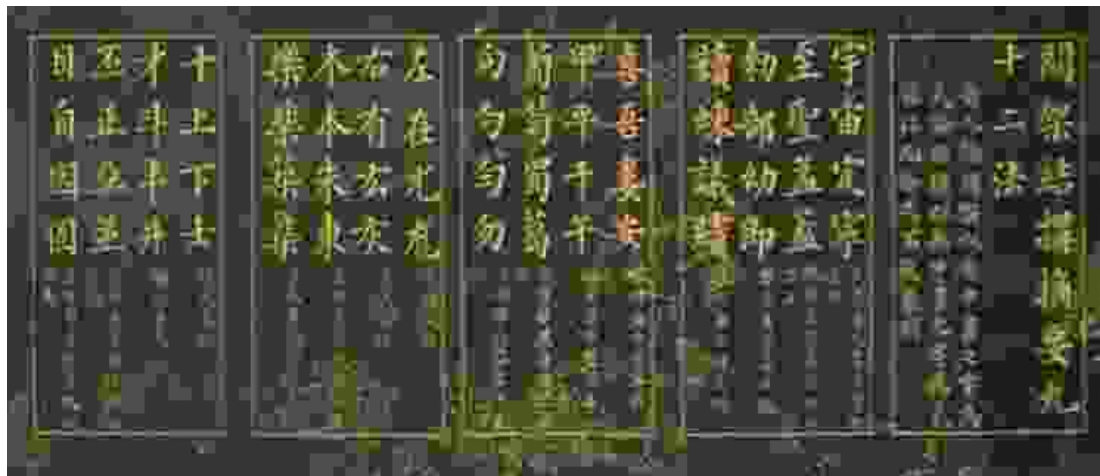
一福”。如今，每天来恭王府里请福的人络绎不绝，人人都想亲手摸一下这公认为“天下第一灵验”的福字，好“沾一沾福气”。

恭王府管理中心据此开发了一系列“福文化”纪念品，包括书画作品、明信片、贺卡、扑克牌、折扇等纸质产品，钥匙链、挂件、项链、手链、戒指等配饰，各种材质的摆件，杯、盘、碗、碟等日常陶瓷器等等，让游客能够将“福文化”带出恭王府，带到世界各地，大大扩展了“福文化”的传播广度，产生的社会效益不可估算。

此外，恭王府还举办了“百福具臻——百位名家写百福”、新春“福”文化周等文化活动，配合民俗演出加强与游客的互动，亮出了恭王府以“福”文化为核心的民俗牌。凭借高度的文化自觉、独特的文化创新，恭王府开创了文化发展的新模式，吸引了大量游客和观众，年接待游客约300万人次，每年上缴各项税款1000余万元。直接创造400余个就业岗位，并为什刹海地区创造1000余个就业机会，带动了周围产业的发展，基本实现了以事业带动产业发展，以产业促进事业繁荣的工作思路。

## 2.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建于1987年10月，位于真觉寺（俗称五塔寺）内，占地近2万平方米，是一座以收藏展示北京地区石刻石雕文物为主的专题性博物馆，收



藏的石刻以大型、人文内涵丰富为主，其种类包括：各类碑碣、书法刻帖、墓志、经幢、圆雕石刻等 2600 多件。该博物馆在北京的博物馆中规模较小，与全国同类型博物馆（如西安碑林博物馆、曲阜孔林等）相比藏品数量也不多。然而，博物馆立足于学术研究，深入挖掘每件藏品的历史价值，发掘自身的优势与特色，即藏品中有关明清帝王及皇亲贵胄的石刻资源。

在此基础上，该博物馆着手于学术成果的转化。首先，开发了拓片这种传统艺术形式。拓片，即把石刻或木刻等雕刻作品上的文字、图案，利用宣纸的特性拓印下来。这种工艺已有近两千年历史，是研究中国书法、历史和艺术的重要方式之一。该馆选择了馆藏的明清石刻“乾隆御笔诗碑”、“朱元璋书《照古腾今》石刻”、“成亲王书《兰亭序》”等精品石刻制作拓片，赢得了书法爱好者的的好评和购藏。同时，博物馆还与学校合作，让中小學生亲身体制作拓片过程，了解这门工艺，也使石刻艺术得以传承。

此后，该博物馆进一步开发了 4 种出版物，即《楷书间架结构摘要九十二章法》、《文徵明书正气歌》、《草书要领》和《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藏墓志精选》，将书法文化和石刻艺术普及到文化爱好者中。同时，博物馆利用拓片的图文图案开发了文房用品，包括收藏级书画用墨和“正气歌文房礼品盒”。收藏墨以馆藏著名石刻拓片为蓝本，制作出雕刻了图案文字的墨块，其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正气歌文房礼品盒”以文徵明书《正气歌》为蓝本，制作出包含《正气歌》册页、端石“正气歌砚”、雕漆印盒、刻铭毛笔、“正气歌松烟墨”的礼盒。

不仅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产品，博物馆还通过积极参与社区、学校以及国内外的文博会、展销会，面向市场主动营销产品，使其文化产品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和认可。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虽为小型博物馆，但其立足于学术研究，深入发掘每件藏品

的文化内涵，把单调生涩的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观众喜爱的文化体验空间和文化产品，真正将藏品的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同时，将无形的知识产权转化为有形的文化产品，使石刻艺术博物馆创新发展与参与社会文化产业发展相得益彰。

### 3. 首都博物馆

首都博物馆是北京地区大型综合性博物馆，藏品以北京地区出土文物和民俗文物为主，在充分研究藏品的基础上，博物馆又吸收北京历史、文物、考古及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借鉴国内外博物馆的成功经验，与社会专业机构密切合作，研发设计、制作出一批独具北京特色的优秀展览和首博特色的文化产品，吸引了众多观众的体验与消费。

2011 年 7 月 31 日，首都博物馆与普罗艺术、美国职业设计师协会等机构共同主办了“龙行天下”设计作品全球征集活动。该活动面向全世界设计师征集“中国龙”的新形象设计，并入选文化部“2011 国家动漫精品工程”。

2012 年 2 月 23 日，首都博物馆推出了以“中国龙”设计作品为主题的“‘龙行天下’设计作品全球征集入围展”，展出了从 3241 件投稿中评选产生的 100 件作品。

此外，展厅中还放置两件特别制作的音乐作品：《龙音》和《龙吟》。《龙吟》为古琴大师李祥霆在国家大剧院录制的九首古琴作品，《龙音》则汇集了采录自九龙壁、龙潭湖公园、九龙山集市、龙爪槐胡同等京城各龙迹处最能代表古都风貌的生活之音。

此次展览将现代设计与传统文物相对应，以一种全新的博物馆展陈方式对中国龙文化进行阐释及传承。

除展览外，首都博物馆还以馆藏文物为元素，与专业的设计企业（台湾汉阁设计）合作，制作出一系列独具创意的文化产品。截至 2010 年，博物馆已开发近 200 种各类文化产品。2010 年，首都博物馆设计制作





博物馆的文创产品发展；二是目前许多相关政策处于空白，委员会将进行大量社会调查研究，为博物馆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和建议。目前，委员会正在利用微博、网站建立资源共享平台。这种共享

的文化创意产品“元青花凤首扁壶系列产品”和“牛头鬲琉璃摆件”，在第二届“清华工美杯”北京博物馆纪念品大赛上分获金奖和银奖。

荣获金奖的“元青花凤首扁壶系列产品”共有6件产品组成，分别为首饰盒、像盒坠、毛衣链、耳坠、钥匙扣、茶垫，图案均来自首都博物馆馆藏器物“元青花凤首扁壶”。其产品无论在色彩、形象、工艺设计、包装等方面，既体现北京传统文化，又与现代工艺、流行时尚紧密结合，达到了传统与现代的统一和谐，获得观众的认同和赞赏。

2013年，博物馆又开发了一系列新产品，邀请设计团队以馆藏的清代绘画《骊山避暑图》为素材，开发出鼠标垫、文件夹、化妆镜、玻璃盘等9种文化产品。此外，还以馆藏文物的文字、图案为元素开发出保温水壶袋、帆布包、手机袋、零钱包、围巾等文化生活产品，深受观众的喜爱，尤其是年轻观众的青睐。同时，首博每举办一个展览，都要同步设计开发衍生文化产品，配合展览作市场推广。每年都有新产品问世，是首博保持文化产业生命力的方式。

近日，中国博物馆协会文创产品专业委员会在京成立，主任委员单位即设在首都博物馆。委员会成立的初衷，一是搭建资源共享平台，扶持博物馆，尤其是中小

包括设计、制作和销售上的共享。比如，各博物馆将本馆藏品中能够代表中华文明精髓、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元素提供出来，由会员单位中的院校师生设计、制作出产品，平台上各个博物馆均可销售。文创产品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博物馆正在打破行业壁垒，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向文化创意产业的中心迈进。

#### 四、结语

经济学的“微笑曲线”理论认为，任何产品要进入价值链的高端，都必会成为和研发设计、市场营销密切关联的文化产业产品，即文化产业是第三产业的核心。

博物馆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优质资源、核心要素和发展动力，博物馆应当成为文化产业的生力军。

博物馆应自觉践行“繁荣文化事业，振兴文化产业，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服务中国梦”的光荣使命。

博物馆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大有可为，在传播优秀文化、提升公民素质、引领文化消费、增强城市竞争力和国家软实力方面将起到积极促进的作用。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

# 利用古建筑展厅举办展览的一点思考

——以北京市古代钱币展览馆为例

焦晋林

将古建筑辟为博物馆对外开放是《文物保护法》所鼓励的一种不可移动文物利用的常见方式。在中国为数众多的博物馆中，以古建筑作为馆舍的不在少数，而为了有效发挥博物馆的展示功能，将古建筑用作展厅举办展览是博物馆人经常要面对的日常课题。从文物保护的角度考量，博物馆在利用古建筑进行展览规划和设计时，只能最大限度地去适应它，最小限度地去干预它。基于此认识，本文以北京市古代钱币展览馆的基本陈列为例，就博物馆展览与古建筑展厅之间的关系和协调问题，略谈一点浅显看法。

## 一、古建筑展厅举办展览的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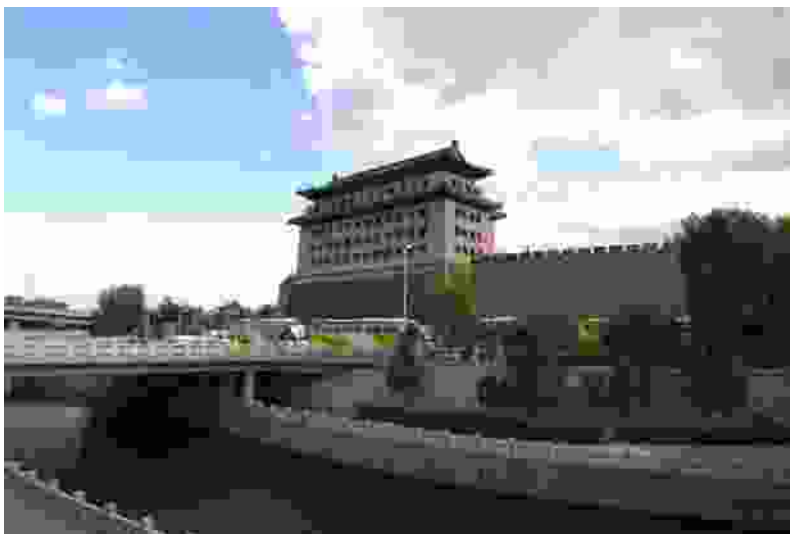
1. 中国古代建筑具有独立的文化价值属性，为展览提供了良好历史文化氛围。

中国古代建筑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史的一部

分，为我们保留和展示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探查中国历史文化的实物资料。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用途的古代建筑，不仅反映了建筑设计、建造、使用时期的工艺技术，而且体现了当时的社会人文面貌，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信息。新石器时代的干栏式建筑和半地下式建筑反映了南北方不同区域先民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生存智慧；殷周城郭建筑的出现体现了早期文明社会卫君保民礼仪观念的萌芽；功能完备的庄园式庭院彰显出重大变革时代的汉魏风度；棋盘式的里坊通衢标榜着盛唐中庸价值观的自信与气度；春明景和的汴梁街市记录了市井工商的历史繁华；元大都高效有序的水利系

系统与城市的完美结合堪称中国城市规划的典范；紫禁城封建礼制与建筑技术的高度融合透射出深不可测的皇权的威严……

可以看出，异彩纷呈的中



图三 德胜门箭楼



图一 德胜门真武庙



图二 “流连方寸间——古代民俗钱币展”展厅

国古建筑史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属性，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多方面，而古建筑所具有的这种文化价值属性是博物馆陈列展览所需要的相应文化背景的有效支撑。在古建筑展厅中举办无论是以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为主题的展览，古建筑的这种浓厚的文化价值属性

都能对展览、对自然环境或人文环境起到良性烘托作用。

明清时期，真武庙在北京地区分布十分广泛，是当时社会市井民生意识形态的一种体现，也是非常贴近人们生活的坛庙建筑。德胜门真武庙作为明清时期德胜门瓮城内建筑的一部分，它所具有的民俗元素提供了浓郁的展览氛围（图一）。在其配殿中设计制作的“流连方寸间——古代民俗钱币展”是北京地区唯一以民俗钱币为主要展品、以展示钱币民俗文化为主题的钱币专题展，而真武庙所营造的历史文化氛围很好地烘托出了民俗韵味，使展览富有亲民色彩，更加贴近观众（图二）。

2. 特定古建筑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是提炼展览主题、完善展览内容的智力源泉。

在我国，依据《文物保护法》对文物的分类规则，古建筑属于不可移动文物的范畴，具有一定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一般来说，

古建筑的文物价值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简要认识，即结构性信息、功能性信息、联系性信息、记录性信息。结构性信息是指古建筑的作法、用材、装饰等外观属性。受长期礼制思想的影响，在中国建筑史上，无论是单体建筑还是群体建筑，都是依照一定的建筑规制设计兴建的。从宋代《营

造法式》到清代《营造则例》，都对建筑的种类、等级、制式、用途、选材等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以此来体现国家建筑领域的等级观念和礼制思想。比如，以中轴对称称为特点的庭院式布局是中庸思想的直接反映，大木结构的不同作法直接体现了建筑的等级和用途，以梁柱为要素的开间组合构成了建筑的基本空间单元。功能性信息是指古建筑的功能和用途。功能和用途是古建筑分类最常用的方法，大致可以分为宫殿建筑、宗教建筑、坛庙建筑、民居建筑、墓室建筑、军事建筑等。不同种类的建筑除了在结构、布局上有所不同外，其所反映的历史现象也明显不同。联系性信息是指与古建筑有关的人和事。建筑既是人建造的，也是人使用的，历史上，有许多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都与建筑有关。比如散布于全国各地的名人故居最具典型性。记录性信息是指古建筑所反映的某一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之间的传承与发展关系。古建筑除了遵循当时的营造規制外，还受当时社会条件的影响。以佛教建筑为例，从汉魏早期以中心柱窟为主要特点的佛教石窟，到隋唐以大佛窟为主要特点的洞窟；从早期庭院式的佛教伽蓝，到后期具有中轴对称布局的佛教寺庙建筑群。这种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承与发展关系，正是佛教开始从域外传入到此后不断汉化的真实写照。

就具体古建筑（古建筑群）来说，上述这些文物信息不一定都能很容易地挖掘出来。但是，在博物馆设计基本陈列或临时展览时，利用这些历史文化信息来确定主题，完善内容，则是其他非古建筑展厅所不具备的优势。“德胜门军事城防文化展”

正是基于对德胜门历史信息的挖掘而提炼主题，并设计完成的。中国是世界上的筑城大国，有着悠久的筑城史。历史上的城市在设计规划时，都遵循了古代都城营造制度的规范，根据自然环境和城市功能的需求，在城垣的营造上体现出不同时期的建造特点。北京作为文明古都之一，在中国城市发展史和古代军事筑城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德胜门箭楼作为明清北京城垣建设历史的实物资料，是中国古代城垣和军事文化的直接历史载体，它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至少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概括：第一，德胜门是明清北京城垣建设的实物遗存，具有时代建筑特征。第二，德胜门是明代北京城军事防御的重点，反映了“天子守国门”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第三，德胜门位于通往居庸关古道的起点，是明清时期北京通往塞外的重要门户，反映了北京地区与外界交流通道的时代变迁。第四，德胜门素有“军门”之称，是古代礼制文化的直观体现。由此可见，箭楼所蕴含的这些历史文化信息，是其他建筑所不具备的，具有独特性。据此，将箭楼展厅中的基本陈列提炼为“军事城防文化展”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图三、图四）。



图四 “德胜门军事城防文化展”序厅

## 二、古建筑展厅形式设计的局限性

任何展览都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展厅作为承载内容和形式的场所，往往需要根据展览要求对展厅进行适当改造。而古建筑作为文物，在保护为主、合理利用的原则下，这种改造往往不能完全按需进行，当展览与建筑发生冲突时，只能要求展览内容和形式做出改变，以服从保护文物建筑的需要。显然，这种局限性在某些方面限制了展览形式的思维拓展空间。

就新建博物馆而言，比较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在其建造之初，就充分考虑了博物馆收藏、研究、展示、服务等多种功能的实现问题。现代化的展厅既具有实用性，还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和拓展性。与新建博物馆不同的是，古建筑并不是根据博物馆功能需求而兴建的，往往是先于博物馆存在的，因此，以古建筑为展厅的博物馆在实现其展示功能时会受到比较大的局限。常见的局限有：第一，开间格局固定。除了如北京西山旭华之阁等极少数无梁结构的古建筑外，绝大多数古建筑展厅都是以开间为单元的梁架结构，不管单体建筑体量有多大，都是由一个个的开间组成的。在古建筑展厅中，柱与柱、梁与梁之间具有相对固定的空间关系，而且其大小也遵循一定的规制，任何在这个古建筑展厅中设计制作的展览，都必须服从、适应于这个开间格局。第二，配套设施缺乏。古建筑展厅与现代建筑相比，其封闭性稍差，缺少除湿、干燥设施和冷热季节温差调节设施，不利于展品的科学保护。并且，各种原始管线的缺乏，不利于各种展示手段的应用。第三，拓展空间受限。由于古建筑本身从一开始就不是为展览而存在的，其面广、进深、层高、采光等条件基本上是固定的，在有限的空间和设施条件下，对展览空间进行创造性拓展的余地非常小。

## 三、古建筑展厅形式设计的文物保护原则

如上所述，与专业的博物馆展厅相比，古建筑展厅存在着一些不适宜举办文物展览的局限，当在这些展厅设计制作文物类展览时，需要对古建筑进行再设计。笔者认为，在对古建筑展厅进行再设计时，保护文物安全始终是首要任务和前提。保护文物既包括对作为展品的文物的保护，也包括对作为展览场所的古建筑的保护；既包括对单体古建筑的保护，也包括对群体古建筑的保护。这里以“中华货币四千年”展览为例加以介绍。

中国古代钱币从质地上区分，有铜、铁、银、金、铅、纸、皮、布、泥等多种，其中又以铜质、纸质为多，在自然条件下很容易受到化学损伤。为了将展厅文物的化学损伤降低到最低限度，在“中华货币四千年”展览设计制作中对其进行了综合考虑和把握。首先，除了对展柜提出密封性要求外，还对古建筑展厅的密封性进行了完善。在不改变古建筑整体风貌的前提下，通过对门窗、斗拱、挑檐等古建筑结构之间缝隙的密封处理，提高展厅的密封性。其次，为了满足在相对密闭条件下展厅文物对微环境的要求，增加了空调、加湿器、除湿机等展厅温湿度监测、控制设备，并结合人工辅助，对展厅空气环境进行监测和控制。最后，不同的展厅光照设计理念，对自然光源和人工光源有着不同的认识，而无论采用何种设计理念，有利于文物保护始终是首要遵循的原则。古建筑展厅往往透光性好，充足的自然光源既给展览带来了便利，也对文物保护提出了挑战，尤其对于纸质文物更是如此。展览中除大量使用人工冷光源外，也对自然光进行了过滤和利用。在充分展示文物特点的同时，也降低了光线对文物的损害程度。

展厅与库房相比，其展出的文物更容易受到物理损伤。近年来，因展具和展品摆放位置等原因导致的文物损毁事故时有

报道。在“中华货币四千年”展览中，展具的选择使用了橱窗式通柜与密闭式独立柜相结合的方式，展柜内部进深不大，结合全景式开启模式，有利于展品的摆放和更换。在与门窗相临近的展柜处理上，均设置了40厘米的间隔，以防门窗这一薄弱环节对展品安全造成威胁。同时，根据相关国家标准，在古建筑展厅采用了红外线报警、监控、消防报警等技术防范措施，并根据古建筑特点，选用适当设备，合理布局线路和终端（图五）。

#### 四、古建筑展厅形式设计的拓展

对古建筑以保护为主，不等于完全被动地接受和无原则地适应。博物馆可以通过对古建筑历史文化信息的挖掘在内容设计中加以利用，同样，在形式设计中，基于对古建筑本身所具有的艺术性和美学属性的理解，也可以对古建筑进行适当干预和变通，以使展览形式得到必要拓展。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应当以对古建筑的干预具有可逆性为基本原则。在“中华货币四千年”基本陈列中，即充分利用了古建筑的艺术、美学特点，对陈列形式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

首先，强调单体建筑与建筑群相互之



图五 “中华货币四千年”展厅

间的关系，增强展览的整体性。“中华货币四千年”的陈列区域位于真武庙中轴线的核心位置，在空间布局上，由正殿、东西配殿共三个独立建筑组成。为了使三个展厅之间在展览上既有侧重又互为补充，设计中通过借景手法，将两个配殿的序厅视角向外拓展，使观众即使站在院子里，也能清晰了解到三个展厅的展览基调，进而分辨出不同展厅之间的主次关系。其次，对展线长度、走向、参观路线优化设计，提高展线的信息容纳量。三个展厅建筑面积不足500平方米，共有约1800件藏品需要得到展示。为了不使观众感到展览有堆砌感，展线设计摒弃了更容易突出展览重点的岛式、放射式展线布局，而将其设置为环形布局，并将三个展厅的展线统一为顺时针走向，强化展厅之间的整体性。为了增加展品容纳量，在展柜设计上创新了通柜与独立柜高低结合的展览模式，在减少空间占用的前提下，使展品和辅助展品层次分明、错落有致，重点突出。不仅如此，在展线中还适度设置了多媒体、钱币拓片等观众动手参与项目，以达到进一步拓展展览内容的目的。第三，突出古建筑的文化元素，营造与展览主题相协调的展览氛围。古货币与古建筑都是历史进程的见证，将古建筑的红色梁柱、原木色顶棚与展柜在体量大小、材料选用以及色彩搭配上相

融合，不仅使整个建筑成为了展览形式的一部分，而且也有利于观众对整体展览信息的把握。比如，在“民俗钱”展线中，通过大面积使用红色、黄色、绿色元素，与古建筑色彩组成了相互呼应关系，进一步烘托了具有浓郁民俗气息的展览氛围（图六）。第四，针对古建筑进深浅、空间小的特



图六 展厅中的民俗文化元素



图七 纪念品服务区域

点，通过利用景深画、划分不同空间功能等方式，在消除因空间狭小给观众带来的压抑感的同时，丰富了展览手段，调动了观众的好奇心，提高了观众的参与度。比如，在观众纪念品服务区域，仿照近代典型钱庄样式，营造出古代金融业的交易氛围，使观众在充满好奇的求知欲中释放自己的纪念品需求（图七）。最后，在展具和辅助展品的选材上，尽量选用了环保、可逆性原材料。在管线的走向和设备布局上，秉承最小限度干扰古建筑的理念，有序布局，集中调控，既满足了展览需求，又不

破坏古建筑群的整体感观效果。

总之，古建筑自身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不仅使这些古建筑展厅一开始就具有了作为展品的天然属性，而且为博物馆的展览提供了无以替代的文化背景支持。尽管这种文化背景不一定与每一个展览相匹配，但是，正是这种文化背景的存在，才为博物馆的展览提供了展览内容与形式选择的引导元素和设计灵感。另一方面，将古建筑用作博物馆展厅，其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

的，这也对博物馆展览工作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可以说，北京市古代钱币展览馆的基本陈列，既是在古建筑展厅中举办不同内容、不同风格展览的尝试，也是兼顾文博工作中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原则之间寻求平衡的有益实践。

（作者为北京市古代钱币展览馆副研究员）

# 谈藏品原始信息的收集

——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国礼为例

王鹏远

藏品是博物馆业务活动的物质基础，诸如陈列展览、学术研究、编辑出版等所有社会教育和服务，都离不开藏品。可以说，藏品研究是博物馆的根本问题之一，而藏品原始信息的收集则是藏品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在原国际友谊博物馆整体划归国家博物馆的背景下，笔者拟就国礼藏品原始信息的重要性、存在的问题以及应对办法，进行粗略的论述。对于国家博物馆而言，如何保证国礼藏品原始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既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是今后需要面对的新课题。

## 一、国礼收藏概况

这里所说的“国礼”，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政府机构以及社会团体接受的外交礼品。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际交往的不断扩大，外交礼品也日益增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向十分重视这些国家之间友好交往的见证物。周恩来总理一度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局收存保管。后来，转交给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保管。早在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曾指示有关部门将外交礼品送到故宫博物院保存。60、70年代之交，外交部礼宾司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南门接待厅举办了新中国第一次外交礼品展览，后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展品全部转交给故宫博物院保管，并由故宫对展品进行调整后，专门辟出场地继续展出。

1981年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成立国际友谊博物馆筹备处，负责重要国际礼品的调查、征集、保藏和研究工作。截至1991年底国际友谊博物馆正式建馆，共收藏有来自世界五大洲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的礼品16000多件，大致分为30余类、上百个品种。这些礼品基本上是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等相关部门移交而来，还有少部分是从故宫博物院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以借用方式入藏的。由于诸多原因，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国际交往中接受的礼品并没有交由国际友谊博物馆收藏，仍由一些相关单位分别收藏。2011年，为了加强对国礼的统一管理，有关部门将其所收藏的国礼移交给了国家博物馆。2012年初，国际友谊博物馆也整体划归国博，其近2万件国际礼品也已移交国博收藏。

这些来自世界五大洲的国礼异彩纷呈，反映了世界各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具有深刻的政治内涵，是当代中





美国瓷塑《天鹅》(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赠毛泽东主席)

外友好往来的实物见证,其中蕴含着丰富、深刻的历史信息。如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2月赠送给毛泽东主席的瓷塑《天鹅》、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1982年9月赠送给邓小平的签署《中英联合声明》纪念银盘等。这些国礼,对于研究当代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英关系以及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进程,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与此同时,国礼还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新中国外交取得的辉煌成就、党和国家领导人为新中国外交事业所创立的丰功伟绩,以及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源远流长的友好联系。这些研究也是当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 二、藏品原始信息的重要性

藏品原始信息是指藏品收集时的原始记录、原始资料等。

国礼藏品原始记录包括:移交单位提供的礼品清单。其中,国礼名称和国别、馈赠时间和背景(出访或来访)、授受人职务和姓名等,都是必备的基本要素。国

礼藏品原始资料包括:授礼人名片、信札、礼品作者简介、照片等等。这些要素越完整、越准确,其国礼的价值就越高。如果某一见证重大外交事件的礼品,失去其详实的原始记录、原始资料作为佐证,该件国礼就会失去原有的历史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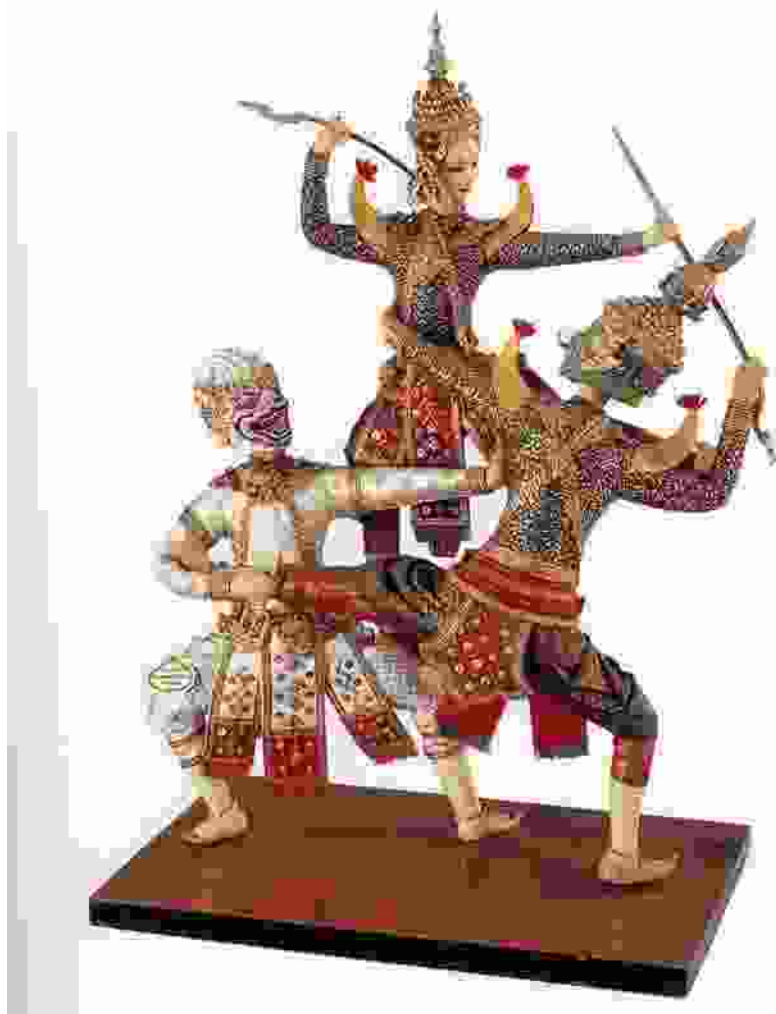
国礼藏品接收要注意原始信息的审核和收集。任何一件藏品总有其来龙去脉,它能使后世明了每一件文物和标本的流传经过、发现始末、传闻轶事和存疑问题。这是研究藏品十分必要的档案资料。同样,它应是藏品保管的基础工作。因此,凡是有关国礼藏品的资料,力争收集齐全、完备。原始资料收集得越详实,该藏品的使用价值和研究价值就会越大。如果这一基础工作不完善甚至被忽视,就可能导致藏品因缺少系统的资料、没有科学根据而降低或丧失其收藏、陈列和研究的价值。所以,接收工作搞得越好,藏品原始资料掌握得准确、全面,将为进一步鉴定、分级、登记、编目、建档等科学管理准备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为藏品的利用和开展各种学术研究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当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不仅存在着如何认识、分析历史文献的问题，同时也存在着如何发掘、收集历史文献的问题。作为新中国外交史的见证物，“国礼”也是当代中外关系史的史料之一。它的史料价值正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兴趣。在更多的情况下，“国礼”是和其他的史料结合在一起使用的，这种结合使“国礼”和其他文献资料相互补充、相互印证，从而使历史叙述过程中各类文献的使用相得益彰，使历史研究更加接近客观的历史真理，使其结论在整体上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具体地说，当我们将“国礼”作为史料使用时，

应具有广泛的学术视野和良好的理论素养，不仅要看到“国礼”本身，同时也要看到“国礼”所产生的历史环境和土壤，赋予它具体的社会内容和社会意义。作为史料的“国礼”和其他史料一样，是要通过历史学家讲话，这关系到“国礼”所蕴含历史信息的充分的、正确的阐释，实现其史料的科学认识价值。而所有的阐释、解读，要有科学依据，要在掌握充分、准确的原始信息以及相关背景的基础上进行。因此，国礼藏品原始记录、原始资料的完整性、准确性是非常重要的。

### 三、国礼藏品原始信息存在的问题及应对办法

在原国际友谊博物馆收藏的16000多件国际礼品中，有相当一部分在原始信息方面存在问题，使藏品质量大打折扣。1981年国际友谊博物馆筹备处成立伊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以最简单的点数全收方式从有关单位手中一下子接收了万余件国际礼品。由于这些国礼在入藏前经历了较为复杂的流传过程，且并非按照博物馆的专业程序标准进行操作，以至其原始记录、原始资料存在缺失、失实等问题。此后接收的国礼，由于诸多原因，在原始



泰国孔剧人形《哈努曼营救悉达》  
(1982年10月，泰国社会行动党领袖克利·巴莫赠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

信息方面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国礼藏品原始记录存在的问题：一是定名不准确。例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来自泰国的礼品“孔剧人形《哈努曼营救悉达》”，曾一直被误称为“牛头马面抢公主”，叫了几十年，直到笔者主持设计“泰国国礼艺术特展”时才得以更名。二是馈赠时间缺失或有误。例如：“1965年9月7日，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赠刘少奇”，正确时间应为“1965年3月2日”。三是授（受）人缺失。例如：“美国政府赠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秘鲁政府赠中国政府”。这里的“美国政府”、“秘鲁政府”、“中国政府”只说明了授（受）人的国别，但缺失具体授受人。四是授（受）人职务、身份不详。例如，“日本松下幸之助赠×××”、“×××赠李先念”，这里的“松下幸之助”和“李先念”缺失职务或身份。许多国礼藏品原始记录往往

存在以上多种问题。

在国礼藏品原始资料方面，由于对藏品的理解和管理水平有限，以往只关注藏品本身，而忽略了对藏品原始资料的收集和管理，以致一些授礼人名片、信札等没有随同国礼一道入藏。目前，不论是过去接收的礼品还是新接收的礼品，都面临同样一个问题：有关国礼馈赠的相关背景资料比较匮乏。尤其是对于那些鲜活的背后故事了解不够，亟待博物馆方面去收集、发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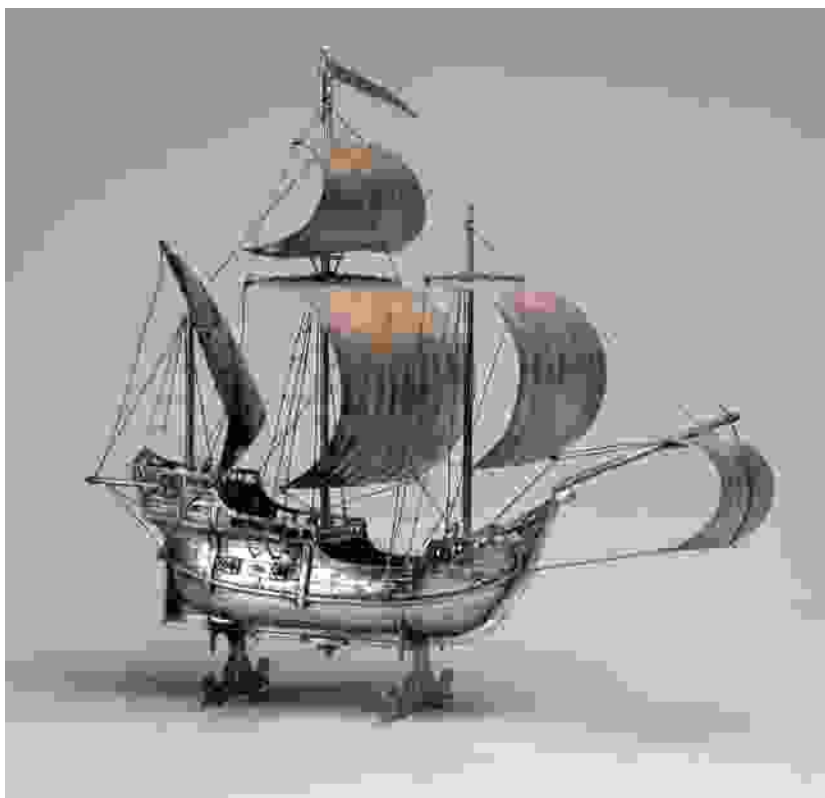
为了加强国礼收集工作的规范化，解决国礼藏品原始信息存在的问题，根据笔者多年的体会并结合实际工作经验，现提出如下几点应对方法：

#### 1. 严格做好科学的原始记录

首先，在接收国礼入藏时，应同时接收有关原始信息资料作为原始档案加以存留。尽可能多地收集与实物有关的信息，

以便能更多地开展藏品内部联系的研究，体现藏品背后人的活动，对藏品内涵能够给以准确的界定。其次，对国礼的有关情况都应该有详细的记录。各项原始记录要求真实、准确，忠于客观实际，不能妄想臆断，任意增减。同时，与国礼有关的文件、资料要完整保存，随同国礼作为第一手资料一道移交保管部门，这是建立藏品档案所必需的基本内容。此项工作稍一疏忽就可能影响藏品的科学性。

#### 2. 对国礼原始



葡萄牙银质古帆船模型  
(1985年5月，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赠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

记录进行判定

凡接收入藏的国礼，博物馆应进行初步的整理、鉴定工作。在整理时，要与原始记录和原始资料进行核对，及时发现问题。

一是国礼藏品的定名。藏品定名是直接表述藏品主要内容、特征、通称，其目的是与其他藏品相区别，使一般人能见其名如睹其物。因此，藏品名称的确定应能体现该藏品的主要特征。以泰国礼品“孔剧人形《哈努曼营救悉达》”的定名为例，孔剧为泰国假面舞剧，是专演《拉玛坚》的剧种，神猴哈努曼营救悉达是该剧的经典情节之一。由此可知，这件礼品最初名称“牛头马面抢公主”显然是不准确的。

二是对国礼的来源进行判定。国礼的来源是指国礼的国别、馈赠时间和背景（出访或来访）、授受人职务和姓名等。国礼的来源对正确判定国礼价值、提供藏品检索和利用，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对国礼的来源要力求鉴定准确。首先，要依据常识去判定。例如，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赠送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礼品，其原始记录应为“1972年2月”，否则就是错误的。其次，根据国礼授受双方外交往来的情况、已掌握的来源要素等，查询出所缺失的来源要素。例如，在原始记录“1964年10月，印度尼西亚部长阿卜杜加尼赠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授礼人职务不准确。根据已掌握的线索，可以查询到其职务为“外交部长”。有些礼品馈赠年代经过查阅，仍不能得出具体、准确的结果，这时候就要尽可能根据已经掌握的资料，推测出一个尽可能具体的时间范围，也是藏品登记确定历史年代的原则之一，如“二十世纪×年代”。

推测要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经得起历史史实的推敲，不能主观臆断、胡编乱造。有的藏品由于同时缺少几个要素，很难做出判定。比如，某件藏品原始记录为“1979年，美国政府赠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由于同时缺失具体的馈赠时间和地点、授

礼人姓名和职务等要素，加上1979年邓小平与美国外交往来频繁，这件礼品究竟为1979年何时、何地、何人所赠尚无法确定。

原始记录判定工作，要求相关业务人员平时注意各种专业知识的积累，经常阅读中外关系等相关书籍和名人回忆录、文章等，了解相关图书资料和权威门户网站。例如，世界知识出版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邓小平外交大事记》、《汉英外交政治词汇》（外交部翻译室编），南开大学出版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权威门户网站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新华社中国全球图片总汇网站。

针对馆藏国礼原始记录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国礼研究的需要，国际友谊博物馆信息资料中心自2007年开始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开展项目合作，由对方跟踪监测、回溯国内主要媒体有关中外领导人互访、互赠礼品等有关资讯，制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往来资料选编》，并提供网络检索查询数据库服务。这项为国礼研究量身打造的业务合作，为弥补、修正馆藏国礼原始记录提供了一个便利、有效的工具。

### 3. 向社会有关部门和人士调查访问

对于国礼而言，除要了解、判定其馈赠时间和地点、授受人职务和姓名等基本情况外，还需收集国礼馈赠的背景资料（如事由、情节等）。在调查访问工作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了解馆藏。摸清原始信息匮乏、失实的国礼藏品，分别接受礼人、授礼国进行分类，列出清单。同时了解这些藏品来源，比如外交部礼宾司、中办、国办、全国人大、政协、各大部委等，以便做到心中有数，使收集工作能明确对象，合理安排。

二是制定科学的收集计划。应根据国礼藏品的特点、人力、物力等条件，有目的、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收集工作。这是一

项长期的博物馆业务工作，客观上要求有计划性，要分轻重缓急，明确先后，重要的和利用率高的藏品优先。除了经常性的收集外，还要根据陈列展览和研究需要，有计划地开展专题收集，应明确专题收集的任务、目的、范围和重点，并对收集的有关线索进行调查、分析、对比，选择那些材料丰富、线索可靠的部门作为收集的重点。如外交部礼宾司、各驻华使馆等。另外，外交事件的当事人或参与者也是访问的重点。如外交部原礼宾司司长唐龙彬，对20世纪60、70年代的重要外交礼品较为了解，曾多次参加过外国元首和政府领导人访华接待工作，并出席互赠国礼的重要仪式，如美国总统尼克松向毛泽东主席赠送瓷塑《天鹅》的仪式。

三是抢救性收集。新中国已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一些外交事件的当事人和参与者年事已高，一些珍贵的历史信息、资料只是保留在他们的记忆中，如不及时进行抢救性的收集工作，就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因此，我们要争取时间把这些有可能很快消失的历史信息、资料保留下来，弥补、修正有关藏品信息，同时最大限度地挖掘、占有与藏品相关的背景资料。应该说，国礼相关资料的抢救性收集工作在当前尤其显得重要和紧迫。

四是收集成套完整的资料。在收集工作中，必须重视收集工作的科学性和收集对象的完整性。把那些有着内在联系的可以全面、系统地说明某一方面问题的成组材料收集起来。例如，回忆录、照片等。

五是做好口述记录。口述资料是受到过基本训练的采访人与经过必要准备的被采访人密切合作的成果。因此，采访人要经过基本的培训，包括采访技巧、设备运用、专业知识、背景知识，最重要的是要尽可能多地了解被采访人，拟定详细的采访方案。为了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有较大的收获，一定要事先与被采访人充分沟通，告知专访的目的、意义和具体做法、要求，以及需要向被采访人了解的问题，给被采访人

以足够的准备时间。在收集调查时，最好由当事人写出书面材料，或当场将被采访人介绍的关于国礼的资料作采访录音或准确详细的笔录，不得事后追记，以免记错或漏记。记录要实事求是，要经过核实，不能道听途说，更不能主观臆造；注意记下与国礼有关的人物、事件和情节等资料。如是调查访问所得，应整理出访问记录，连同照片、录音、录像，作为附件归档。

#### 4. 将国礼原始信息收集工作纳入有关中央礼品管理办法

国礼从接收到最后入藏博物馆，要经过一系列流程，涉及多部门、多环节。从源头上确保国礼原始记录的准确性，特别是馈赠国家、时间和地点、授受人姓名和职务的准确无误并不难。

以往，有关部门移交给博物馆的礼品清单存在诸多问题。一是礼品清单上只有“接收日期”（即有关部门接收礼品的时间），有的虽注明“赠送时间”，但与实际情况不符；二是未注明礼品是受礼人出访时接受的还是授礼人来访时馈赠的；三是外国人姓名或不全或有误；四是授受人职务或省略或有误。一旦源头上出现缺失、谬误，将给博物馆的国礼入藏和研究工作带来方向性的错误。

笔者认为，为了加强国礼管理的科学性、有效性，应该从国礼接收的源头入手，由博物馆向上级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将国礼原始信息的收集工作纳入有关部门的工作当中，并在有关国礼管理办法中明确下来。如果各相关部门对此达成共识，切实予以重视，将给国礼原始信息的收集工作打下坚实、牢固的基础。

随着国际交往的持续开展，国礼将源源不断地入藏博物馆，有关国礼原始信息的收集、研究工作会日益增多。解决好这一问题，是更好地开展国礼保管、研究、宣传和展示工作的基本前提。

（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信息网络部副主任）

# 北京市大兴区高米店 北齐、唐、明、清墓葬发掘简报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为配合北京市大兴区新城北区 19 号地、20 号地开发建设，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大兴区文物管理所协助下，于 2008 年 10 月 10 日～11 月 23 日对前期考古勘探发现的古代墓葬、遗址等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地点位于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高米店村，发掘区北邻乐园路，南邻金星路，东邻京开高速，西邻兴华大街。地理位置为东经  $116^{\circ} 19' 48.02''$ 、北纬  $39^{\circ} 45' 49.65''$ ，海拔高度 46 米(图一)。此次发掘北齐墓葬 1 座、唐代墓葬 9 座、

明代墓葬 6 座、清代墓葬 13 座；此外还发掘了唐代窑址 2 座、清代房址 6 座。现将此次发掘的墓葬简报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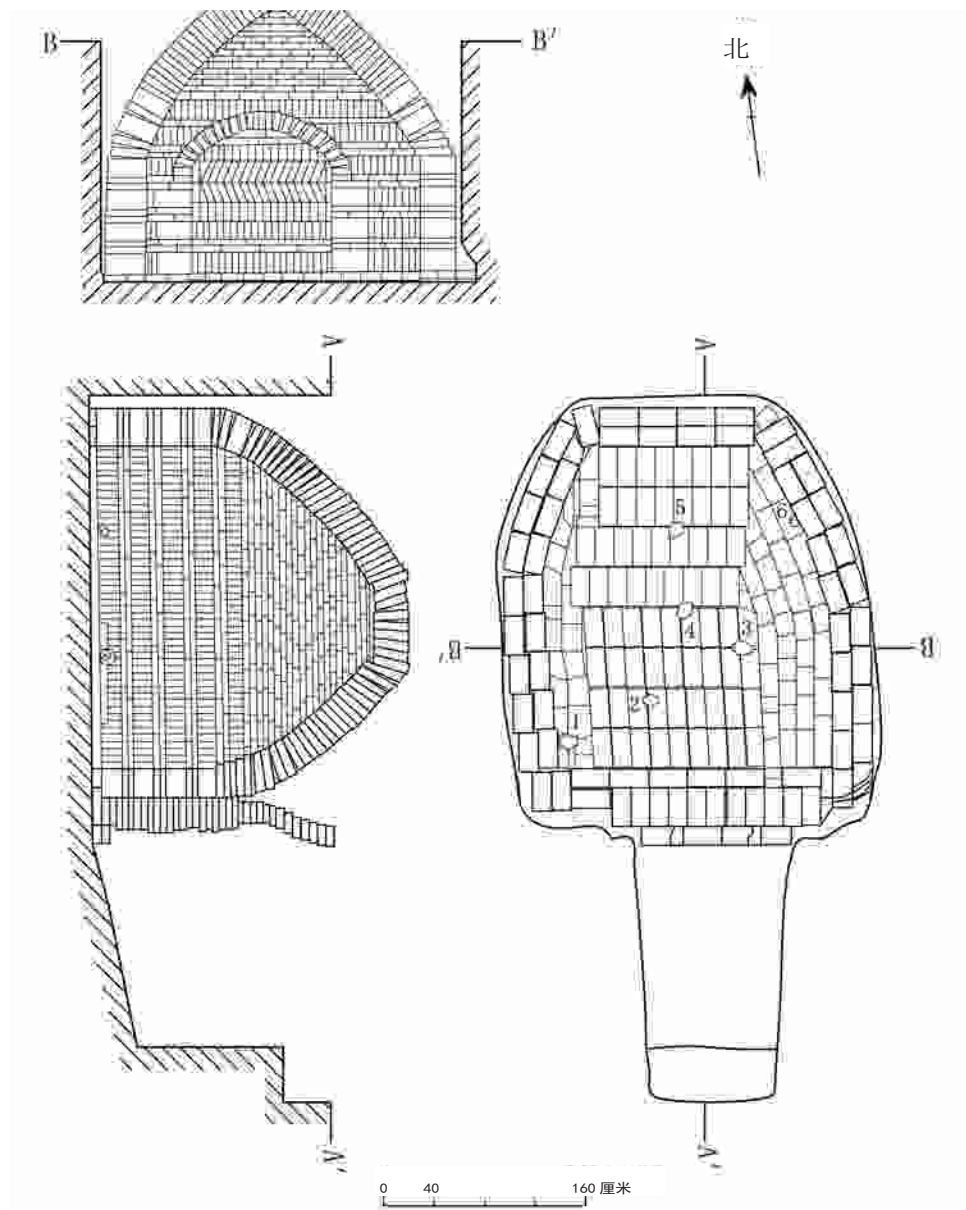
## 一、北齐墓葬

### (一) 墓葬形制

M1 为带墓道椭圆形竖穴土圹砖砌单室墓，由墓道、墓门、墓室三部分组成(图二；照片一)。坐北朝南，方向  $185^{\circ}$ ，开口于③层下。土圹底部南北总长 5.6 米，东



图一 发掘区位置示意图



图二 M1 平、剖面图  
1~5. 陶罐 6. 白釉杯

西宽 1.2~2.94 米，墓口距地表深 1.5 米，墓底距墓口深 1.92 米。

墓道位于墓室南端，为长方形竖穴土圻，南北长 2.04 米，东西宽 1~1.2 米。墓道底面北部呈斜坡，南部设置台阶一级，台阶高 1.2 米，宽 0.43 米。

墓门位于墓道北端，为拱券式，东西宽 1.44 米，南北进深 0.36 米，高 1.2 米，

上部用条形砖上下叠压平砌成墓门楼墙，现存残高 16 层，共计高度 0.8 米。墓门内封门砖共内外 2 层。外层用平砖上下错缝平砌，共计 19 层；内层共计 10 层，其中第 2、3、9、10 层为平砌层，1、4、5、8 层为竖砌层，另 6、7 层为“人”字形竖砌。

墓室位于墓门北端，平面呈长方形，弧角，南北总长 3.08 米，东西宽 1.6~2.8



照片一 北齐 M1

米，内穹隆顶高 2.24 米，外穹隆顶高 2.52 米，墓室周壁用长方形青砖“两平一竖”更替错缝砌制而成，墓壁高 0.96 米，起券部分高 1.55 米，墓顶上部较平，封顶部分采用长方形青砖斜竖逐渐券至顶部中心。墓室底部青砖平铺。用砖规格为：长 0.3 米、宽 0.15 米、厚 0.05 米。墓室内未见骨架。

墓室内出土的随葬品有灰陶罐（M1:1 ~ M1:5）位于墓室内，白釉杯（M1:6）位于墓室东北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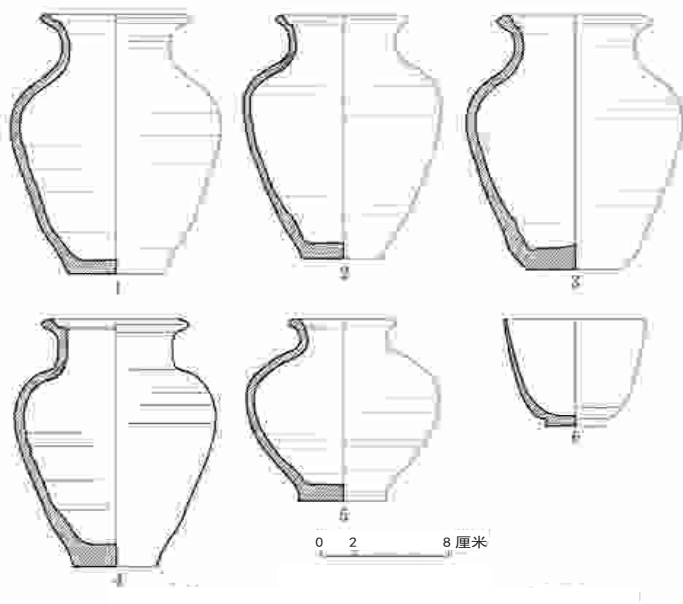
#### （二）出土随葬品

该墓出土器物 6 件。分陶、瓷两类。其中陶器 5 件，器形为罐；瓷器 1 件，器形为杯。

陶罐 5 件。皆泥质灰陶，轮制，器形规整。标本 M1:1，盘口，束颈，丰肩，斜弧腹，下腹渐收，小平底，器表有明

显的修坯旋痕，陶质较疏松，器身有裂痕，口径 9.4 厘米、最大腹径 13.1 厘米、底径 6 厘米、高 16.2 厘米（图三，1，照片二）；标本 M1:2，残，敞口，卷沿，短束颈，丰肩，弧腹，下腹渐收，小平底，陶质较硬。口径 6.8 厘米、最大腹径 12 厘米、底径 5.7 厘米、高 11.4 厘米（图三，5）；标本 M1:3，完整，盘口，束颈，丰肩，斜弧腹，下腹渐收，小平底，器表有明显的修坯旋痕，陶质较硬。口径 9.7 厘米、最大腹径 13.6 厘米、底径 6 厘米、高 16 厘米（图三，3）；标本 M1:4，残，盘口，束颈，丰肩，斜弧腹，下腹渐收，小平底，器表有明显的修坯旋痕，陶质较硬。口径 9.2 厘米、最大腹径 12.6 厘米、底径 5.2 厘米、高 15.5 厘米（图三，4）；标本 M1:5，完整，盘口，束颈，丰肩，斜弧腹，下腹渐收，小平底，器表有明显的修坯旋痕，陶质较硬。口径 8.4 厘米、最大腹径 12.4 厘米、底径 5 厘米、高 15.2 厘米（图三，2）。

白釉杯 1 件。标本 M1:6，见裂痕，敞口，斜深腹，饼形足，足露灰褐色胎，胎质坚硬，器内外施乳白色釉，外壁施釉不及底，口部釉层稀薄，局部脱落，釉面布满细密开



图三 M1 出土陶器

1~5. 陶罐（M1:1、M1:5、M1:3、M1:4、M1:2） 6. 白釉杯（M1:6）





照片二 灰陶罐 M1: 1



照片五 灰陶碗 M9: 8



照片三 白釉杯 M1: 6



照片六 铁镬斗 M9: 4



照片四 灰陶罐 M9: 7



照片七 半釉陶罐 M18: 2

片纹。口径8.8厘米、底径3.7厘米、高6.7厘米(图三,6;照片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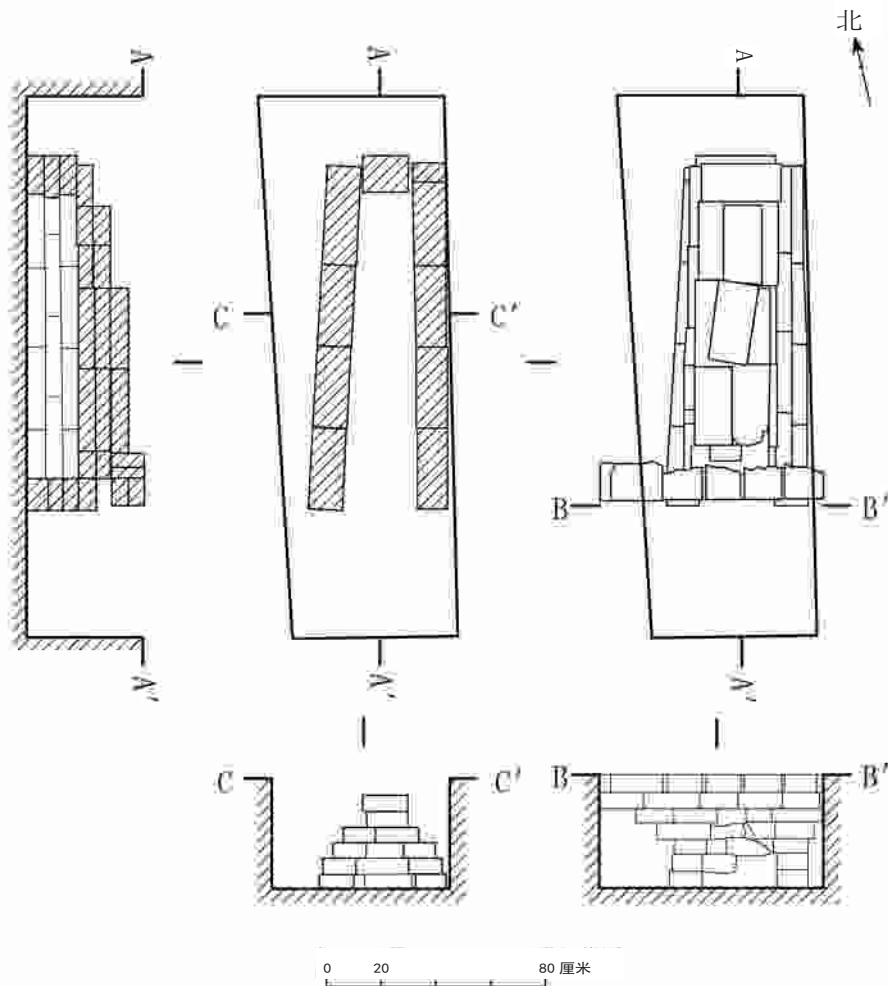
## 二、唐代墓葬

共发掘9座,编号为M2~M10,均为坐北朝南。其中M3、M9墓室为弧边长方形,形制较大,其他7座墓葬较小。以M5、M7、M9为例,介绍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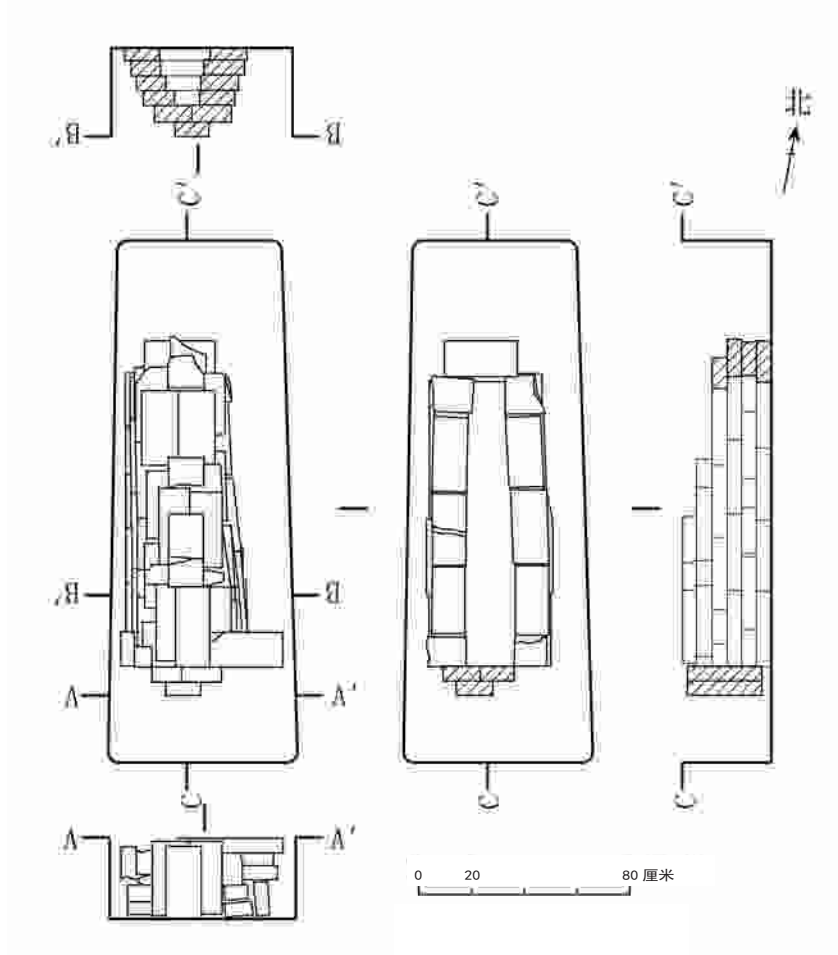
M5位于发掘区中西部,东邻M6,坐北朝南,方向 $190^{\circ}$ 。开口于③层下,为近长方形竖穴土圹砖室墓(图四)。墓室南北总长2米,东西宽0.6~0.7米,墓口距地表深1.5米,墓底距墓口0.42米。

土圹四壁修整较齐。墓室南宽北窄,南北长1.28米,东西宽0.42~0.5米,深0.42米,底部无铺底砖。墓室东西两壁用细绳纹砖砌筑三层,每层向内收0.1~0.2米。墓顶为平砖平铺三层,共两排,呈南北向。北壁为三层残青砖砌筑;南部为残青砖封门。墓室总高0.42米,内高0.3米。用砖规格为:长0.3米、宽0.15米、厚0.06米,墓室内填花土,土质稍硬。在该墓室底部未发现骨架痕迹。未出土随葬品。

M7位于发掘区中部偏西,西南邻M6,东邻M8,坐北朝南,方向 $172^{\circ}$ 。开口于③层下,为近长方形竖穴土圹砖室墓(图五)。土圹南北总长2米,东西宽0.62~0.72



图四 M5平、剖面图



图五 M7平、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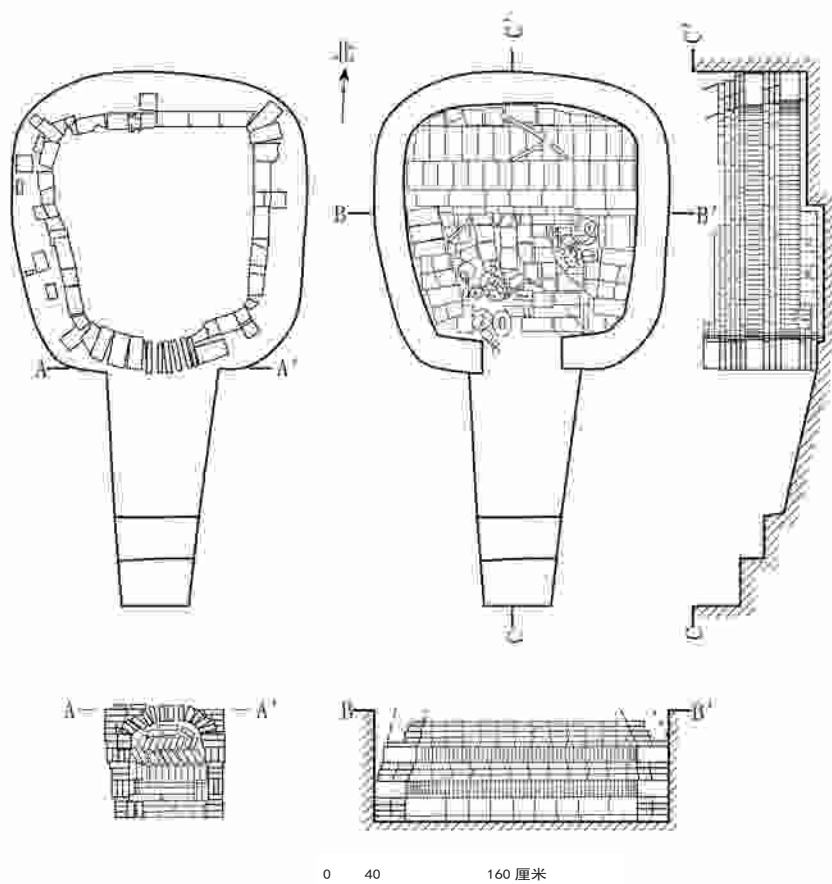
米，南宽北窄，深0.34米。墓室南北长1.35米，东西宽0.42~0.5米，高0.34米，墓底距墓口0.34米，墓口距地表深1.5米。墓室用青砖砌筑而成。砌法为：东西两壁用青砖错缝平砌，由底向上逐层内收0.02~0.05米，共五层。顶部南北向平盖一层。北壁用侧砖封口。在墓室南端设有墓门，墓门东西宽0.19米，高0.3米，门外用带细绳纹的青砖大面立起封门，共三块。用砖规格为：长0.3米、宽0.145米、厚0.06米。砖的类型有素面和带细绳纹两类。未见骨架。未出土随葬品。

M9 位于发掘区中部西边，西南邻M10，东南邻M7、M8，坐北朝南，方向175°。开口于③层下，为带墓道椭圆形竖

穴土圻砖砌单室墓（图六）。南北总长5.04米，东西宽0.62~2.8米，墓底距墓口1.07米，墓口距地表深1.5米。由于破坏，顶部无存，由墓道、墓门和墓室三部分组成。

墓道位于墓门南侧，平面为梯形，底部为台阶状，南北总长2.23米，东西宽0.62~1.05米。墓道南端设两步台阶，由上至下，第一步台阶面距墓口深0.44米，台阶南北进深0.44米，东西宽0.62~0.72米，高0.23米；第二步台阶距墓口深0.67米，台阶南北进深0.4米，东西宽0.72~0.8米，高0.2米；墓道深0.45~1.16米。整个墓道内填花土，土质稍硬。

墓门位于墓道北侧，东西宽1.12米，南北进深0.3米，高1.06米。墓门东西两



图六 M9 平、剖面图

1、3. 青釉碗 2、5~7、9. 陶罐 4. 铁镵斗 8. 陶碗

壁用带细绳纹的红砖“三平一立”砌制，由第12层开始起券。用砖规格为：长0.3米、宽0.14米、厚0.05米。墓门内砌有封门砖，用红砖和极少青砖砌筑。砌法为：底部错缝平摆六层，第七层为立砖砌制，上部砖砌“人”字形二层，又在“人”字形砌砖上平摆两层。门楼已破坏无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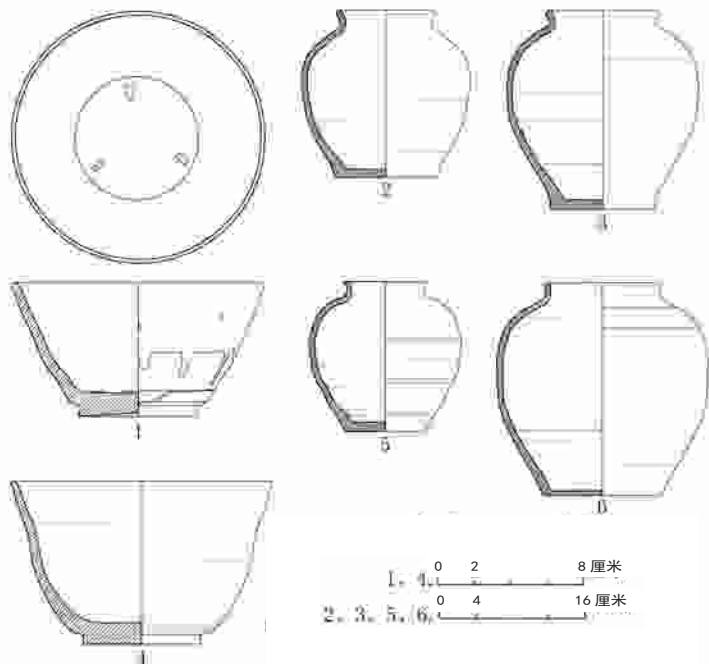
墓室位于墓门北侧，平面近马蹄形，口小底大。墓室口部南北长2.04米，东西宽1.84米，底部南北长2.8米，东西宽2~2.76米，残高0.92~1.06米。墓室周壁用带细绳纹的红砖和红砖残块“三平一立”砌制，在砌至0.66米高时开始错缝平砌，层层内收起券。在墓室北部设一近长方形棺床，东西长2.04米，南北宽1.02

米，棺床平面用红砖南北向侧铺一层，共两排；内边和外边用单砖东西向各平铺一排，棺床外用立砖大面包边，高0.16米，棺床上残留几根骨头。另在墓室南部东西两壁下，各有一个砖摆的近长方形的砖台，东西相对称，南北长1.06米，宽0.3米，高0.22米。墓室底部用残砖块随意平铺一层。室内填杂花土，含砖块，土质稍硬。

墓室西南部出土陶罐（M9:5、M9:6、M9:7、M9:9）、陶碗（M9:8）；墓室中、东部棺床东南侧出土青釉碗（M9:1、M9:3）、陶罐（M9:2）、铁镵斗（M9:4）。

#### 随葬品

该墓出土器物9件。分陶、瓷、铁器三类。其中陶器6件，器形为罐、碗；瓷



图七 M9 出土器物

1. 青釉碗 (M9:1) 2、3、5、6. 陶罐 (M9:7、M9:6、M9:9、M9:5)  
4. 陶碗 (M9:8)

器 2 件，器形为碗；铁器 1 件，器形为鏃斗。

陶罐 5 件。皆泥质灰陶、轮制。标本 M9:5，残，直口，尖唇，束颈，溜肩，鼓腹，下腹渐收，平底略内凹，唇部饰一周凹槽，肩部和下腹共饰三周凹弦纹。口径 12.8 厘米、最大腹径 23.1 厘米、底径 12.9 厘米、高 23.3 厘米（图七，6）；标本 M9:6，口残，直口，方唇，溜肩，鼓腹，下腹弧收，平底略内凹，肩部饰两周凹弦纹。口径 12.6 厘米、最大腹径 21.1 厘米、底径 11.5 厘米、高 21.8 厘米（图七，3）；标本 M9:7，敞口，斜平沿，束颈，溜肩，鼓腹，下腹弧收，平底略内凹，肩部饰一周凸棱纹，近底部饰一周凹弦纹。口径 10.9 厘米、最大腹径 18.4 厘米、底径 11.1 厘米、高 18.3 厘米（图七，2；照片四）；标本 M9:9，残，敞口，尖唇，束颈，丰肩，弧腹，下腹弧收，平底略内凹，器身修坯粗糙，有明显的修坯凹弦纹。口径 9.2 厘米、最大腹径 16.6 厘米、底径 8.4 厘米、高 16.4 厘米（图七，5）。标本 M9:2，残罐底，底径 12 厘米、残高 11 厘米。

陶碗 1 件。标本 M9:8，泥质灰陶，完整，敞口，束腰，弧腹，饼形足，下腹见数周修坯凹弦纹，口径 14.4 厘米、腹径 12 厘米、底径 6.4 厘米、高 8.9 厘米（图七，4；照片五）。

青釉碗 2 件。标本 M9:1，完整，敞口，斜壁，深腹，下腹内折，见两周凹弦纹，饼形足，足露灰褐色胎，足心有一内凹圆点施白色化妆土，并施酱色釉，外壁施半釉，内壁满釉，釉面布满细密开片纹，内底有三个椭圆形支钉痕。口径 13.6 厘米、底径 6.6 厘米、高 7.3 厘米（图七，1）；标本 M9:3，铸在铁香炉内无法取出，残，敞口，斜壁，

深腹，内底上凸，内壁施青绿色釉，釉稀薄，口部露胎，口径 11 厘米。

铁鏃斗 1 件。标本 M9:4，严重锈残。器形为三足鼎式。敞口，沿外撇，深腹，平底，三兽蹄足匀称附于外腹部。口部对称铸形似一禽类颈部及尾部，颈部残断，尾部为长方形，上部有一圆形环。口径 15.5 厘米、底径 12.6 厘米、高 15 厘米（照片六）。

### 三、明代墓葬

明代墓葬共发掘 6 座。选取 M13、M18 介绍如下：

M13 位于发掘区西北部，东邻水渠，开口于②层下，为长方形竖穴土圜单棺墓。南北向，方向 5°，南北长 2.16 米，东西宽 1.36 ~ 1.5 米，墓口距地表深 1.2 米，墓底距墓口深 0.6 米。内填花土，土质较松。内置单棺，棺木已朽，棺长 1.8 米，宽 0.5 ~ 0.6 米，残高 0.1 米。棺内骨架保存较好，头向北，面向东，仰身直肢葬。随葬品有红陶罐（M13:2）位于棺内西臂骨

西侧，铜钱（标本 M13:1-1、标本 M13:1-2）位于脊椎骨、腿骨部。

随葬品

该墓出土陶器 1 件，器形为罐。另出土铜钱 5 枚。

红陶罐 1 件。标本 M13:2，轮制。泥质红陶，残，敞口圆唇，束颈，溜肩，鼓腹，下腹渐收，平底。胎体粗糙，腹部修坯凹弦纹明显，仅口、颈部饰酱色釉浆水。口径 11 厘米、最大腹径 12.4 厘米、底径 8.4 厘米、高 14.2 厘米（图九，1）。

“元祐通宝” 1 枚。标本 M13:1-1，范铸，外圆郭，内圆穿，钱面为“元祐通宝”四字，行书，旋读。钱径 2.4 厘米、穿宽 0.8 厘米、郭宽 0.2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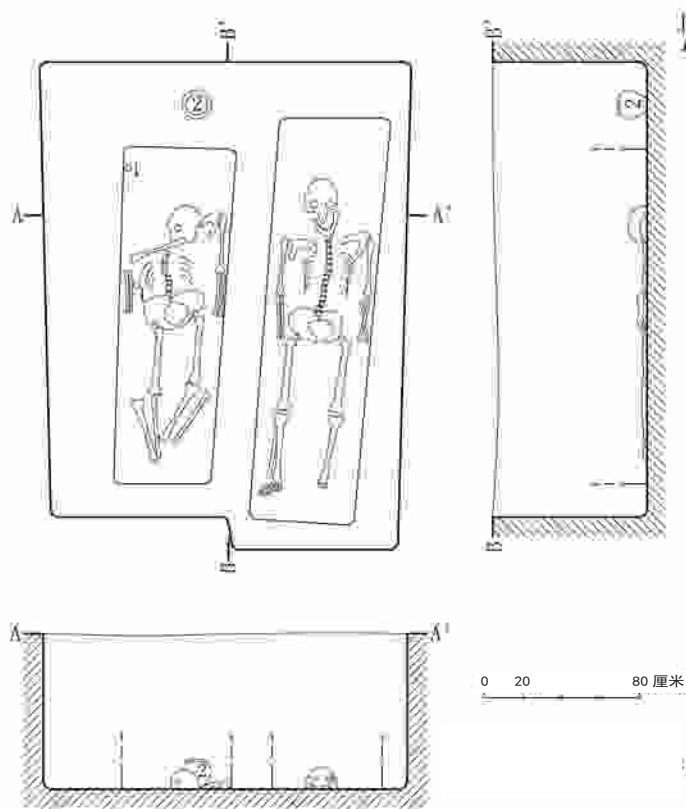
“洪武通宝” 1 枚。标本 M13:1-2，范铸，

残，外圆郭，内方穿，钱面为“洪武通宝”四字，楷书，对读。钱径 2.3 厘米、穿宽 0.6 厘米、郭宽 0.2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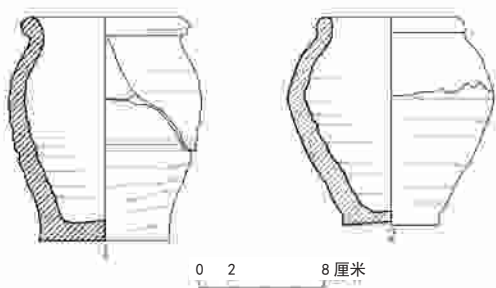
另 3 枚锈蚀、残破，钱面无法辨识。

M18 位于发掘区西南部，南邻 M19，南北向，方向 185°，开口于②层下，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双棺墓（图八）。四壁较规整，南北长 2.34 ~ 2.5 米，东西宽 1.8 ~ 1.9 米，墓口距地表深 1.1 米，墓底距墓口深 0.8 米。墓室内置双棺，棺木已朽。东棺长 2.08 米，宽 0.52 ~ 0.56 米。西棺长 1.72 米，宽 0.48 ~ 0.58 米，棺内骨架保存较完整。出土的随葬品有半釉陶罐（M18:1、M18:2）位于西棺北侧，铜钱（M18:3-1、M18:3-2）2 枚位于西棺西北部。

随葬品



图八 M18 平、剖面图  
1. 铜钱 2. 半釉陶罐



图九 M13、M18 出土陶罐  
1. M13:2 2. M18:2

该墓仅出土陶器 2 件，器形为罐。另出土铜钱 2 枚。

半釉陶罐 2 件。标本 M18:1，轮制。泥质黄褐陶，残，直口，圆唇，短颈，丰肩，鼓腹，下腹弧收，高圈足，平底，底中部有一圆形乳突，胎体粗疏，腹部修坯旋痕明显。仅口、颈、肩部施酱色釉。口径 8.5 厘米、最大腹径 15.2 厘米、底径 7.8 厘米、高 14.7 厘米；标本 M18:2，轮制。泥质黄褐陶，残，直口，圆唇，短颈，丰肩，鼓腹，下腹弧收内曲，平底，胎体粗疏，腹部修坯旋痕明显。仅口、颈、肩部施酱色釉。口径 9.2 厘米、最大腹径 12.7 厘米、底径 6.3 厘米、高 13.2 厘米（图九，2；照片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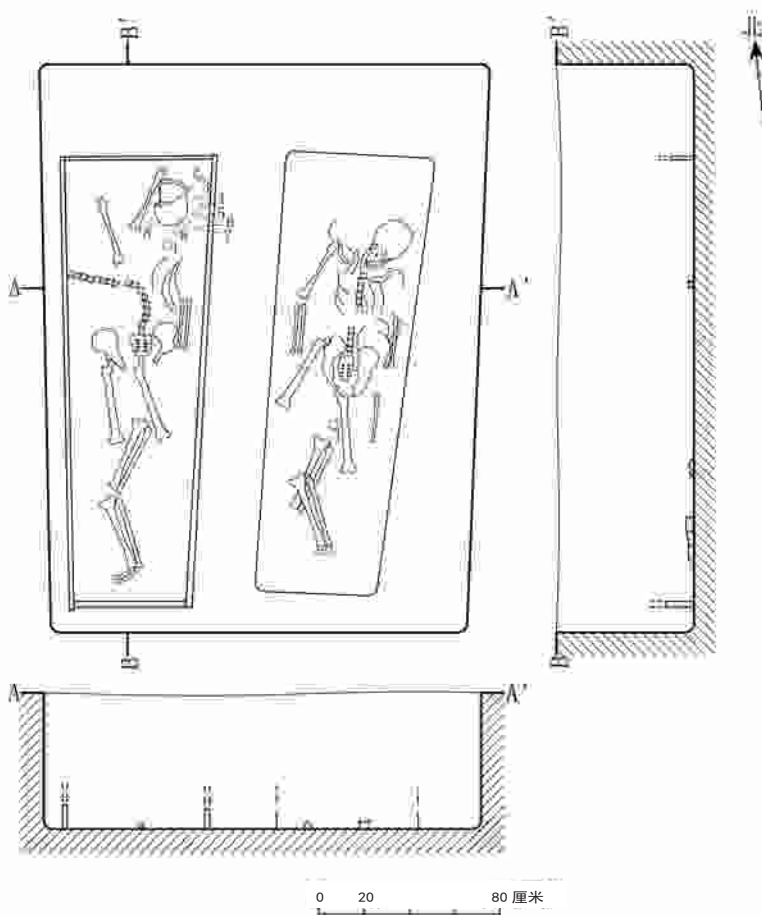
“嘉靖通宝”2 枚。  
标本 M18:3-1，范铸，残，外圆郭，内方穿，钱面为“嘉靖通宝”四字，隶书，对读。钱径 2.5 厘米、穿宽 0.6 厘米、郭宽 0.2 厘米；  
标本 M18:3-2，范铸，

残，外圆郭，内方穿，钱面为“嘉靖通宝”四字，隶书，对读。钱径 2.5 厘米、穿宽 0.6 厘米、郭宽 0.2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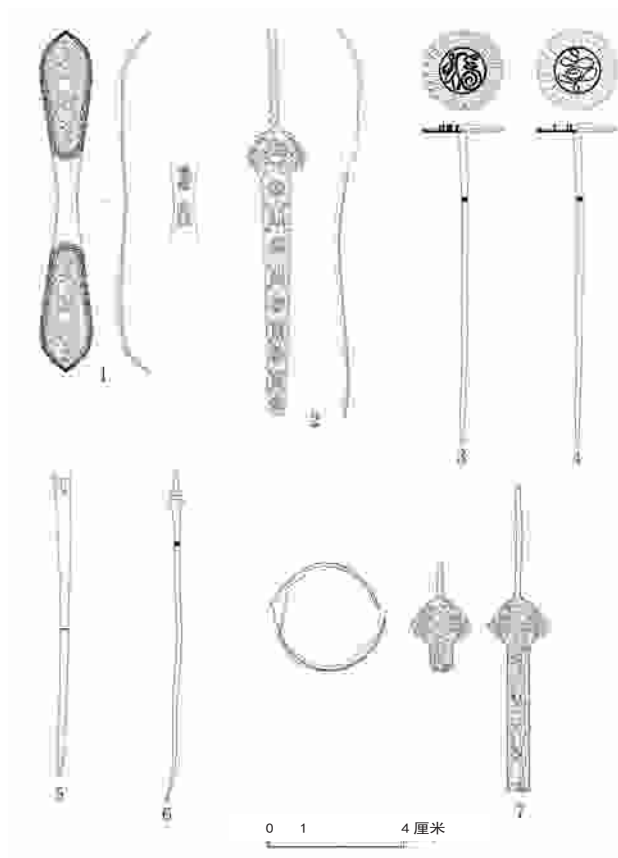
#### 四、清代墓葬

清代墓葬共发掘 13 座。选取 M16、M17 介绍如下：

M16 位于发掘区中部偏西，北邻 M15，南邻 M17，方向 3°，开口于②层下，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双棺墓（图一〇）。南北长 2.5 米，东西宽 1.8~2 米，墓底距墓口深 0.6 米，墓口距地表深 0.9 米。内填花土，土质较松。墓室内置双棺，棺木已朽，东棺长 1.94 米，宽 0.54~0.64 米，残高 0.1 米。棺内骨架保存较差，侧身曲



图一〇 M16 平、剖面图  
1. 铜板 2. 银押发 3~7. 银簪 8. 银耳环



图一一 M16 出土银器

1. 银押发 (M16:2) 2~6. 银簪 (M16:3、M16:5、M16:4、M16:7、M16:6) 7. 银耳环 (M16:8)

肢，头向北，面向东。西棺长 1.98 米，宽 0.57~0.68 米，棺内骨架保存较差，头向北，面向上，仰身曲肢。出土的随葬品有铜板 (M16:1) 位于东棺内腿骨西侧，银押发 (M16:2)、银簪 (M16:3~7)、银耳环 (M16:8-1, M16:8-2) 位于西棺头骨部。

#### 随葬品

该墓出土器物 9 件。其中银器 8 件，器形为银簪、押发、耳环；铜器仅铜板 1 枚。

银簪 5 件。标本 M16:3，簪首呈圆形花朵状，镂空，带把。簪体扁平，正面篆刻凸起状篆体“寿”字纹四组，以鼓钉状“寿”字纹五组相隔，背面簪体呈凹窝九处，尾残断。长 11.4 厘米 (图一一，2)；标本 M16:4，簪首为圆形，可分两层。上层直径 1.4 厘米，用银丝在圆环内掐成一草书“福”字，下层直径 2.3 厘米，正面篆刻月华锦纹。

簪体为圆柱锥体，尾尖，长 9.4 厘米 (图一一，4)；标本 M16:5，簪首为圆形，可分两层。上层直径 1.4 厘米，用银丝在圆环内掐成一草书“福”字，下层直径 2.3 厘米，正面篆刻月华锦纹。簪体为圆柱锥体，尾尖，长 9.4 厘米 (图一一，3；照片八)；标本 M16:6，簪体为细直圆柱体，簪首残断，尾细尖，残长 9.7 厘米 (图一一，6)；标本 M16:7，簪首残缺，簪体扁平细直，尾细尖，残长 8.8 厘米 (图一一，5)。

银押发 1 件。标本 M16:2，器体扁平，中间束腰微曲，两端圆尖微弯。器体正面篆刻蝙蝠纹。背面有竖款铭文“德盛足纹”四字。长 10 厘米、宽 0.6~1.5 厘米、厚 0.05~0.25 厘米 (图一一，1；照片九)。

银耳环 2 件。标本 M16:8-1，M16:8-2，形制相同。首部如意环形镂空状，带圆柱状把，尖细。器表篆刻折枝花卉纹，直径 3.1 厘米 (图一一，7；照片一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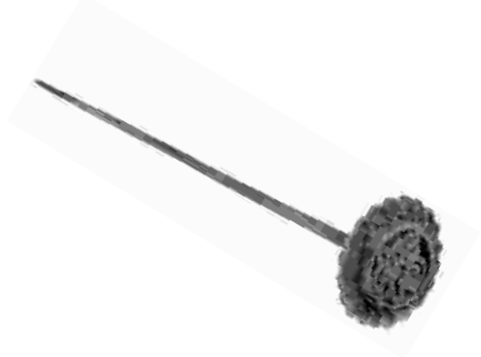
铜板 1 枚。标本 M16:1，锈残，铜质，圆形，直径 3.3 厘米。

M17 位于发掘区中部偏西，北邻 M16，南北向，方向 357°。开口于②层下。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双棺墓 (图一二)。南北长 2.74 米，东西宽 1.54~1.82 米，墓口距地表深 0.9 米，墓底距墓口深 0.72 米，内填花土，土质较松。墓室内置双棺，棺木已朽。东棺长 2.02 米，宽 0.62~0.68 米，残高 0.35 米，棺内骨架保存差。西棺长 1.92 米，宽 0.5~0.64 米，两壁残留 0.02 米的朽木棺板，残高 0.15 米，棺内骨架保存差，头向北，面向西，仰身直肢。出土的随葬品有银押发 (M17:1)、银簪 (M17:2、M17:3、M17:4)、铜簪 (M17:5)，皆位于西棺头骨部位。

#### 随葬品

该墓出土器物 5 件。其中银器 4 件，器形为银簪、押发；铜器仅铜簪 1 件。





照片八 银簪 M16: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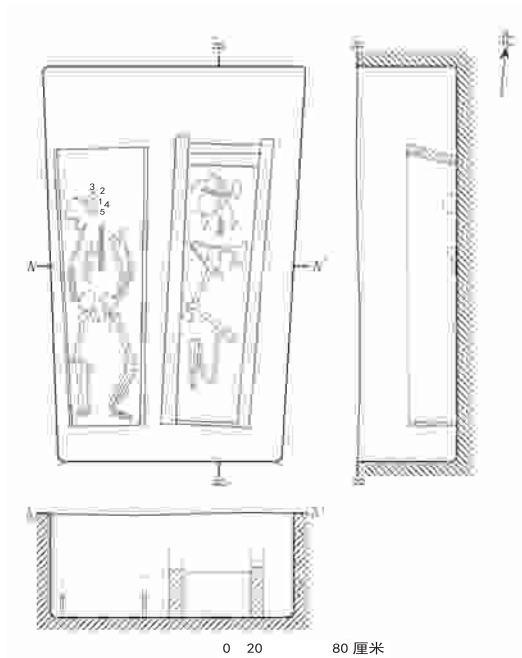
照片九 银押发 M16: 2



照片一〇 银耳环 M16: 8



照片一一 银簪 M17: 4



图一二 M17 平、剖面图  
1. 银押发 2~4. 银簪 5. 铜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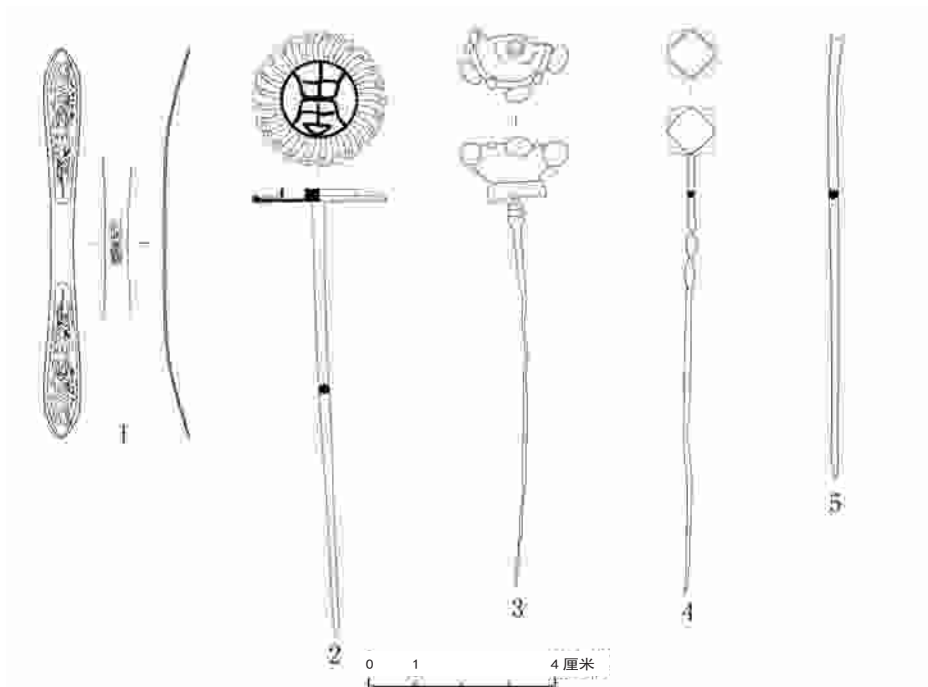
银簪 3件。标本 M17:2, 簪首为圆形, 可分两层。上层直径 1.6 厘米, 用银丝在圆环内掐成一“寿”字, 下层直径 2.8 厘米, 正面篆刻月华锦纹。簪体为圆柱锥体, 尾尖, 长 9.6 厘米(图一三, 2); 标本 M17:3, 残, 簪首为圆形花瓣状, 簪体为细圆柱锥体。残长 9.6 厘米(图一三, 3); 标本 M17:4, 残, 簪首为多棱形球体, 簪体为圆柱状锥体, 上部制成麻花状。残长 10.4 厘米(图一三, 4; 照片一一)。

银押发 1件。标本 M17:1, 器体扁平, 中间束腰微曲, 两端柳叶状, 圆尖微弯。器体两端刻划花纹。长 8.4 厘米、宽 0.48~0.76 厘米、厚 0.1 厘米(图一三, 1)。

铜簪 1件。标本 M17:5, 残断, 簪体为细圆柱锥体。残长 9.3 厘米(图一三, 5)。

## 五、结 语

这批墓葬中未出土纪年材料, 可依据出土器物判断其年代。M1 出土灰陶罐(M1:1)与北京王府仓北齐墓出土陶壶<sup>①</sup>(名称此处称为壶)形制接近, 均为盘口、束颈、弧腹,



图一三 M17 出土器物

1. 银押发 (M17:1) 2~4. 银簪 (M17:2、M17:3、M17:4) 5. 铜簪 (M17:5)

因此判断为北齐墓葬。

M9 出土青釉碗 (M9:1) 与北京亦庄 69 号地唐墓 M5 出土的青釉碗 (69 号地 M5:2)<sup>②</sup>形制接近, 均为敞口, 斜壁, 内壁满釉, 外壁施釉至腹中部, 不过两件器物的腹部弧度略有不同。M9 出土陶罐 (M9:5) 与前后朱各庄唐墓出土陶罐 (M3:5)<sup>③</sup>形制接近, 均为尖唇, 溜肩, 鼓腹, 唇部饰一周凹槽。有研究者认为北京亦庄 69 号地 M5 为初唐时期墓葬, 认为前后朱各庄 M3 为盛唐时期墓葬。<sup>④</sup>综合分析, M9 为盛唐时期墓葬。M3 墓室为弧边长方形, 这种墓葬在北京地区一般属唐代时期。其他 7 座小型墓葬与前述两座均处于③层下, 且相距较近, 亦可判断为唐代墓葬。

M18 出土半釉陶罐 (M18:1、M18:2) 为泥质黄褐陶, 胎体粗疏, 直口, 圆唇, 短颈, 丰肩, 鼓腹, 下腹弧收, 平底, 腹部修坯旋痕明显。仅口、颈、肩部施酱色釉。其形制工艺特点是比较典型明代中晚期风格; 另出土“嘉靖通宝”为明世宗朱厚熹

时期铸钱; 结合墓葬形制特点判断 M18 为明晚期墓葬。

①马希桂:《北京王府仓北齐墓》,《文物》1977 年第 11 期。

②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亦庄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9 年 1 月。

③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段考古发掘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08 年 4 月。

④胡传耸:《北京地区隋唐墓葬分期与年代研究》,《北京文博文丛》2011 年第 1 辑。

发掘: 于璞 朱志刚  
摄影: 王殿平 于璞  
修复: 古艳兵  
绘图: 刘晓贺  
执笔: 于璞 朱志刚

# 唐故蓟州司仓参军李洪墓志考

张云燕

李洪墓志于1949年后在北京市海淀区出土，志文首题为“唐故朝请郎试太子洗马赐绯鱼袋蓟州司仓参军李公墓志铭”，石现藏于海淀区文物管理所。墓志盖为盂顶式，长50cm，宽51cm，厚8cm，四角线刻花卉，周围环刻怀抱十二生肖的文官立像。中央篆书二行二字：“李公墓志”。

志底长50cm，宽50cm，厚8cm，志文22行，行17—38字不等，书体正行相间，字迹清隽洒脱，灵动自然。文中对李洪家世、婚姻与仕宦经历的记载为研究盛唐到中唐时期宗室成员的入仕、任官和婚姻状况等提供了新的资料。

## 一、墓志录文

唐故朝请郎试太子洗马赐绯鱼袋蓟州司仓参军李公墓志铭并序



唐故蓟州司仓参军李洪墓志盖

国子进士前涿州参军摄莫州参军李标撰

皇唐贞元十五年岁在己卯六月廿七日，皇从叔李公终于蓟州官舍，享年七十二。《春秋》之义：踰月而外姻至。又：大事先远日。故以十九年五月廿八日，卜窆于幽都县西吊虞之原，从其兆也。公讳洪，字洪，大圣

烈祖玄元皇帝之后，惟宗室之望曰邠王，高宗大帝之孙，章怀太子之子，公即邠王之少子也。生有令德，长为人范，聪智明敏，日下无双。况维城开百代之宗，阮竹带千年之阴。起家试太子洗马。历邸横海，受署清池县丞。辞满，后应辟我邦。旋差摄檀州司法参军，次任司户参军。虽渐陆之仪，尚戢其翼，而才应历试，迹亦宜迁。改授蓟州司法参军，转司仓参军，旌其能也。公凡历官守道五十余年，命虽

屈于伯寮，」禄不停于一日。慕晏婴之俭，安原宪之贫。始毗赞于一同，终廩掾于三语。」呜呼！振古以来，高名沉于下位者，于公见之矣，可胜恸耶！」夫人河东裴氏，故范阳郡副持节，沧、定等州刺史讳休贞之次女也。」徽容淑慎，懿范柔和。孝以承宗，慈以抚下。事先姑能令起敬，奉」君子宜保永贞。岂期中寿之年，奄梦楹之奠。以元和元年正月廿三日，寝」疾歿于涿州固安县太平里之私第，春秋七十四。以十一年八月廿一日，合祔葬于」公之故莹，速缓必书也。公有长子曰季则，累任至莫州郑县尉。冰碧立身，」天资介直。历官五政，皆著清声。达于国，自于家，

其为不匮远矣。次子季准，」次子季顺。玉树连枝，琼英共润，朋发之感，日月有期。愿启幽堂，载绝贞石。铭曰：」

高帝诸孙，邠王少子，事主安亲，慎终如始，忠孝全兮。银章晶晶，朱绂明明，长男袭爵，外留专城，宗族荣兮。」奈何一旦，奄终三语，行路伤兮。泉台杳杳，松楸苍苍，李公居此，勒石幽堂，天地长兮。

## 二、李洪的世系与婚姻

志主李洪为唐德宗之从叔，邠王李守礼之子，卒于贞元十五年（799年），享年72岁。志文云：“公讳洪，字洪，大圣



唐故蓟州司仓参军李洪墓志

烈祖玄元皇帝之后。惟宗室之望曰邠王，高宗大帝之孙，章怀太子之子，公即邠王之少子也。”“大圣烈祖玄元皇帝”即老子。唐朝皇帝姓李，自称为老子后裔，尊老子为圣祖，屡加尊号。<sup>①</sup>因李洪为唐宗室，故而同样奉老子为祖先。

文中的“邠王”为李守礼，章怀太子李贤次子。本名光仁，垂拱初改名守礼，两《唐书》均有传。李贤因反对武后而被流放巴州，守礼与睿宗诸子一同被幽禁宫中十余年。以中宗遗诏进封邠王，曾历任幽、虢、陇等六州刺史，开元九年（721年）以后还归京师。史载守礼身份显贵，生活逸乐，挥金如土。开元二十九年（741年）薨，年七十余，赠太尉。史传记载“守礼以外枝为王，才识猥下，尤不逮岐、薛。多宠嬖，不修风教，男女六十余人，男无中才，女负贞称”<sup>②</sup>，评价颇低。子嗣确实成就不显，《新唐书·宗室世系表》载有名姓官爵者19人，史传记有行述者4人。长女封金城公主，景龙三年（709年）出降吐蕃赞普赤德朱丹。子承宏为广武王，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入寇京师，立承宏为帝，吐蕃退走后代宗在长安登基，诏放承宏于华州，不久即死。承宁封嗣邠王。燉煌王承采拜宗正卿，从肃宗至灵武，与将军仆固怀恩使回纥请兵，纳回纥公主为妃，得回纥出兵相助。至德三载（758年）薨，赠司空。<sup>③</sup>其余诸子中，承骞任秘书少监（从四品上），此外都是王府谏议参军（正五品上）、友（从五品下）等属官，属于员外虚职。<sup>④</sup>考古出土《大唐邠王故细人渤海高氏墓志》<sup>⑤</sup>一方，李守礼书，志主高淑媗是目前唯一可知姓名的邠王妃妾，育有一子名承宽。李洪其人不见于史籍记载，可略补两《唐书》之阙。

唐代宗室成员的联姻对象基本都是皇亲、勋贵或世家大族，借由婚姻关系不断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范围和影响力，从而使自己的政权更加巩固。宗室成员婚姻对象的选择同时也是其政治地位和享有特权的体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与皇帝血缘关系

的远近。虽然唐代宗室成员无论远支还是近支均选择高门士族作为联姻对象，但近支往往可以选择勋贵名臣，远支得配权门的几率就要小得多。志文记载，“夫人河东裴氏，故范阳郡副持节，沧、定等州刺史讳休贞之次女也。”根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河东裴氏为凤姓，颛顼后裔。家族自东汉兴起，历数百年而不绝，西晋时期河东裴氏成为海内望族，至唐代达到家族的第二个政治高峰。有唐一代裴氏家族人才辈出，仅宰相就有17人之多，居唐代氏族之最。<sup>⑥</sup>由2007年洛阳发现的《唐裴府君夫人李氏墓志》<sup>⑦</sup>可知，李洪岳父裴休贞为宁远将军、易州修政府左果毅都尉裴思简之子。思简是高宗时名臣裴行俭的再从弟，万岁通天年间随将军麻仁节平定营州叛乱时战死。宁远将军为武散官，秩正五品下。休贞母李氏为“皇五从姊”，定州刺史李乞豆之玄孙女，高宗李治系乞豆兄李虎之玄孙，二人是第五代的堂姐与堂弟。虽然都是李氏宗室与河东裴氏的联姻，但李洪与妻子裴氏的身份都高于他们的祖父裴思简和祖母李氏。李氏墓志记裴休贞“外典雄郡，内执金吾”，《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河东裴氏中眷双虎支记裴思简子：“休贞，定州刺史”<sup>⑧</sup>，亦与李洪墓志中“范阳郡副持节，沧、定等州刺史”的记载相吻合，并可互补记载之阙。沧州、定州并为上州，刺史官秩为从三品；幽州范阳郡属大都督府，范阳郡副持节即范阳郡节度副大使，<sup>⑨</sup>掌管一方兵政，堪称位高权重。邠王李守礼与唐玄宗是嫡亲的堂兄弟，血缘联系更为紧密，曾任虢、滑等望州刺史和司空等高官，因此能与出身名门、官居要职的裴休贞结为儿女亲家。李氏与皇家的血缘关系相当疏远，婚配时夫君裴思简也无高官显爵，虽然家门显赫，官阶却是无足称道的。

### 三、李洪的出仕与历官

墓志首题中李洪的官称为“朝请郎试

太子洗马赐绯鱼袋蓟州司仓参军”。朝请郎是文散官，秩正七品上。唐代散官用来定章服、俸禄，劳考进叙。唐代规定，“三品已上服紫，四品、五品已上服绯，六品、七品以绿，八品、九品以青”；“鱼袋，著紫者金装，著绯者银装”，五品以下不配鱼。<sup>⑩</sup>李洪之所以能衣绯衣、配银鱼袋，可能与其宗室身份有关。“唐法，嗣郡王但加四品阶，亲王子例着绯。开元中，张九龄为中书令，奏请……邠王三男衣紫，余二十人衣绯，官亦不越六局郎，王府掾属仍员外置”<sup>⑪</sup>。

根据志文可知李洪生于开元十六年（728年），卒于贞元十五年，享年72岁。他“历官守道五十余年”，因此出仕时正当天宝年间唐王朝鼎盛之时，且年纪尚轻，甚至可能未及弱冠。李洪的第一任官职是“试太子洗马”。太子洗马，原为“先马”，是太子侍从官，为出行之先导。隋唐于司经局置洗马，亦为东宫官属。《旧唐书·职官志》：“司经局：洗马二人，从五品下。洗马，汉官，为太子前马……掌四库图籍缮写、刊缉之事。”<sup>⑫</sup>这也符合“官不越六局郎”的说法。

唐代官缺很少，出仕不易，且任官都有一定期限，不能长久连任，要守选多年才能补选下一任官，升迁也特别严格耗时。玄宗时的名相张九龄，25岁进士及第，30岁时才有机会出任从九品校书郎。五品以上官在唐代更是属于高级官员，只有不超过5%的官员可以达到这一级别。<sup>⑬</sup>李洪年纪轻轻便步入仕途，位居五品，这种待遇是当时其他普通士人无法比拟的。他仕途上的优越地位来自于“邠王幼子”的宗室身份。

李唐建国之初对宗室大加优待，诏称“宗绪之情，义超常品，宜有旌异，以明等级。”<sup>⑭</sup>武氏称帝后，李姓宗室亲党被杀者数以千计，玄宗即位同样经历了皇族内部的血腥厮杀。因此玄宗一方面拔擢有才华的普通宗室子弟，严厉限制亲王、郡王一级的上层宗室仕宦参政；另一方面优抚

武周以来受迫害的宗室人员，<sup>⑮</sup>李守礼即以外支得封亲王。上层宗室子弟入仕的主要途径是门荫，即按照爵位、与皇帝亲属关系的远近取得做官资格及相应品级。《唐六典》云：“亲王之子承恩泽者亦封郡王，诸子封郡公。其嗣王、郡王及特封王子孙承袭者，降授国公。”<sup>⑯</sup>《唐会要》：“叙阶之法，有以封爵。（谓嗣王郡王，初出身从四品下叙；亲王诸子封郡公者，从五品上；国公县公侯及伯子男，递减一等。）”<sup>⑰</sup>《通典·职官》：“龙朔二年（662年）制，诸王子嫡者封郡王，任职从四品下叙。其众子封郡公，从五品上叙。”<sup>⑱</sup>李洪“太子洗马”的试衔正是因亲王子之身份荣荫得来。

需要注意的是，李洪所任太子洗马之前有一“试”字，说明这并非实职，而是试官。试官在唐代可以表示试任某职，暂行代理，也常见于外官带京官之职，仅表示品秩。唐初设计官僚制度时，“职有常守，位有常员”，试官与员外官、检校官等都是统治者在“常员”之外另行授予的。史载武后为发展势力，“天授二年（691年），凡举人，无贤不肖，咸加擢拜，大置试官以处之。试官盖始于此也。”<sup>⑲</sup>试官初置时往往享有判事权，但由于易与实职判事相冲突，引起管理混乱，被逐步取消了判事权。

试官能够领取一定的俸禄，也可以用作迁资的依据。唐制，官职升迁必须有官资，每做一任官即可取得相应的官资等级，升迁大都“循资而授”。职官需经两考以上方为“成资”，待选年限“视官品高下以定其数，因其功过而增损之。”<sup>⑳</sup>试官虽然在正员之外无权判事，但同样可以视作官资，作为迁转的依据。

在唐代，试官与员外官等都是安置宗室成员的重要手段之一。朝廷对试官的数量严加控制，多次申明停授试官，但宗室子弟并不在限制之列。《唐会要》“员外官”条记：“员外及检校、试官、斜封官，皆神龙以后有之。开元大革前事，多已除去，唯皇亲战功之外，不复除授。”开元

二年（714年）五月敕，“诸色员外、试、检校官，除皇亲及诸亲五品以上，并战阵、要籍、内侍省以外，一切总停。”<sup>①</sup>在唐代，殿廷服务官如光禄寺官、东宫官、王府官等是员外官（包括试官）的主要供职机构，也是宗室贵戚出仕的重要途径，如昔日邠王李守礼同样经由太子洗马一职出仕。

李洪虽然凭亲王之子的身份荫官入仕，却并没能像许多宗室子弟一样以太子洗马的资历在仕途上获得进一步发展，随后竟然被外放出任“清池县丞”这个仅为从八品下的小官。<sup>②</sup>接着应辟幽州镇，“旋差摄檀州司法参军，次任司户参军”，“改授蓟州司法参军，转司仓参军”，贞元十五年卒于任上。

唐代的州府属官在刺史、别驾、司马之下设有功、仓、户、兵、法、士六曹，作为州府的行政职能部门，构成了地方行政系统的主体。其具体职责叙述如下：<sup>③</sup>

功曹、司功参军掌官吏考课、假使、选举、祭祀、祫祥、道佛、学校、表疏、书启、医药、陈设之事。

仓曹、司仓参军掌公廩、度量、庖厨、仓库、租赋、征收、田园、市肆之事。

户曹、司户参军掌户籍、计账、道路、逆旅、田畴、六畜、过所、鬻符之事，而剖断人之诉竞（与婚姻、田产等有关的民事纠纷也归司户参军事管辖）。

兵曹、司兵参军掌武官选举、兵甲器仗、门户管钥、烽候传驿之事。

法曹、司法参军掌律、令、格、式，鞠狱定刑，督捕盗贼，纠逖奸非之事，以究其情伪，而制其文法。

士曹、司士参军掌津梁、舟车、舍宅、百工众艺之事（山泽矿产等资源也在司士参军事的管理之下）。

唐代下州仅设三曹参军分理六曹事务。设司仓参军事一人，从八品下（兼掌司功事）；司户参军事一人，从八品下（兼掌司兵事）；司法参军事一人，从八品下（兼掌司士事）。六曹参军是国家各项政策法规的具体执行者，其执掌包括了国家行政

和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事务琐碎繁杂，位卑而责重，堪称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螺丝钉。而研究表明，州府各曹参军往往仕途艰难，升迁不易，这样的职位实在称不上美差。

志文中“檀州司法参军”一职前有“差摄”字样，说明这是一个“摄官”。如前所述，唐代的官僚制度经过严密设计，地方官吏也是“职有常守、位有常员”的。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地方州县官制却做不到政书中描绘的那样井然有序。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许多地区都出现了由地方长官自行选任的“摄官”，河朔各藩镇地处边远，节帅拥兵自重，更是辟属了大量摄官，形成了中晚唐颇具特色的一种政治现象。

《通典·选举典》“选举杂议”条曰：“顷年常见州县有摄官，皆是牧守所自署置。”<sup>④</sup>唐代州县摄官并非经朝廷委派，而是由地方长官自行选任，就像幕府的僚佐一样。“安史之乱”使唐王朝的社会经济遭到了极大破坏，随后各藩镇连年混战，战火所及之处，民生凋敝，十室九空。公廩田荒芜无人耕种，地方官员的俸禄随之大受影响。这些地方即便吏部有所委派，也很少有人愿意前去赴任，甚至出现了地方官吏长期缺员的现象，地方长官便自行委任摄官理事。如大和四年（830年）五月，中书门下奏：“如河北诸道沧、景、德、棣之类，经破荡之后，及灵、夏、邠、宁、麟、坊等州，全无俸料，有出身及正员官，悉不肯去，吏部从前多不注拟。如假摄有劳，望许于诸色人中，量事奏三数员，其余勒约及期限。”<sup>⑤</sup>

另一方面，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大为减弱，各藩镇长官培植私人，大量任命州县属官，随后奏请朝廷批准，为私辟的官员补授一个官衔（往往是京衔）。所谓“比来刺史之任，皆先奏州县官属”<sup>⑥</sup>，即是指此。河北诸镇自广德以降便多被安史叛将所占据，更趁唐廷忙于应对边疆战事及内部权争之机，“重加税率，修缮兵甲”<sup>⑦</sup>，“召集亡命之徒，缮阅兵仗”<sup>⑧</sup>，巩固势力

范围，形成了“属地自专”的局面，自行委任摄官的数量尤为庞大。《唐会要》载：“元和七年十二月，魏博奏：‘管内州县官二百五十三员，内一百六十三员见差假摄，九十员请有司注拟。’从之。”<sup>②</sup>藩镇节帅自行任命所辖州县三分之二的官员，朝廷也只有无奈接受。幽州镇虽然缺乏直接史料佐证，情况恐怕也相差不多。北京地区出土的唐代墓志中也常见这类摄官，如“前涿州参军摄莫州参军”李标（李洪墓志的撰文者）、“奉议郎前守瀛州长史赐绯鱼袋摄檀州长史”李藤<sup>③</sup>等。方镇节度使辟除摄官时，大多会选择自己的门生故吏或与其有裙带关系的人，私交色彩十分浓厚。因此摄官的盛行也反映了地方长官对中央权力的侵蚀。

州县摄官也有机会“转正”。《唐会要》记：“若摄官廉慎有闻，依前许观察使奏正。”<sup>④</sup>志文中有“虽渐陆之仪，尚戢其翼，而才应历试，迹亦宜迁。改授蓟州司法参军、转司仓参军，旌其能也”的记述，“渐陆之仪”出自《周易》五十三“渐”卦，艮下巽上，讲循序渐进之意。“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戢，收敛。借指李洪虽然职位不高，但政绩良好，经过考课应当升迁。这说明李洪在蓟州所任官职是经吏部所授的实职，也反映出当时认为从摄官进入朝廷正式官员序列是一种“升迁”。

志文中记述李洪的仕宦经历颇为耐人寻味。他以宗室贵戚的身份荫入仕，起家即任从五品下的官职；随后却被外放为清池县丞，且终此一生所任职事官的品级再也没有得到升迁。志文中并未提及李洪仕途坎坷的原因，从铭文中“奈何一旦，奄终三语”的感慨来看，很可能是出于某种突然的变故。“安史之乱”正爆发于李洪入仕后不久，唐王朝的政治经济都因此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安史之乱”后，国家的政局发生了深刻变动，宗室子弟已经不像之前那样容易凭借出身谋取高位，普通宗室更是以科举作为主要的入仕途径。李洪作为宗室疏属，在战乱平定后便很难

维持原有的特权和地位。至于李洪被外放是否和兄长承宏的称帝与流放身死有关，他选择幽州地区安身与岳父裴休贞家族在此地的势力人脉有无关系，以及他本人在建中之乱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经历等疑问，都因缺乏史料记载而无从考证了。

#### 四、墓志中涉及的地名

“安史之乱”后的幽州镇自唐广德元年（763年）肇始，至后梁乾化三年（913年）被后唐攻灭，存在时间长达150年，长期辖有幽（治蓟县）、涿（治范阳）、蓟（治渔阳）、瀛（治河间）、莫（治莫县）、檀（治密云）、妘（治怀戎）、平（治卢龙）、营（治柳城）九州之地。<sup>⑤</sup>

清池县为紧县，沧州治所在。唐前期幽州范阳节度使下辖九军，其中横海军六千人驻扎在沧州城内，然天宝后废，至大历中恢复。“安史之乱”后，沧州并未在幽州镇的势力核心之内。檀州密云郡，本隋之安乐郡，分幽州燕乐、密云二县隶之。武德元年（618年），改为檀州；天宝元年（742年），改为密云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檀州。是抵御北方奚、契丹的战略要地，也是幽州重要的屯粮之所。蓟州渔阳郡，开元十八年（730年）割幽州渔阳、玉田、三河置。以户口记等第，二州均为下州。撰文人李标与李洪长子季则均供职于莫州。莫州文安郡，上州，本瀛州之郑县，景云二年（711年）于县置郑州，开元十三年（725年），以“郑”字类“郑”字，改为莫州，与瀛州是幽州镇经济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莫县为紧县，故季则的官秩应为从九品下，是唐代官阶的最末一级。

志文云李洪夫妇葬于“幽都县西吊虞之原”，幽都为建中二年（781年）取罗城内废燕州廨署置，管郭下西界，与蓟分理。夫人裴氏卒于“涿州固安县太平里之私第”，涿州本为幽州之范阳县。大历四年（769年），幽州节度使朱希彩奏请于范阳县置涿州，



仍割幽州之范阳、归义、固安三县以隶涿，属幽州都督。太平里之名此前不见研究记载，可补幽州地区里坊名称之阙。

①（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高宗纪》载“唐高宗乾封元年二月己未，次亳州。幸老君庙，追号曰太上玄元皇帝，创造祠堂”，中华书局，1975年，第90页。《旧唐书·礼仪志四》载：唐玄宗天宝二年正月丙辰，加玄元皇帝尊号“大圣祖”三字；天宝八载闰六月四日，玄宗朝太清宫，加尊号曰圣祖大道玄元皇帝。见第926、927页。

②《旧唐书·李守礼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833页。

③①《旧唐书·李守礼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834页。

④（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宗室世系表》，中华书局，1975年，第2132—2135页。

⑤郭洪涛：《唐邠王守礼书〈大唐邠王故细人渤海郡高氏墓志之铭〉释读》，《洛阳大学学报》17卷第1期，2002年3月。

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华书局，1975年，第2179—2244页。

⑦赵振华、王倩文：《〈唐裴思简夫人李氏墓志〉研究》，《唐山师范学院学报》第33卷第1期，2011年1月。

⑧《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华书局，1975年，第2212页。

⑨《旧唐书·地理志》：“范阳节度使，临制奚、契丹，统经略、威武、清夷、静塞、恆阳、北平、高阳、唐兴、横海等九军。理幽州，管兵九万一千四百人。开元十三年，升为大都督府。天宝元年，改范阳郡。乾元元年，复为幽州”，中华书局，1975年，第1837页。范阳郡副持节即范阳节度副大使，如颜真卿《唐故右武卫将军赠工部尚书上柱国上蔡县开国侯臧公神道碑铭》：“公兄左羽林军大将军平卢副持节怀亮”。

⑩（宋）王溥撰：《唐会要》“章服品第”条、“鱼袋”条，中华书局，1955年，第569、580页。

⑪《旧唐书·职官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1908页。

⑬⑮刘志超：《论唐代前期宗室参政》，上海

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⑭《唐会要·宗正寺》，中华书局，1955年，第1141页。

⑯（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尚书吏部》“司封郎中”条，中华书局，1992年，第37页。

⑰《唐会要》“阶”条，中华书局，1955年，第1493页。

⑱（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职官·历代王侯封爵》，中华书局，1988年，第869页。

⑲《通典·职官·历代官制总序》，中华书局，1988年，第471页。

⑳《新唐书·选举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1174页。

㉑《唐会要》“员外官”条，中华书局，1955年，第1176、1179页。

㉒据《新唐书·地理志》，清池为紧县。《唐会要》“量户口定州县等第”条：赤、畿、望、紧县不限户数，并为上县。《旧唐书·职官志》：“诸州上县：令一人，从六品上。丞一人，从八品下。”

㉓《唐六典·三府督护州县官吏》，中华书局，1992年，第746—749页。

㉔《通典·选举·杂议论下》，中华书局，1988年，第449页。

㉕《唐会要·选部》“吏曹条例”条，中华书局，1955年，第1351—1352页。

㉖（清）董诰等编：《全唐文·肃宗申戒刺史考察县令诏》，中华书局，1983年，第474页。

㉗《旧唐书·田承嗣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838页。

㉘《旧唐书·李宝臣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866页。

㉙《唐会要·选部·杂处置》，中华书局，1955年，第1615页。

㉚高智伟：《唐李府君墓志考》，《北京文博》2009年第1期。

㉛《唐会要·选部·南选》，中华书局，1955年，第1371页。

㉜冯金忠：《唐代幽州镇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

（作者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馆员）

# 金《武德将军幢记》相关问题再辨

王玉亭

《东北史地》年初<sup>①</sup>发表了署名马垒的一篇文章，即《龙泉雾金代武德将军尊胜经幢考》（以下简称“马文”），对于现存于北京门头沟区龙泉务村村委会院内的金代武德将军经幢作了研究。文章虽有一些考释性的论说，但是，在许多方面都还存在着因理解上的偏差而产生的判断失误，对于此幢，特别是对于“马文”的错断，笔者认为有再辩说的必要，故再作文如此，请方家指教。因《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下）》<sup>②</sup>（以下简称《图志（下）》）对于此幢命名为较为简洁的“武德将军幢记”六字，故笔者即以此称之。

## 一、幢主的身份问题

武德将军幢是子为父所立，幢主是金代一位低级官吏，因为石刻字迹漫漶，所以失去其名姓，姑且以“幢主”称之。在“武德将军”这一官职上，“马文”在理解上出现了失误，所以基于此的考释都成为缘木刻舟之举，这也是笔者提出商榷意见的主要目的。概而言之，金代的武德将军不是实职，而是武散官，这一点《图志（下）》<sup>③</sup>已经正确说明，可惜“马文”没有重视。金代武散官，是部分官员的某一阶段的官品，是武资，这一点《金史》交代得很清楚，即《百官一》所记的武散官自正三品以下有34阶，“正六品上曰武节将军，下曰武德将军。”<sup>④</sup>散官是散官，实职是实职，不可混淆。幢主的武散官是六品下的武德将军，实职是一系列的“监当官”。具体地说，幢主经历过某商酒监、中京鞠院监、德州鞠酒监等等，这些才是他的实职。对于金代的监当官，关树东先生有专文论述，对

于监当官的身份关先生考证云：“金代主要由武资官担任的监当官，总体上属于低级官员群体。”<sup>⑤</sup>武德将军就是这种“武资官”。单凭一个“武德将军”这种“武资官”名，绝不会断定出他“是一位在中都政界影响较大的历史人物”，也不能据此判定他“在征讨叛贼战争中表现出来的一身正气，奋勇杀敌的精神，以及在战场上的远见卓识和超强的领导能力……”。另外，幢文所称“慷慨大度”也不是指向幢主，而是述说其父“六宅使君”。观察幢主的所历官职，可以说他跟战场根本就没沾边。所以由此而得出的“适逢辽末金初（于）乱世，武德将军也许在金灭辽及其他的战争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结论，也是失当的。发生这种失误的主要原因是“马文”对于金代官制理解有误所致。

## 二、武德将军幢出现另外几个官称的分析

《图志（下）》、“马文”对于武德将军幢的文字释读各有所得，但是，在官名上都有理解上的偏差，如，《图志（下）》把“南染院使”误释为“南沛院使”；对于“皇城使”处没有辨出。“马文”错将“六宅使”释读为“六宅佛”。

皇城使、染院使、六宅使等“诸司使”都出自唐末五代制，阎步克先生认为：“唐后期职事官持续、剧烈地品位化，最终导致了省部监寺体系的整体性变质，在宋初变质为一套‘本官’序列”<sup>⑥</sup>，宋代在元丰改制前诸司使的武官都作武官转迁之序，<sup>⑦</sup>在辽代也大量保留，同样作为武官“本品”使用（笔者有《辽朝官员的本品、使职与

阶等问题再探》，待刊）。在官制上，许多方面金袭辽制，所以在官称上也存在着“诸司使”。按照《金史》里的记载，部分诸司使为职事官。如宣徽院属司、太府监、少府监、兵部等。<sup>⑥</sup>

“马文”将六宅使的“六宅”理解为佛教“六斋”，明显是错误的，显然是受自己释读“承父六宅佛”的错误引起的，在这一点上，《图志（下）》的释读为“六宅使”是正确的。

尽管石刻字迹漫漶且残缺不全，但是也可以分析出幢主的简单历官情况，即：幢主的烈考的官为“六宅使”，幢主“承父之六宅使”荫，授为（“荫授”二字为《图志（下）》释出）某官，是为其初仕；接着，幢主历经几任监当官，如某商酒监、中京鞠院监、德（或为儒）州鞠酒监等，某年转迁为皇城使，特加某某将军，<sup>⑦</sup>任满，授南染院使，迁武德将军。

从武德将军幢刻文看，其最后获得的武散官是武德将军，与这个武资相伴的是皇城使；其上一阶武散官或为武义将军，与之相伴的是南染院使。

### 三、武德将军幢的性质问题

第一，此幢是一座陀罗尼经幢，具体地说是一座“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有文字的部分是幢体，幢体八面，两面镌刻汉字，六面镌刻梵文经文。

第二，“马文”对于武德将军幢被命名为“墓幢”有所质疑，笔者认为此幢完全可以命名为墓幢。其八面经文，两面为汉字，是典型“前经后记”的形式，这种形式与辽代墓幢同出一辙。<sup>⑧</sup>另外，有关幢主的文字内容与一般墓志铭毫无二致，就是说，立幢人在经幢上镌刻了一篇完整的墓志。这一墓志交代了主人的出身和家世，重点对于主人荫授得官、武资转迁、监当官的经历等作了详述；最后，还如辽代墓志铭一样刻意撰写了古意很浓的“铭”，“马文”错把“铭”这个部分说成是“幢后附

古诗一首赞其高行”。

关于“墓幢”，《图志（上）》在《概说》中有说明，<sup>⑨</sup>但是，这一说明只是从塔与幢的区别的角度来判断的，在此，笔者以为，经幢兼刻有墓志的更符合“墓幢”这一定义。这种“立幢述记”的形式与辽代极其相似，笔者推测，这座幢本来就立在这位武德将军的墓边，一方面起到墓表的作用，一方面又有尘霏影覆、灭罪生天<sup>⑩</sup>的功效。

①《东北史地》2013年第1期。

②③梅宁华主编：《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下）》，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7月，第95页。

④《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7月第1版，第1221-1222页。

⑤刘宁、张力主编：《辽金历史与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辽宁教育出版社，2012年5月，第693页。周峰的《金代酒务官初探》（《北方文物》，2000年第2期）对于金代酒务官有专论。

⑥阎步克：《中国古代官阶制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299页。

⑦参见《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第4029-4038页；龚延明《宋代官制词典》（中华书局，1997年4月）之《宋代官制总论》部分。

⑧《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7月第1版，第1256-1289页。

⑨《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上）》（梅宁华主编，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9月），第248-249页拓片图，此处模糊不清，但字间距约为四字，“马文”错断为“武德将军”。

⑩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4月，第1页。

⑪《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上）》，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7月，第2页。在刘淑芬《灭罪与度亡——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9月）一书中有墓幢之专论，见第122-196页。

⑫《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4月，第53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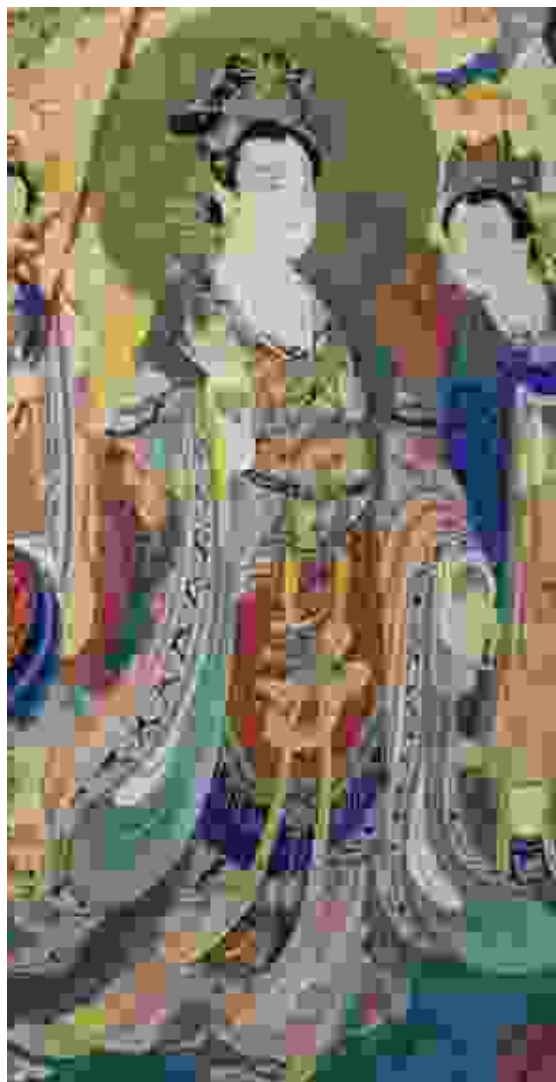
（作者为内蒙古赤峰巴林左旗政协文史委主任）

# 白塔寺

## 诸天造像

### 名称考辨

孙涛



诸天神灵信仰起源于古印度，根据佛教典籍《金光明经疏》中的记叙：“外国呼神名为天”，因此，诸天就是诸多神灵的简称，这些神灵多数为婆罗门教中的神灵，后又将本土宗教中的神灵乃至地方神祇纳入了诸天神灵体系，其在佛教中“为护法之天神，兼施福之神性”<sup>①</sup>。而中国对诸天神灵的信仰，在一些早期的石窟造像中就有体现，例如云冈石窟第八窟中就出现了刻有自在天和那延罗天的神像，这两位神灵都曾出现在诸天神灵体系中。时至今日，诸天神灵信仰经过千年的发展和积淀，已成为中国佛教神灵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各时期、各地区、各教派都有雕塑或绘制诸天神灵，用以供奉祈福，同时还具有教化世人的功用。

白塔寺七佛宝殿内就展出了一组 18 尊明代铜鎏金诸天造像，造像做工精细，雕刻细腻，人物刻画生动传神，栩栩如生，为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但由于这组造像原属拈花寺，并非白塔寺旧藏，且造像历经五百多年的岁月变换，所持法器无存，致使这组诸天造像的原有定名存在许多待商榷的地方，现依据历史资料、佛教经典的记叙和各地诸天在雕塑和壁画中的形象特点，对这组诸天造像重新加以考辨和定名。

## 一、诸天造像的神灵构成

白塔寺这组诸天造像原陈列于拈花寺。根据原寺庙遗存《新建护国报恩千佛寺宝像记》碑的记载：“御马监太监杨君用受偏融上人指，铸毗卢世尊，莲花宝千佛旋绕四向，若朝者然；铸十八罗汉、二十四诸天尊，复塑伽蓝、天王等像。……工始于万历庚辰，浹岁而告成。”<sup>②</sup>这组造像铸造于万历庚辰年（1580年），一年后完成。其数量也并非现在白塔寺陈列的十八诸天，而应是二十四诸天。

南宋僧人行霆撰写的《重编诸天传》中，对诸天的神灵构成加以认定。他认为诸天“自古列十六天像者”，其后“添为二十位者”<sup>③</sup>。即大梵天、帝释天、四大天王、大辩才天、大功德天、摩醯首罗天（大自在天）、摩利支天、坚牢地神、菩提树神、鬼子母天、金刚密迹、散脂大将、韦驮天十六位加上日天、月天、婆竭罗龙王、阎摩罗天共二十位。在清代僧人弘赞所撰写的《供诸天科仪》中又针对诸天神灵组合提出自己的见解，但上述二十位仍被认定应作为诸天神灵加以供奉。由此可见，在南宋至明末清初这段时间内，这二十位神灵作为诸天组合中的成员是得到各地认同的，因此，这组造于明代万历时期的诸天造像中此二十位应该存在。

明朝时期，道教非常盛行。佛教为了传播教义，又在原有二十诸天的基础上，扩充到二十四诸天，其中加入了道教中的神灵。其构成方式就是在二十诸天外，再加上佛教的紧那罗天，及道教的东岳大帝、紫微大帝和雷神。而在白塔寺这组诸天造像中，就发现了体貌特征十分明显的雷神。根据明代碑文记载，此寺为冯保“仰承圣母皇太后圣意，为今上皇帝祝禧锡羨”<sup>④</sup>而建造，所以，紫微大帝作为皇帝的象征也有极大可能出现于此组诸天造像中。

另外，周叔迦先生所著的《二十四诸天考》中，明确写到“今据北京拈花寺二十四诸神位所列，是于二十诸天外增紫

微大帝、东岳大帝、雷神、紧那罗王四天”<sup>⑤</sup>。周叔迦先生出生于1899年，而拈花寺诸天造像于解放后才被挪于它地安放，并且，周叔迦先生对于佛学非常精通，是现代中国著名的佛学家、佛教教育家、佛教文化学家，因此，周叔迦先生对于这组诸天造像神灵构成的认定是可信的。

据此，这组诸天造像应是明朝中后期盛行的二十四诸天组合形式，即以传统二十诸天加上紫微大帝、东岳大帝、雷神、紧那罗王四天。

而未见于白塔寺的六尊诸天造像，其中四尊有据可查，为四大天王造像（因这四尊诸天造像身着盔甲，为武将形象，手持蛇、伞盖、宝剑和琵琶等法器，符合四大天王造像特征，且从其放置于天王殿和调拨时所用的文物名称，其四大天王的定名毋庸置疑），现陈列于北京西城区法源寺的天王殿内。而剩下的两尊尚无确切陈列地点和调拨证据。

## 二、诸天造像的定名

白塔寺诸天造像的神灵构成方式确定后，下面将对诸天造像逐一考辨。

为了表述的方便，在此将十八尊诸天造像分别编号。东侧最北端造像编号为东1，其后依次排序，东侧最南端造像编号为东9；同理，西侧最北端造像编号为西1，其后依次排序，西侧最南端造像编号为西9。

而本文将从西9造像开始，以顺时针方向逐一叙述，到东9造像结束。

西9造像一面两臂，左手举于胸前，结施无畏印；右手自然垂下，拇指与食指指尖相触。这一切与“功德天像，身端正，赤白色，二臂画作种种瓔珞，环钏，耳珰，天衣，宝冠，左手当持如意珠，右手施咒无畏”<sup>⑥</sup>的记叙十分相似。法海寺壁画和首都博物馆藏清代水陆画也表现了这些特征。另外，清初弘赞和尚所著的《供诸天科仪》中，还描述“若功德大辩，但客寄耳。功德寄北天，大辩寄山泽”<sup>⑦</sup>。这段话说明

		
<p>西 9 造像</p>	<p>北方多闻天王造像 (现存法源寺天王殿)</p>	<p>法海寺大功德天绘画</p>
		
<p>西 9 造像的头冠</p>		<p>首都博物馆藏清代水陆画 大功德天绘画</p>
		
<p>西 8 造像</p>	<p>西 8 造像的头冠</p>	<p>首都博物馆藏清代水陆画 紧那罗天绘画</p>

了功德天的居住地位于北方多闻天王的领地内，巧合的是法源寺内北方多闻天王造像的头冠内容也与西9造像的头冠内容基本相同。由此推断西9造像的名称应为大功德天。西8造像头戴七梁冠，身着盔甲，面容安详，呈中年武将形象。根据《重编诸天传》的记载以及法海寺壁画等诸多文物遗存所描绘的内容，经常呈现武将形象的诸天有四大天王、韦驮天、散脂大将。四大天王已被确定安置于法源寺内，散脂大将一般呈现忿怒状且手持长柄武器，不符合西8造像的特点。而韦驮天一直以英俊的年轻武将形象出现，不似西8造像中年男子的形象。而新增的四个诸天中，雷神和紧那罗也经常呈现武将形象。雷神的形象根据记载，有着鸟嘴、双翅、利爪等特征，这些特征西8造像都不具备，而仅余下紧那罗尚未确定。西8造像的发色根据一些残存的颜料可判断为蓝色，可见其属于静相神灵，而紧那罗天又称为“乐天”、“歌神”，是音乐之神，属于典型的慈悲安详的静相神灵范畴，如首都博物馆所藏清代水陆画中的紧那罗形象。另外紧那罗天是佛教天龙八部之一，宗教地位相比其他诸天要低一些，而西8造像的头冠为七梁冠，对比其他戴九梁冠的诸天神灵，宗教地位明显较低。因此，西8造像的名称可推断为紧那罗天。

西7和西4两尊造像形象类似，均为贵妇装束，且手姿均为捧物形式，属于成对出现的神灵造像，而符合上述这些特点的，在二十四诸天中只有坚牢地神和菩提树神这两位神灵。因两尊造像的差异点很少，所以，将在此一并探讨。

在头饰上，西7造像左右头饰为云托日月，西4造像左右头饰为莲花。根据大慧寺坚牢地神雕塑的造型特点，会发现坚牢地神头正中配莲花头饰、左右配云托日月头饰，而西7造像的头部正中有残损，根据痕迹判断原有很大的冠饰，再加上两侧配日月头饰，都与大慧寺坚牢地神造像相似。大慧寺菩提树神配凤冠，两侧的配

饰为盛开的莲花头饰，而西4造像左右两侧的头饰正是莲花。且西4造像的发型与大慧寺菩提树神的发型非常相似，皆将所有头发一起向后梳理；而西7造像的发型与大慧寺坚牢地神较为一致，为左右两侧头发向脑后中心梳理，而正中的头发向后梳理。

除了上述头饰和发型的变化外，这两尊造像在两手之间的距离上和手姿上还有着非常细小的变化。相对来说，西4造像比西7造像两手距离要长，西4造像右手中指和无名指下弯形成一个圆环，而西7造像右手手指虽有损坏，但其残存描绘有指节，并在其上还有一小段，如果手指弯曲不能作此表现，可见西7造像右手五指均为向上姿势。因此，能判断出西4造像的持物是从右手手指形成的圆环中穿过的，而西7造像持物是依靠在右手手掌中的，这点通过西7造像右手食指上的楔孔也得到印证。而通过这一时期的壁画以及一些雕塑作品反映出坚牢地神一般手持弯曲麦穗枝，而菩提树神持扇子状菩提树枝。在考证法源寺四大天王造像时，发现此组诸天造像的持物材质均与造像自身材质相同，为铜材质，如此一来，如果做成扇子状菩提树枝必然有上重下轻的现象，也就要求两手的距离要长，使得下部重量相对增大，保持平衡。上面持物的右手还要有一些固定措施，而浅浅的楔孔肯定满足不了这一要求，反而纤细的弯曲麦穗枝，更符合简单固定的条件。同时，如果右手手指弯曲成环，反而会造成麦穗枝弯曲角度不够，整体美观度下降。

另外，还有一点区别也有助于对造像名称的判定。根据佛教典籍的记述，二十四诸天在佛前有两种排列的顺序，一种是象征“佛会”时礼佛的排列，一种是象征“金光明道场”的排列。<sup>⑥</sup>无论哪种排列方法，菩提树神和坚牢地神这对对应出现的神灵，都是分开安放的。通过考证已知的大量文物遗存可以发现，以正中佛像为参照，坚牢地神基本上都是位于正中佛

			
<p>西 4 造像</p>	<p>西 7 造像</p>	<p>西 4 造像的头饰</p>	<p>西 7 造像的头饰</p>
			
<p>西 4 造像的手姿和楔孔</p>	<p>西 7 造像的手姿和楔孔</p>	<p>西 4 造像胸前项链的纹饰</p>	<p>西 7 造像胸前项链的纹饰</p>
			
<p>法海寺壁画菩提树神持物</p>	<p>法海寺壁画上的坚牢地神</p>	<p>大慧寺坚牢地神造像</p>	





大慧寺菩提树神（正中神灵为菩提树神）  
头冠明显可以看出两侧配饰非日月



云居寺菩提树神造像，左数第三位为菩提树神

像的左侧，与日天等同行列；而菩提树神位于正中佛像的右侧，与月天、阎摩罗天等同行列。而在此组诸天造像上，日天和月天这对同样对应出现的神灵，其下装的系扣有着明显差异，这种差异也同样出现于西4和西7这两尊造像上。西4造像贴近腰带部位没有系扣，与被推断为月天的东4造像相同；而西7造像系扣，与被推断为日天的西3造像相同。通观这组诸天造像，同样贴近腰带部位没有系扣的造像还有被推断为阎摩罗天的东6造像，而阎摩罗天与菩提树神在同一行列中（详见下文将讨论到西3、东4、东6三尊诸天造像）。

结合上述分析，可以推断西7造像的名称为坚牢地神。西4造像的名称为菩提树神。

西6和东2两尊造像均为多臂形象，根据佛教经典中的描述，除了带有猪面的摩利支天外，只有大辩才天和摩醯首罗天为多臂形象。两尊造像的手持物已全部缺失，仅头戴的冠饰细节有所不同。其中，西6造像冠饰为卷草纹，头冠正面正中有半开的莲花图案，两侧还各有一只摩羯龙面朝头冠正中。摩醯首罗天在印度神话中为湿婆，头接恒河之水，可见湿婆是掌控水之神。中国佛教经典《华严经》记叙摩醯首罗天“能知大千雨滴之数”<sup>⑧</sup>。这都说

明摩醯首罗天与水分不开，而龙正是传说中在水中最为尊崇的动物，代表着掌控水的能力。另外，在一些口头传诵中，西方广目天王是摩醯首罗天的化现，是龙的首领。而在这组诸天造像中，西方广目天王的头冠正面完全与西6造像一致，符合上述传诵中的描述。据此，可推断西6造像的名称为摩醯首罗天，而东2造像的名称为大辩才天。

西5造像面容慈祥，身配璎珞，双手合十于胸前，为女性菩萨造型。在此类二十四诸天造像中，根据佛典的记载，常作女性形象的共有8尊神灵。除了特征明显的摩利支天和前述已经定名的5尊诸天神灵，鬼子母常作贵妇形象，不符合西5造像特点，仅余帝释天未有确定。且西5造像双手合十的样貌、虽残缺但仍可推断出的华丽头冠，也与大慧寺内的帝释天雕塑十分相似。因此可推断西5造像的名称为帝释天。

西4造像前述已做出判断，不再赘述。

西3和东4造像均为头戴九梁冠，冠饰中均只有一个非常大的圆形位于头冠正中，有别于其他头戴九梁冠造像的两个小圆形位于头冠左右。这种圆形图案在佛教装饰上一般代表日月，有着阴阳和谐的隐喻在里面。因此西3和东4两尊造像应是

		
<p>东 2 造像</p>	<p>西 6 造像</p>	<p>法源寺存的西方广目天王</p>
		
<p>西 6 造像背后的冠饰</p>		<p>西 6 造像头冠中的摩羯龙造型</p>



日天和月天这对神灵。西 3 造像的头冠中如意云头纹正置，圆形两侧装饰如意纹；东 4 造像的头冠中如意云头纹倒置，圆形两侧装饰团云纹。在中国传统中，正置一般代表阳，倒置一般代表阴；而用如意纹衬托的圆形代表日，而用团云纹衬托的圆形代表月，这也在大慧寺的大辩才天造像手上的日月雕塑上得到验证。另外，东 4 造像在一些细节的刻画上非常与众不同，显得女性化以及神灵等级低于其他戴九梁冠造像。如造像两侧飘带做弯曲向上状，这一般是在女性神灵和忿怒神灵上更多出

现。服饰下装中部系带的装饰上，西 3 造像贴近腰带部位有系扣，而东 4 造像没有；西 3 造像膝盖部位飘带系三个扣节，而东 4 造像没有。因此可推断西 3 造像的名称为阳性形象的日天，东 4 造像的名称为阴性形象的月天。

西 2 造像鼻翼两侧有明显的须状雕刻，与鱼类的触须非常相像。另外，头冠的两侧有明显向上的发簇，这些特点在大慧寺龙王雕塑和首博藏万历水陆画龙王形象上都得到了体现。因此西 2 造像的名称可推断为婆竭罗龙王。

		
<p>西 5 造像</p>	<p>西 5 造像残缺的头冠正面</p>	<p>西 5 造像背面的冠饰</p>
		
<p>大慧寺帝释天雕塑</p>	<p>东 4 造像</p>	<p>西 3 造像</p>
		
<p>大慧寺大辩才天手上的日月雕塑</p>		

		
<p>西 2 造像</p>	<p>首博藏万历三十七年 (1609 年) 水陆画龙王绘画</p>	<p>大慧寺龙王雕塑</p>
		
<p>龙王两侧向上直立的发簇</p>	<p>龙王类似鱼类的触须</p>	

	
<p>西 1 造像</p>	<p>西 1 造像安装竖板的楔子和楔孔</p>

西 1 造像因为冠帽上尚可见安装竖板的楔子和楔孔，可推断为头戴冕旒冠的帝王形象。在中国古代对于冕旒冠的使用有着严格限制，而考虑二十四诸天中，能佩戴冕旒的有阎摩罗王、婆竭罗龙王、紫微大帝、东岳大帝这四位神灵，东岳大帝一般是作为苍老帝王形象出现，而非西 1 造像的中年帝王形象，此组诸天造像中阎摩罗王（详见下文中的东 6 造像）和婆竭罗龙王并未佩戴冕旒冠，而使用了九梁冠，所以，佩戴冕旒冠的此尊造像必然有其特殊含义。中国古代认为天皇应住在天宫里，天宫又叫紫微宫。人间的皇帝自诩为天子。因此紫微大帝代表着皇帝，结合此组诸天神像是在道教盛行、佛教尚未复兴的万历初期，而出资建造这座寺院和这组造像的是慈圣

皇太后，为的是为万历皇帝求子祈福，而将代表帝王的诸天造像区别于其他诸天造像，从而凸显帝王的崇高地位和无上威严，也符合建造寺院和这组诸天造像的宗教目的。据此可推断西 1 造像的名称为紫微大帝。

东 1 造像戴凤冠，面露笑容，着贵妇装，双手合十。在法海寺壁画、万历水陆画和大慧寺诸天雕塑中，鬼子母基本都是以此形象出现，除了造像的手姿会有微小改变。因此可推断东 1 造像的名称为鬼子母。

东 2 造像前述已做出判断，不再赘述。

而在一系列诸天造像和壁画中，可以直观地看到大梵天基本不戴冕旒冠，一般是以梁冠的样式出现。而东 3 造像就符合这一特点。四川平武报恩寺壁画中的大梵

		
<p>东 1 造像</p>	<p>首博藏万历三十七年（1609 年）水陆画鬼子母绘画</p>	<p>东 3 造像</p>
		
<p>法海寺鬼子母壁画</p>	<p>大慧寺鬼子母雕塑</p>	
		
<p>四川平武报恩寺大梵天壁画</p>	<p>四川平武报恩寺东岳大帝壁画</p>	



天形象与东 3 极为类似，且大慧寺诸天雕塑中的大梵天形象也与东 3 造像相近。因此可以推断东 3 造像的名称为大梵天。

东 4 造像前述已做出判断，不再赘述。

东 5 造像猴脸尖嘴，身着武士服，头发为红色，完全符合成书于明代隆庆、万历年间《封神演义》中对雷震子即雷神的记载，<sup>⑧</sup>清代黄斐然对雷神形象的描绘<sup>⑨</sup>也与东 5 造像基本一致。因此东 5 造像的名称可推断为雷神。

东 6 造像怒目睁视，有络腮长髯，呈现忿怒帝王形象。这种形象与法海寺壁画、四川新津观音寺壁画和山西浑源永安寺壁画对阎摩罗天的描绘完全一致。由此可推断东 6 造像的名称为阎摩罗天。

东 7 造像有三面，其最左面为猪面，符合佛教典籍对于摩利支天“身作忿怒，有三面，面有三目，一作猪面，利牙外出，舌如闪电”<sup>⑩</sup>的描述，在法海寺壁画中也得到了证实。因此东 7 造像的名称可推断为

摩利支天。

东 8 造像为力士样貌，双目圆睁，戴雕刻坐佛的花冠，袒露上身，跣足。这些与佛教典籍中对于金刚密迹“露袒其身，怒目开口，遍体赤色，以跣双足”<sup>⑪</sup>的描述十分符合。因此东 8 造像的名称可推断为金刚密迹。法海寺壁画、大慧寺金刚密迹雕塑也可证明这一观点。

东 9 造像双目圆睁，眉头紧蹙，红色头发戴发箍，身着盔甲，左手向外张开，右手持物丢失，但对比造像的手姿，可判断此尊所持应为中长带柄武器，而在二十四诸天中手持长柄武器、身着盔甲且呈怒相的神灵仅有散脂大将符合。通过对比法海寺壁画和万历水陆画中散脂大将的形象也符合东 9 造像的特点。因此东 9 造像的名称可推断为散脂大将。

至此，十八尊诸天造像已重新定名，散佚的两尊诸天造像应为韦驮天和东岳大帝。而诸天造像的重定名称排列见下表，

		
<p>东 6 造像</p>	<p>法海寺阎摩天壁画</p>	<p>四川新津观音寺阎摩天壁画</p>
		
<p>山西浑源永安寺阎摩天壁画</p>	<p>东 7 造像</p>	<p>法海寺摩利支天绘画</p>
		
<p>东 7 造像的猪面</p>		



		
<p>东 8 造像</p>	<p>法海寺金刚密迹壁画</p>	<p>大慧寺金刚密迹雕塑</p>
		
<p>东 9 造像</p>	<p>首博藏万历三十七年（1609 年）水陆画 散脂大将绘画</p>	<p>法海寺散脂大将绘画</p>

并附以原先定名以作对比：

编号	原定名称	重定名称	北	编号	原定名称	重定名称
西 1	紫微大帝	紫微大帝	三世 佛造 像	东 1	鬼子母	鬼子母
西 2	婆竭罗龙王	婆竭罗龙王		东 2	大梵天	大辩才天
西 3	东岳大帝	日天		东 3	阎摩罗天	大梵天
西 4	大功德天	菩提树神		东 4	摩醯首罗天	月天
西 5	菩提树神	帝释天		东 5	雷神	雷神
西 6	大辩才天	摩醯首罗天		东 6	紧那罗	阎摩罗天
西 7	帝释天	坚牢地神		东 7	金刚密迹	摩利支天
西 8	坚牢地神	紧那罗		东 8	散脂大将	金刚密迹
西 9	摩利支天	大功德天	南	东 9	日天	散脂大将

### 三、结语

这组诸天造像铸造于万历初年，正是明朝晚期佛教复兴的开端之时，刚刚经历过嘉靖朝对佛教的打压和抑制，佛教迫切需要复兴和再次发展，道教神灵在这组诸天造像的出现，体现了佛教在这一时期的对今后发展道路的思索和尝试，见证了佛教在这一时期对待道教、皇室以及儒教方式的转变；同时，在细节上将道教神灵塑造为神灵体系中的低等级神灵，也体现着释、道两教之间的竞争。如此相互矛盾的表现出现于一组造像上，无不反应着当时社会三教合一风潮之下三教相互竞争的复杂关系。

另外，这组诸天造像在艺术表现上既不同于永宣时期的藏传样式，也不同于明末盛行一时的头部硕大、体态臃肿的汉地佛教造像，可以说，两者的造像艺术特点都有体现、都有发挥。因此，这组诸天造像对研究这一时期的佛教造像艺术规范和图像特征也有着重大的参考价值。

希望今后会有更多有价值的资料被发掘和整理，从而使我们能更加准确地认识这组诸天造像，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这组诸天造像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成就打下坚实的基础。

①丁福保编：《佛学大辞典》，中国书店出版社，2011年7月。

②④《新建护国报恩千佛寺宝像记》碑文，碑现存北京市西城区大石桥胡同拈花寺原址内。

③⑧⑬（南宋）僧人行霆著：《重编诸天传》，收录于《大藏新纂续藏经》第88册。《大藏新纂续藏经》由河北佛教协会于2006年10月26日发行。

⑤周叔迦著：《周叔迦佛学论著集》，中华书局，2004年11月，第701页。

⑥⑦（清）弘赞和尚著：《供诸天科仪》，收录于《大藏新纂续藏经》第74册。《大藏新纂续藏经》由河北佛教协会于2006年10月26日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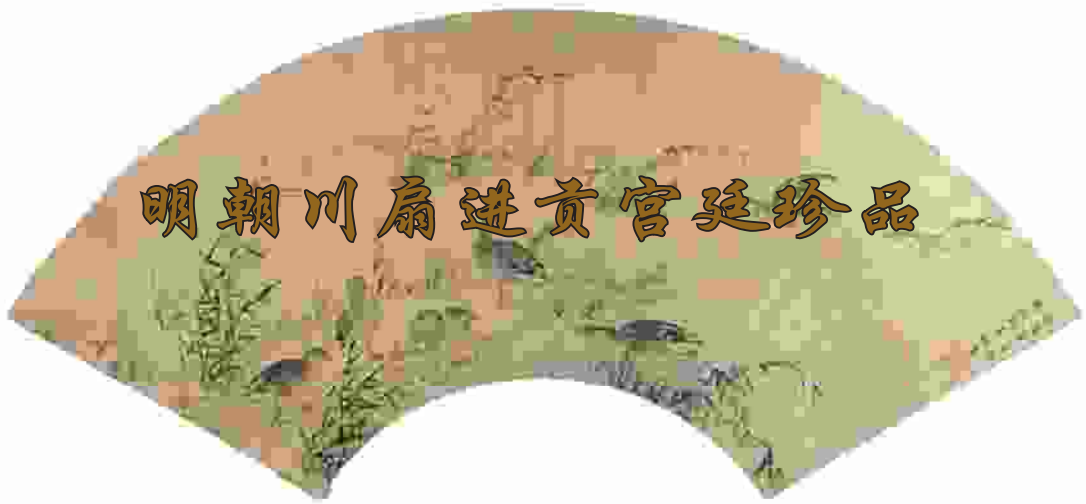
⑨（宋）僧人宗晓著：《金光明经照解》，收录于《大藏新纂续藏经》第20册。

⑩（明）许仲琳著：《封神演义》（明代万历年间金闾舒载阳刊本），书上描述雷神为：“面如青靛，发似朱砂，眼睛暴湛，牙齿横生，出于唇外；身躯长有二丈。”

⑪（清）斐然著：《集说论真》（光绪己卯年镌），书上描述雷神为：“今俗所塑之雷神，状若力士，裸胸袒腹，背插两翅，额具三目，脸赤如猴，下颏长而锐，足如鹰鹞，而爪更厉。左手执楔，右手执槌，作欲击状。”

⑫（宋）僧人天息灾译：《佛说大摩利支天菩萨经》卷一，经文收录于《大正藏》。

（作者为北京白塔寺管理处业务部主任）



## 明朝川扇进贡宫廷珍品

刘精义 刘燕平

明代都城北京是全国政治、文化与财政的中心，同时，也是一个十分繁荣的商业大都市。京城所需百物大都从全国各地输送而来。尤其是最高封建统治者所需的各种原料、物品及重要的奢侈消费品等，都是从中华帝国辽阔的各行省和遥远的地方，封建政府用征收地方实物的办法，把全国各地最好的名特产搜罗到皇宫、内府，明朝地方府、州、县每年或数年要向中央王朝贡献地方名特产，实质上与交纳钱粮与赋税是一样的性质，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在明朝，各地用于进贡皇帝的著名特产有：江西的瓷器、江浙的绸缎、关中的绒料、山西的潞绸、云南的贡金、广东的珍珠、云南的颜料及四川的贡扇等。

明朝四川地方的贡物中，以折扇是有名的物品之一，因此名叫四川贡扇。

中国自古无折扇，元人王恽《秋涧集》中曾记载：“元初，东、西夷使臣手持聚头扇，当时人皆讥笑之”。到了明永乐年间，由于朝鲜国进贡折扇，才逐渐被使用。明代皇帝喜悦折扇样式新颖，有舒展方便的特点。展之广尺余，合之两指许，可收可放，

携带方便，最适于夏月使用。明宣宗曾有赞美的诗一首：“湘浦烟霞文翠，剡溪花雨生香。扫却人间烦暑，招回天下清凉”。明朝皇帝爱其优异，命内府工匠如式制作，一部分以供宫廷赏赐。从此全国各地开始流行使用折扇，中国传统的团扇逐渐衰微。

折扇在当时又称“聚骨扇”、“折叠扇”、“聚头扇”。京师人称“撒扇”。各地的折扇又以四川制造的为最佳。渐渐形成当地名产。川扇，其精巧雅致则宜士人，其华丽则宜侍女。至于雕刻正龙、侧龙、百龙、百鹿、百鸟之类，更是栩栩如生，这样精工巧作的川扇尤为宫廷所欣赏和喜爱。明宫皇后、妃嫔所用的名贵川扇，每柄竟价值黄金一两。进贡的川扇就更是巧夺天工，精致多彩。以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四月为例，是遵照宫廷钦降规定的花样，文书房传旨：命四川布政司进贡到北京的各种彩画面龙凤扇八百一十柄，如下所列：内金钉铰彩画面、浑贴雕边骨龙凤舟船扇十五柄，寿比南山、福如东海扇，四阳捧寿福禄扇十五柄，百子扇十五柄，群仙捧寿扇十五柄，松竹梅结寿福禄扇十五柄，

七夕银河会扇十五柄，菊花兔儿扇十五柄，天师降五毒扇十五柄，四兽朝麒麟扇十五柄，孔雀牡丹扇十五柄，苍松皓月扇十五柄，菊花仙子扇，闲花扇，满地娇翎毛扇，金菊对芙蓉扇，锦帐花木猫儿扇，人物故事扇，四季花扇，茶梅花草虫扇，聚番扇，白泽五毒扇，盆景五毒扇，八蛮进宝扇，百鸟朝凤扇，蟠桃捧寿扇，以上共三十三种，每种十五把，上述这些川扇都是按照规定用金钉铰、彩画面、浑贴雕边骨的制法成造的。以后，每样添造至四十五把，加上其余种类共六千余把，并每年皆以此为例进贡给皇宫。其余年例的，今年二月传添造的八千八百柄，俱照样数，每年如法精致赤金造进。礼部知道！无疑又是给四川人民增加沉重负担。进贡宫廷的川扇在制造过程中使用了不少的黄金。从上面贡扇的品种和名称中，可知其制作雕工极为精巧，工艺水平十分高超。川扇终成为各地贡物中的精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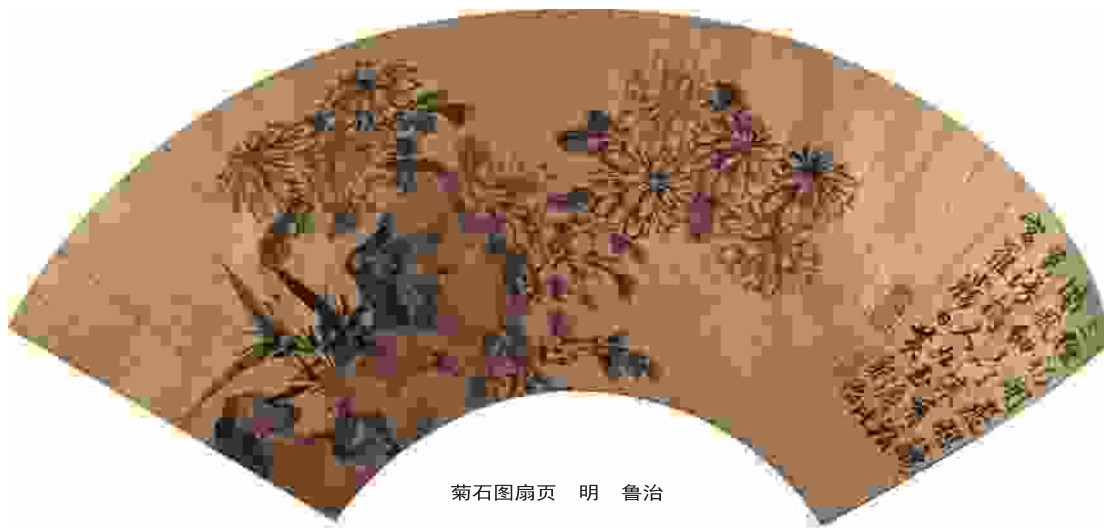
四川贡扇始于何时，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文献中没有明确的记载。《大明会典》等说：最初始于镇守四川的太监，偶然选一些地方特产孝敬皇上，结果被看中，后来就规定扇子是四川进贡的贡物，并确定其数目为常年贡物。据我们掌握的史料分析，至少在正德六年（1511年）以前，川扇已成为进贡的方物之一。西蜀贡川扇的数额，嘉靖初年为一万一千五百四十把，至嘉靖三十年（1551年）增加备用二千一百把，这是为了赏赐的需要。在嘉靖时，川扇已风行一时，名满天下。奸相严嵩是炙手可热、权倾一时的人物，可是当他衰败最后被抄家的财产清单上，仅名贵的川扇，金铰川扇四千三百四十把，银铰川扇一万零七把。各色川扇九千零五十七把。其数量之大，着实惊人。其次有墩扇近三千柄，裹扇、戈折扇、倭扇数量有限，几十至几百把，还有传统的团扇仅为二十四把，可见团扇已微不足道。清单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出扇子流行趋势。嘉靖年间，权贵之家至少有数量不多的川

扇存留，为时代之风尚。宫廷贡扇，到了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又增加成造小式细巧式样的八百把，这是为了赐给新宠幸的妃嫔，总共是一万四千四百四十把。到了万历七年（1579年）二月，又增加四川贡扇七百把。嗜财成性的神宗朱翊钧，万历二十三年又增二千六百把。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每年进贡数额竟达四万八千四百余把，是嘉靖年间的三倍多。万历朝中叶以后，神宗聚敛和挥霍达到了顶峰。明末天启年间，四川每年仍岁贡折扇，后因地方战乱，天启五年（1625年）曾免去进贡川扇。但是天启六年（1626年）又要进贡二万把，等待动乱平定，还是照旧额数目进贡。崇祯十五年（1642年）四月，下令免去贡扇三年，这说明直到明朝灭亡的前夕，蜀地贡扇的负累并未停止。尽管此时国困民穷，已濒于崩溃，但对于川扇的榨取，仍未减免，而这三年的停贡是与农民大起义浪潮有关，两年后，则明朝灭亡。封藩于四川的蜀王，也效仿四川布政司，为了取悦龙颜，制造更加精致华贵的川扇，每年以王府的名义进贡千余把。有一次还得到了皇上的嘉奖，赐白银三百两，大红彩缎衣三件。

明朝宫廷对于四川贡扇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必须是精工细作，不惜工本，还不时颁发新奇式样，按式制造，要造出精丽瑰异的产品，以满足帝王、后妃的穷奢极侈、骄奢淫逸的宫廷生活，不但对川扇质量要求精益求精，而且还要求按时纳贡。但是四川地处西南，交通不便，蜀道险阻，有时又遇上水旱灾情，或兵祸连结，或缺乏高手艺匠人，或钱粮不足，势必无法按质按量准时进贡。但封建帝王并不理会任何缘由与困难，只要是不能按时进贡北京，便对地方官员加重责罚。如万历二十三年五月，宫廷颁发了四川扇式新样（如前面也有列举明目）。御史周希圣谏言：“蜀地困苦不堪”，贡扇需减免。这就引起了神宗恼怒，夺了他一年俸禄。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三月，礼部题奏：“四川进扇，

粗糙不合式样”。神宗于是传旨惩降所有经管官员数级，被降职的有四川左布政使程正谊降为广西左参政，右布政使王道增降为福建右参政，右参议刘三才降为山西按察僉事，布政司理问赵嘉宾降为楚雄府经历。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因四川贡扇粗劣，罚布政司官员俸禄三个月。四川地方大员和官吏竟分别受到严重惩罚，而当地百姓受到责难与牵连而遭横祸的更是可想而知。贡扇虽满足了封建帝王的享乐和欢心与为所欲为，却给西蜀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已成为一种超经济的严酷

放弃了原来的生业。蜀地除赋税外，又添了川扇的进贡，地方上承受着双重的负担。租税是有时因灾情还可以减免，但是川扇则需年年进贡。使得地方财政得不到喘息。那么每年进贡的川扇，又都是怎样被挥霍的呢？这篇奏疏是这样说的：宫廷内御用监每年也按钦样制造折扇，所费银钱、物料无法计算，所造数量也十分巨大，再加上四川贡扇，供给宫廷内上自两宫皇太后、六宫妃嫔，下至宫中权贵人物，即使每日易扇三次，如何能使用完这么多的扇子。这是主要因为赏赐无度而耗费，但赐



菊石图扇页 明 鲁治

剥削。《明史·谢杰传》称：“以帝荒于政事：……西蜀之扇、关中之絨，率取之逾额，今则岁进月输。”万历皇帝几十年不视朝政，但对于川扇搜求，绝不放松，不时超额进贡，并要年年月月贡赋京城。

关于贡扇流毒一方，当时，明人也深感其弊病。万历一朝，在北京居住多年的执政大臣曾经撰文述其弊端，他说：天下的贡物都要经过远道运来北京，跋涉过千山万水，真是劳民伤财，疲累不堪，难以列举，其中川扇尤其如此。接着他继续剖析：即使川扇为最佳，那么多不过千把，少者数百把，足够宫廷使用，何必要殊形异制，名目繁多，贡品中满箱累累，千万柄尽是扇子。而官吏为了进贡扇子，占用了许多公务时间，百姓为了制造扇子，而

给文武大臣则寥寥无几，而赏赐皇亲也不过百分之一，可是赏赐宦官则不下十分之八九，因此，它耗费了国家很多官银和工费。贡扇送到宫廷，皇室享用有限，多数为宦官所得，而西蜀人民受困于贡扇的征输与压榨。

由明人记载，深知四川贡扇最大的受益者，是北京宫廷的太监集团，他们凭借皇帝的特权与淫威，占有了四川百姓的劳动成果与财富。从此侧面也可以看出明朝宦官势力的强大和对宫廷的深远影响。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汕头市平野公司职员）

『唐云麾将军李思训碑』拓本浅识

● 韩建识

云麾将军李思训墓是唐睿宗李旦陵墓——桥陵的陪葬墓。云麾将军李思训碑为青石质，六螭首，龟趺，通高3.2米，宽1.3米，厚0.5米。额篆“唐故右武卫大将军李府君碑”，首题“唐故云麾将军右武卫大将军赠秦州都督彭国公谥曰昭公李府君神道碑”。碑文30行，行70字，记李思训生平。唐著名书法家李邕撰并书，碑文下截漫漶。其书法遒劲妍丽，以李邕的第一作品而称美于世。李思训碑今存陕西省蒲城县博物馆。<sup>①</sup>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有“唐云麾将军李思训碑”拓本一册，该拓本为蝴蝶式剪条镶裱，楠木护面，护面签题“云麾将军李思训碑”。拓本碑文共19开，外框高35厘米，宽19厘米；内框高27.7厘米，宽14.6厘米（图一）；碑文后有题记1开。本文试就我中心藏“云麾将军李思训碑”拓本年代等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云麾将军李思训碑”拓本递藏

碑帖拓本收藏者钤印可以作为鉴别拓本的参考。我中心藏“云麾将军李思训碑”拓本内文钤印8方，分别是：“池北书库”（白文）、“朱筠”（白文）、“竹君”（朱文）、“孟慈收藏”（朱文）、“扬州汪喜孙孟慈父印”（朱文）、“喜孙印信”（白文）、“周玉齐金汉石之馆”（朱文）、“英和私印”（白文）。

“池北书库”印章主人应是王士禛。王士禛（1634—1711），字貽上，号阮亭，



图一 “云麾将军李思训碑”拓本碑文

自号渔洋山人，清新城（今山东桓台）人。顺治十二年（1655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其聚书室名“池北书库”。著有《带经堂集》、《渔洋诗文集》、《精华录》、《精华录训纂》等数十种。<sup>②</sup>“朱筠”、“竹君”两方印章主人应是朱筠。朱筠（1729—1781），字竹君，一字美叔，号笥河，清顺天大兴（今属北京）人。乾隆十九年（1754年）进士，授编修，擢侍讲学士，提督安徽学政，曾任四库全书馆纂修官。其书室名“椒华吟舫”。<sup>③</sup>“孟慈收藏”、“扬州汪喜孙孟慈父印”、“喜孙印信”、“周玉齐金汉石之馆”4方印章主人应是汪喜孙。汪喜孙（1786—1847），字孟慈，清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嘉庆举人。博览群书，

长于考据。<sup>④</sup>其藏书处名“周玉齐金汉石之馆”。<sup>⑤</sup>“英和私印”印章主人即英和。英和（1771—1840），姓索绰络氏，字定圃，号煦斋，满洲正白旗人。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进士，官至协办大学士。其藏书室名恩庆堂。<sup>⑥</sup>根据我中心藏“云麾将军李思训碑”拓本内文所钤印可知，该拓本曾先后被清人王士禛、朱筠、汪喜孙、英和收藏，故拓本年代应不晚于清初。

## 二、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云麾将军李思训碑”拓本题记

我中心藏“云麾将军李思训碑”拓本内文后有题记4则，其中，有题跋1则（图二）。该跋作者是清人英和，跋文另见于英和所著《恩福堂诗钞》。<sup>⑦</sup>我中心藏拓本题跋云：“风细细，日迟迟，韶光一桁来茅茨。肯容日月驰如驿，差幸将军尚<sup>⑧</sup>有碑，碑版照四裔，句传少陵制。卓哉彭国公，名与书延世。健笔风流百代宗，含毫得意墨华浓。曾闻师利能驯象，犹逊山阴未化龙。细筋入骨秋毫察，萧散中间寓<sup>⑨</sup>挺拔。透来纸背莫撚锋，想见风前夸贯札。自书自作自镌成，八百贞珉当日行。帖中黄鹤仙之类，乃是先生托匠名。大兴不守扬州得，送我东行置我侧。光华难掩字精神，辨识须<sup>⑩</sup>看古纸墨。笑脸常<sup>⑪</sup>因此册开，屏风十二奚为哉？放他杨柳随春去，喜挈朝云过岭来。手弱、目昏、笔枯、纸涩，可谓四谬具矣。辛卯仲春廿日雪窗书。”钤朱文“英和”印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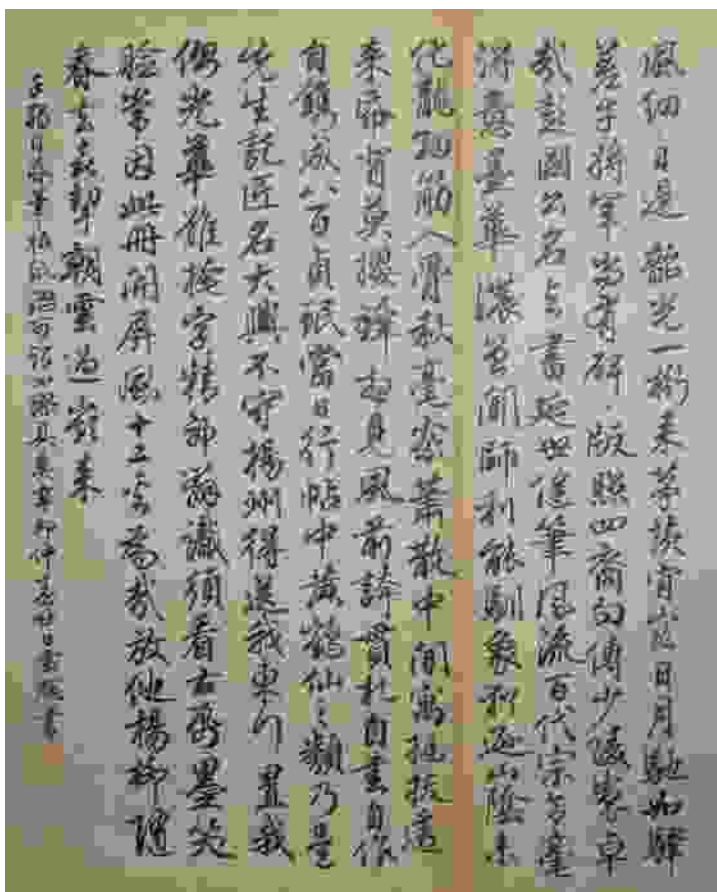
“碑版照四裔，句传少陵制。”“少陵”即唐朝诗人杜甫。“碑版照四裔”，出自杜甫撰《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忆昔李公存，词林有根柢。声华当健笔，洒落富清制。风流散金石，追琢山岳锐。情穷造化理，学贯天人际。干谒走其门，碑版照四裔。各满深望还，森然起凡例。”<sup>⑫</sup>此句反映了李邕书法的巨大影响，是对其书法成就的赞誉。“自书自作自镌成”，“帖中黄鹤仙之类，乃是先生托匠名。”明人

就有李邕所书碑版多亲自镌刻的说法，黄鹤仙之类只是假托。明人杨慎撰《樊敏碑跋》载：“李北海书碑多手自镌。其云元省已刻，或云伏灵芝刻，或云黄鹤仙刻，皆北海自镌也。”<sup>⑭</sup>明人何良俊撰《四友斋丛说·书》载：“或言李北海书皆自刻石，所言黄仙鹤、伏灵芝，假托耳。”<sup>⑮</sup>“八百贞珉当日行”，这里是指曾有李邕撰碑八百通之说。宋人叶廷珪撰《海录碎事》载：“唐人说李邕前后撰碑八百首。”<sup>⑯</sup>南宋高似孙撰《纬略》载：“唐人说李邕前后撰碑八百首。按邕传，邕尤长碑颂，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资金帛求其文。”<sup>⑰</sup>《旧唐书》另有李邕制碑数百首之说：“初，邕早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资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钜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sup>⑱</sup>

“大兴不守扬州得，送我东行置我侧。”根据《恩福堂诗钞》注释，“大兴”指“朱竹君先生”，“扬州”指“汪孟慈员外”。<sup>⑲</sup>可见，该拓本曾先后经朱筠、汪喜孙收藏，后又由汪喜孙转给英和。“辛卯仲春廿日”是该跋的撰写时间。英和生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卒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此处的辛卯年应是道光十一年（1831年）。仲春，春季的第二个月，即农历二月。因此，该跋应撰于道光十一年二月二十日。道光八年（1828年）英和因宝华峪孝穆皇后陵寝地宫内水浸一案，被革职系狱，籍没家资。原引应奏不奏例拟大辟，后改为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道光十一年三月十四日，赐环。五月初八日，回到京城。<sup>⑳</sup>该跋正作于英和在黑龙江充当苦差之时。从行

文中可以看出，该拓本为英和带来了精神上的愉悦。

题跋前有观款3则：“嘉庆戊寅正月四日莆田郭尚先借观于增默庵（钤‘郭尚先印’）。后三日侯官李彦章观。庚辰五月夏至前三日邓炽昌观于晴雪斋。”郭尚先（1786—1833），字兰石，清福建莆田人。嘉庆十四年（1809年）进士，官至大理寺卿。工书，善画墨兰。其书室名增默庵、芳坚馆。<sup>㉑</sup>著有《增默庵遗集》、《芳坚馆题跋》。<sup>㉒</sup>嘉庆戊寅年（嘉庆二十三年，即公元1818年）正月四日，郭尚先在其书室增默庵曾借观今藏于我中心的“云麾将军李思训碑”拓本。李彦章（1794—1836）<sup>㉓</sup>，字兰卿，清福建侯官人。嘉庆十六年（1811年）进士，官至山东盐运使。嘉、道间以诗名，兼善书，著有《榕园诗集》。



图二 英和所作题跋



③“后三日”即嘉庆二十三年正月七日，此日李彦章鉴赏了我中心所藏“云麾将军李思训碑”拓本。“庚辰”年应是光绪六年(1880年)，光绪六年五月夏至前三日邓焜昌也曾在晴雪斋观看该拓本。

### 三、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云麾将军李思训碑”拓本年代

“云麾将军李思训碑”拓本较多，有宋、元、明、清各代拓本存世。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云麾将军李思训碑”拓本，首行“李府君神道碑并序”之“序”字已剝作“文”字，“神”字“申”部已泐。二行“言必典彝”之“言”字笔道完好。三行“公讳思训”之“训”字“言”部已泐，但未与“川”部左竖泐连。九行“盖小小者”之上“小”字完好。十二行“宰臣不闻”之“不”字完好。二十一行“亦登厥官”之“亦”字未剝成“三”字形。二十四行“魏国夫人窦氏”之“国”“窦”二字稍损，“氏”字未损。二十五行“尚书”之“书”字完好。二十七行“竹筒纪年”之“筒”字完好。《增补校碑随笔》载：“明中叶拓本，首行‘李府君神道碑并序’之‘序’字虽泐尚未挖讹成‘文’字。‘神’字‘申’部完好。三行‘公讳思训’之‘训’字‘言’部完好且未与‘川’部左竖泐连。稍晚廿七行‘竹筒纪年’之‘筒’字未损。若廿四行‘魏国夫人窦氏’之‘国’‘窦’二字尚存者为明末拓本。清初拓本二行‘言必典彝’之‘言’字中笔道未损。乾隆拓本廿一行‘亦登厥官’之‘亦’字，未挖讹成‘三’字形。”<sup>②</sup>《善本碑帖录》载：“明末清初拓本廿七行竹筒，筒字完好，又廿五行尚书，书字完好，又次廿四行魏国夫人窦氏，国窦氏三字完好。乾、嘉拓本十二行宰臣不闻，不字完好。又次九行盖小小者，上小字完好。又清初拓本首行序字剝成明显文字。”<sup>③</sup>《碑帖鉴定》载：“明拓本首行‘并序’剝作‘并文’……清初拓本，二十四行‘夫人窦氏’之‘窦’字，上半已损，下半‘具’字完好，‘氏’

字已损。”<sup>④</sup>因此，笔者认为，我中心所藏“云麾将军李思训碑”拓本应拓于明末清初。

### 四、“云麾将军李思训碑”撰书年

关于云麾将军李思训碑，有该碑立于唐开元六年(718年)<sup>⑤</sup>、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四月之后<sup>⑥</sup>、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七月以后方撰文立碑<sup>⑦</sup>、撰书年代在开元二十七年四月以后至二十九年(741年)年底<sup>⑧</sup>等不同说法。碑文中有“吏部尚书兼中书令集贤院学士修国史晋国公”<sup>⑨</sup>残文，应该就是李林甫的官职。《新唐书·表第二·宰相中》载：“二十七年四月己丑，林甫为吏部尚书，仙客为兵部尚书兼侍中。”<sup>⑩</sup>《旧唐书》载：“二十七年夏四月丁酉，侍中牛仙客为兵部尚书兼侍中；兵部尚书兼中书令李林甫为吏部尚书，依旧兼中书令。”<sup>⑪</sup>据《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sup>⑫</sup>推算，唐开元二十七年四月无丁酉日，故《旧唐书》记载有误。笔者认为，云麾将军李思训碑撰书年应在唐开元二十七年四月己丑日(即公元739年6月8日)<sup>⑬</sup>之后。

### 五、结语

综上所述，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唐云麾将军李思训碑”拓本曾先后被王士禛、朱筠、汪喜孙、英和收藏，拓本题跋是英和在黑龙江充当苦差之时所作，为明末清初拓本。由于经名人收藏和题跋，该拓本应属珍本。“云麾将军李思训碑”撰书年应在唐开元二十七年四月己丑日之后。

①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上)》，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524页。

②杨立诚、金步瀛合编，俞运之校补：《中国藏

书家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第20—21页。

③范凤书著：《中国著名藏书家与藏书楼》，大象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第169页。

④林申清编：《中国藏书家印鉴》，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71页。

⑤徐珂编：《清稗类钞·鉴赏类（上）》第31册，商务印书馆，民国六年（1917年）初版，第91页。

⑥林申清编：《中国藏书家印鉴》，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57页。

⑦⑱（清）英和：《恩福堂笔记·诗钞·年谱》，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第317页。

⑧“尚”，《恩福堂诗钞》作“留”。见（清）英和：《恩福堂笔记·诗钞·年谱》，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第317页。

⑨“寓”，《恩福堂诗钞》作“露”。见（清）英和：《恩福堂笔记·诗钞·年谱》，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第317页。

⑩“须”，《恩福堂诗钞》作“还”。见（清）英和：《恩福堂笔记·诗钞·年谱》，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第317页。

⑪“常”，《恩福堂诗钞》作“时”。见（清）英和：《恩福堂笔记·诗钞·年谱》，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第317页。

⑫（清）爱新觉罗玄烨（清圣祖）：《御定全唐诗》卷22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2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12月，第81—82页。

⑬（明）杨慎撰：《升庵集》卷10，《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12月，第102页。

⑭（明）何良俊撰：《四友斋丛说》，中华书局，1959年4月第1版，第253页。

⑮（宋）叶廷珪撰：《海录碎事》卷18，《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2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12月，第783页。

⑯（宋）高似孙撰：《纬略》卷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12月，第330页。

⑰（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5月第1版，第5043页。

⑱（清）英和：《恩福堂笔记·诗钞·年谱》，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第410—411页。

⑳杨廷福、杨同甫编：《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增补本）》（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第660页。

㉑张勃之、沈起炜、刘德重主编：《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2022页。

㉒江庆柏编著：《清代人物生卒年表》，2005年12月第1版，第289页。

㉓张勃之、沈起炜、刘德重主编：《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998页。

㉔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7月第1版，第562页。

㉕张彦生著：《善本碑帖录》，中华书局，1984年2月第1版，第122页。

㉖马子云、施安昌著：《碑帖鉴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99—300页。

㉗（宋）陈思撰：《宝刻丛编》卷10，《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12月，第370页。

㉘（清）汪中撰：《述学·别录》，四部丛刊景无锡孙氏本。

㉙王仲谋：《唐云麾将军碑考跋》，《人文杂志》1993年第2期。

㉚岑仲勉：《金石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1月第1版，第301页。

㉛（清）王昶辑：《金石萃编》卷72，中国书店，1985年3月第1版。

㉜（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62，中华书局，1975年2月第1版，第1690页。

㉝（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9，中华书局，1975年5月第1版，第211页。

㉞㉟方诗铭、方小芬编著：《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423页。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副研究馆员）

# 首都博物馆藏《西陂六景诗卷》文物名称辨析

李文琪

首都博物馆藏《西陂六景诗卷》为清代宋莘手书自作诗卷，笔者在查阅此卷所涉及的人物、诗文及地点等信息时，发现其与上海有正书局民国四年（1915年）发行的珂罗版《王耕烟画西陂六景册》、上海博物馆藏王翬《六境图卷》这两件文物有密切的联系。由于这两件文物的存在，《西陂六景诗卷》的文物名称可能会使观者对这三件文物的内容产生混淆，因此值得重新商榷。

## 一、《西陂六景诗卷》文物简介

《西陂六景诗卷》，纸本楷书手卷，纵28厘米，横210厘米，清人宋莘所作，首都博物馆藏。

卷首作者自题长跋一段，241字，释文曰：“予宦游之始。忘归岩者，虔州山水最幽处，得名自阳明先生。予奉使经年，过此处每忘归。后予观察通州，咫尺京华最为纷沓。顿潞河一水，绿浪红蕖，风帆沙鸟，时可怡情。目葺潞亭，以存旧迹。赵文敏有鹊华秋色图为齐州周公谨作也，予以额廉访。官署夕阳紫翠，恒于坐卧间得之。不数月，移藩吴。会薄书旁午，闻有苏子美沧浪亭，未及探历，忽忽奉江右之命。以去江右，近郭有北兰寺，据江山盛概，因建烟江叠嶂堂与宾从游，眺其中，颇擅一时之盛。癸酉移节平江，政简心闲，沧浪亭近在署侧，取次修葺，遂成名胜，酬夙愿也。今岁夏乌目山人王翬过我，俾作六境图，叙述其事，各系五言诗一章，要一二故人和之，庚辰立秋日”（图一）。

根据作者在卷前跋语中提到的“庚辰立秋日”，再结合作者的生卒年与生平，

可知此卷作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当时宋莘正于江宁巡抚任上，这六首诗应该创作于其苏州官邸。彼年，著名画家王翬应邀至苏州，为宋莘创作了诗卷题跋中提到的“六境图”画作，分别描绘宋莘在湖北、河北、山东、江西、江苏五地担任官职以来所游历过的六处重要景观。

该卷主体内容为五言诗六首，共558字，内容为：

### 其一 洗墨池

畴昔判黄州，一官同泛梗。江山乐清旷，俯仰客怀永。东坡洗墨池，芜没无人境。爬荆出神瀆，一泓浮翠荇。岂惟存旧迹，兼可逐清景。好风澹荡吹，几席沦涟影。幽人对如鹄，瓯香时啜茗。蛙口食墨黑，臆说堪笑屏。别来三纪余，几思驾烟艇。

### 其二 忘归岩

姚江千载人，看山有癖好。柴载虔州时，游履遍云峽。幽岩傍通天，几度展孤眺。大书刻石壁，公怀何浩浩。我来追高躅，一杖凌奔峭。修篁被邃谷，森耸千幢纛。水穷云起处，默坐领其要。夕阳促楼翼，灵籁发窳窳。而我亦忘归，苏门继清啸。

### 其三 潞亭

观察通潞日，奔走苦近畿。束带欲大叫，如马困疆鞵。偶值公事了，一水弄烟霏。缚亭延古意，四顾来清晖。红蕖参白鸟，到眼趣不稀。谁言塞垣近，江乡此展几。遂多酬唱什，宾从有光辉。湖庄清夏图，夺取惟王翬。孤山云外塔，相望仍依依。

### 其四 鹊华秋色堂

济南山水佳，城郭烟岚环。鹊华好秋色，鸥波貌双鬟。我官日两衙，书在紫翠间。故人额我堂，见者为怡颜。拟携红藤杖，刻意穷跻攀。无何置之去，欲赋诗思艰。冷云兴残然，幽梦恒相关。高吟满筍筐，

千年妬遗山。

#### 其五 烟江叠嶂堂

晋乡有珍图，曰烟江叠嶂。玉局最心折，品在李郭上。揭来章江滨，放眼得画状。沧波带翠嶂，千里列屏障。堂开古寺中，佳处快所向。三日一登临，五日一酬唱。嵯峨滕王阁，较此逊奇创。白鸥闲似我，来往随荡漾。琅琊老尚书，节督诧别样。

#### 其六 沧浪亭

移节来三吴，我还用法。所愿风俗淳，坐许泉石狎。访古得沧浪，澄明比若云。空亭复旧观，屋宇施板锸。牡丹俨风鬟，荷叶展罗裙。故物补棋盘，韵事添琴匣。游人联袂来，名胜虎丘崖。英英子美魂，吟啸定不乏。图成当年谱，画乎颇称甲。他日归西陂，还倩写放鸭。

卷尾落款 15 字：“书呈西堂先生教和，西陂弟宋荦具草。”钤朱白文名章“臣荦”与朱文名章“白马客裔”、“西陂”共三方（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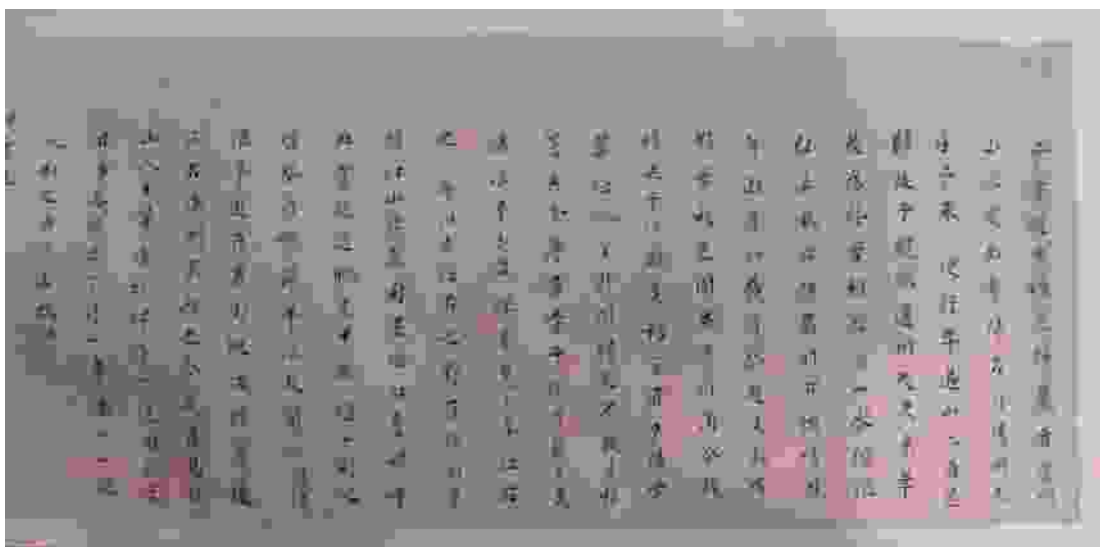
## 二、原定名称《西陂六景诗卷》分析

### （一）宋荦及其“西陂”字号

宋荦（1634—1713），字牧仲，河南商丘人，清初名臣。顺治朝内阁大学士宋

权之子，14 岁即以大臣之子擢为三等侍卫，<sup>①</sup>后历任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官至吏部尚书，最终因年迈以原有品级致仕。顺治五年（1648 年），宋荦 15 岁，在侍卫考察<sup>②</sup>中获得第一，应授以通判之职，宋荦以“弱龄、不谙政事……督令读书，候乡试”为由婉拒，次年，宋荦即随父归乡读书。宋荦出身簪缨世族，<sup>③</sup>幼时即跟随宋权任职各地，受其父人品、学问、为官作风等熏陶已久；少时在乡里读书期间，又从学、交游于贾开宗、侯方域等文坛名流，很早即以诗文才华名于当时。顺治十四年（1657 年），宋荦应顺天乡试未中，继续回乡读书。康熙二年（1663 年），宋荦赴京第二次应试，结果因病未能参加。从顺治六年（1649 年）到康熙二年这 15 年的时间里，除了两次来京应试，宋荦大部分时间都在故乡读书，也曾至江南作短暂游历，与当时一些文人进行交游，未担任官职。虽然宋荦不是进士出身的正途官员，但自授官以来，以其任事务实高效、作风勤政爱民、品行清正廉洁，而为上司乃至康熙皇帝所欣赏，屡屡升迁，委以封疆要任。

“西陂”是宋荦本人所用的名号之一，亦是他在家乡经营多年的村居名称。康熙四十二年（1703 年），康熙帝南巡，接驾诸臣纷纷请求御书墨宝，时任江宁巡抚的



图一 《西陂六景诗卷》卷首作者自题长跋

宋莘向皇帝请求道：“臣家有别业，在城西陂，乞皇上赐臣西陂二字”，并以自己年龄最老为由请求先得。康熙言道：“朕本好书，尔求之甚力，且尔七十岁人，朕不忍却”，于是当即手书“西陂”二字赐予宋莘，但稍后不久，又命侍卫将赐书要回，重新书写后再赐予宋莘，表现了康熙帝本人对赐书这件事情的重视。宋莘在其《漫堂年谱》中记录了此事。

## （二）宋莘与《西陂六景诗卷》中六景的关系

《西陂六景诗卷》中的每首诗咏一处景观，总共有洗墨池、忘归岩、潞亭、鹊华秋色堂、烟江叠嶂堂、沧浪亭6处。结合宋莘的生平及主要为官经历，可以看出此六景对于他的重要意义。

### 1. 洗墨池

康熙三年（1664年），宋莘31岁，被授予湖广黄州通判，官秩正六品。根据宋莘在《漫堂年谱》中的内容记载，判断宋所任黄州通判是为知府之佐贰官，主要负责漕粮运输一项事务，兼或有其他辅助性工作等，并非是由中央派出专管一地的通判之情况。<sup>④</sup>黄州曾是苏轼被贬谪之地，在这里他创作了无论是诗文还是书法均蜚声海内的《黄州寒食帖》。宋莘敬慕苏轼，少时曾画苏轼肖像以时常供奉，他初次筮

仕黄州的经历，在其内心也因为苏轼而有了特殊的意义。<sup>⑤</sup>根据宋莘在《漫堂年谱》中的记载及《洗墨池》一诗中“东坡洗墨池，芜没无人境”等诗句内容判断，他应该是到黄州及目睹苏轼雪堂及洗墨池等旧址衰败之景，在其督运漕粮回黄州之后有了较多闲暇，将洗墨池等古迹重建。

### 2. 忘归岩

康熙十七年（1678年），宋莘45岁，自理藩院院判迁刑部贵州司员外郎，官秩为从五品。由于宋莘在刑部任员外郎时敢于纠正弊政、坚持原则，使当时满官决断舞弊、汉官隐忍屈从的风气为之一变，其才能凸显，在任职当年即被堂官所保举，前往江西视察赣州榷关。而第二首诗中所咏之“通天岩”，正是他在这次出榷赣关的途中所游历的。此次执行公务的途中，宋莘得以有较多的闲暇，除了通天岩之外，他还游览了八境、绵津等诸多名胜，并与魏禧、和礼、彭士望等文士交往，其“绵津山人”的字号也在此时产生。

### 3. 潞亭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宋莘50岁，升任直隶通永道佥事，官秩正五品。宋莘在《筠廊二笔》中提到他曾“分巡通永”<sup>⑥</sup>，可知他所担任的是分巡道员，本是专管刑名；但其在《漫堂年谱》中提到，“二月，



图二 《西陂六景诗卷》局部

升直隶通永道僉事，兼屯田、驿传、海防、河道、漕粮、饷务、税课、仓场，职最冗繁”<sup>⑦</sup>，可知他属于分巡道员监管专职性道员事务的情况；又因其是由刑部员外郎补授而来，加“僉事”衔，故判断其品秩为正五品。此时宋荦并非专职的地方官，而是由省级政府派出的处理各种事务的一种虚衔。<sup>⑧</sup>“潞亭”则是宋荦在任通永道时，繁忙公事之余游历过的景观。宋荦在《潞亭》一首中这样写道：“观察通潞日，奔走苦近畿。束带欲大叫，如马困疆鞵。偶值公事了，一水弄烟霏。”或许是初次承担如此繁杂的事务，偶尔的放松显得弥足珍贵，这成为潞亭一景之所以在宋荦的人生游历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原因之一。

#### 4. 鹊华秋色堂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宋荦54岁，升任山东按察使，官秩正三品。这年四月份，宋荦抵达济南官署。第四首诗《鹊华秋色堂》即描绘济南景象。“鹊华秋色”一语来源于赵孟頫的千古名作《鹊华秋色图》，图画济南鹊山与华不注山景色，是赵孟頫在江南时为抚慰其好友周密的思乡之情而作，绝世画艺加上这种真挚情感的渲染使得这幅画流传千古，也为后世文人墨客所唏嘘不已。根据诗中“我官日两衙，书在紫翠间。故人额我堂，见者为怡颜”的内容及作者在诗句后的自注，“鹊华秋色堂”应是朱彝尊为其在济南的官署或其它处所题写的匾额。

#### 5. 烟江叠嶂堂

康熙二十六年十月，宋荦任山东按察使不到一年，即升任江苏布政使，离开济南，同年十二月份到达苏州。

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四月，宋荦任江苏布政使不到一年，即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巡抚江西，官秩从二品，此时他55岁。本年六月十九日，宋荦抵达南昌官署。第五首诗中的“烟江叠嶂堂”即位于南昌城北郊的北兰寺中。北兰寺的历史可上溯至唐代，几经兴废，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重建，由僧人澹雪主持。康

熙三十年（1691年），宋荦在北兰寺修复列岫亭、秋屏阁旧址，并新建烟江叠嶂堂等建筑，公事之暇常邀请文学名士如邵长蘅、朱载震等人至此地，吟咏唱和。<sup>⑨</sup>此次宋荦巡抚江西，并不是他初次至北兰寺。在他任刑部员外郎出榷赣关时，就已游历过此处。第二首《忘归岩》中有这样的诗句：“柴戟虔州时，游屐遍云峤”，可知他当时在途中广泛游历。宋荦又有《秋日重过北兰寺六首》，言道：“簿书烟海坐相仍，秋日羁愁一倍增。何处空林堪脱帽，只应还访北兰僧。”<sup>⑩</sup>再次重游已是十几年过去，年龄、身份、阅历都有较大的变化，致使其感触颇多。

#### 6. 沧浪亭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六月，宋荦59岁，调补江宁巡抚，官秩从二品。八月四日，宋荦抵达苏州公署，沧浪亭即在官署东郊。这是宋荦第二次至苏州，从《西陂六景诗卷》跋文“会簿书旁午，闻有苏子美沧浪亭，未及探历，忽忽奉江右之命，以去江右”可知，他担任江苏布政使第一次至苏州时，就已得知沧浪亭所在，由于公务繁忙、后又仓促调任江西，未及探访。此次至苏州，宋荦探访沧浪亭，目睹其衰败现状，不仅重新修缮其旧址，更主持编撰《沧浪小志》，保存了文化名迹的历史资料，将沧浪亭建设成具有自然、人文双重意义的文化景观。在“六境图咏”序文中宋荦提到：“癸酉移节平江，政简心闲，沧浪亭近在署侧，取次修葺，遂成名胜，酬夙愿也”，可以看出他对沧浪亭一迹发自内心的重视，任江宁巡抚后，更由于该迹位于公署近侧，使其得以时常畅游其中。

洗墨池位于当时湖北黄州府，忘归岩位于江西赣州府，潞亭位于当时顺天通州府，鹊华秋色堂位于山东济南府，烟江叠嶂堂位于江西南昌府，沧浪亭位于苏州府。宋荦在湖北黄州、江西赣州、顺天通州以及山东济南这四地，担任品级相对低微的官职，停留时间较短，但他入仕早期的经历对日后的为官之路有重要影响。宋荦担

任江西巡抚四年多时间，离任时，南昌百姓冒雨相送，拥挤于道路；担任江宁巡抚数十年，离任时，淮阳百姓同样接踵相送，当时正值丹阳大雪，但每天赶来为宋莘送行的人都有数百之多，送行者大都含泪惜别，对此，宋莘说自己“且感且愧”<sup>①</sup>。苏州沧浪亭公园至今还保存刻有“惠爱黎元，宏奖髦士。心迹双清，沧浪之水”诗句及宋莘画像的石碑。

根据以上的史实，以“西陂”代指宋莘本人十分恰当。诗卷中包含六首咏景诗，诗中所涉及的六处地点，宋莘曾在此七度出任不同官职，期间的经历在作者的仕途生涯乃至一生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以“西陂六景”来命名这件文物可以说是合情合理，相得益彰。

### 三、《西陂六景诗卷》与其他两件文物的关联

（一）首都博物馆藏《西陂六景诗卷》与其他文物的内容关联

《西陂六景诗卷》的跋文及组诗内容收入宋莘的个人文集《西陂类稿》中，此书中，组诗序文内容多出“康熙甲辰，予以侍卫出判黄州，地故有子瞻洗墨池，从荆榛瓦砾中搜剔而修复之，是为”这34个字，其余部分与前述《西陂六景诗卷》跋文和诗文完全一致。然而，在《西陂类稿》中，这六首诗的名称并不是《西陂六景诗》，而是《六境图咏》。<sup>②</sup>

前面已经提到，“六境图”是康熙三十九年王翬在苏州为宋莘创作的六幅山水小景，现由上海博物馆收藏，已装裱为纸本设色手卷，纵34.5厘米，横每段178厘米左右，此件文物照片已由《中国书画全集》<sup>③</sup>一书出版。

此卷现余四段，均为平远构图。第一段绘水岸亭阁，四周为矮墙、高树环绕，左侧水面开阔无垠，零星几只货船，仿北宋赵令穰《湖庄清夏图》。第二段绘山、湖、树、汀交相布局的平远场景，右段布近、

中、远三景，左段布中、远景，疏密有秩，仿赵孟頫《鹊华秋色图》。第三段表现江水沿岸山峦绵延、云雾迷蒙的场景，仿北宋王诜《烟江叠嶂图》。第四段绘丛树掩映中的亭阁，右侧可见远处水田轮廓，左侧布置小湖、汀树等景物。每段左侧题款均为“虞山王翬画”，钤白文“王翬之印”、“石谷”名章。每段在画心右侧以篆书题名，依次为“潞亭”、“鹊华秋色堂”、“烟江叠嶂堂”、“沧浪亭”，画心左侧为宋莘楷书题诗四段，均钤朱文“莘”、“牧仲”名章。其中，每段画心的题诗内容与篆书标题均对应一致，与宋莘收入《西陂类稿》的组诗《六境图咏》完全相同。不同之处惟《六境图》中宋莘题诗只有四段，与《西陂类稿》中所收入的《六境图咏》组诗相比，少《洗墨池》、《忘归岩》两段。

从《六境图卷》现存的四段来看，首都博物馆所藏的《西陂六景诗卷》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六境图卷》，这两者在内容上是密切关联的，前者的诗文内容与后者每段画后面的题跋内容完全一致，亦与《西陂类稿》所收录的名为《六境图咏》的组诗内容相吻合。

（二）首都博物馆藏《西陂六景诗卷》与其他文物的名称关联

“西陂六景”这个名称，无独有偶。王翬确为宋莘创作过名为《西陂六景册》的画作，在民国四年由上海有正书局以珂罗版印行，画册名称为《王耕烟画西陂六景册》。该画册共绘小景山水六幅，画心右上有小楷题名，依次为：淶波村、钓家、纬萧草堂、和松庵、芰梁、放鸭亭，每页左下钤朱文“石谷子”、白文“王翬之印”印章，末页款题“戊辰夏至，虞山王翬制图”。这6幅图均以细腻笔致描绘屋舍、田地、小湖、舟、桥、柳等村居小景，景物描绘较为细致，第二、三幅可见草堂中主人捧茗而坐，第五幅绘一人物立于草桥上驻足观景，饶有诗意，展现一种悠然的村居情怀。

册后有跋三页，前两页是宋莘好友朱彝尊所跋《西陂记》，内叙西陂村居缘起、

“西陂”二字御题经过，及宋萃的“西陂”情结。对于宋萃的“西陂”情结，跋中说：“宋公怀童时钓游之所，思筑圃曰西陂，命禹鸿胪之鼎作《西陂鱼麦图》，取元结诗句，冀归老于江湖也”。第三页是宋萃自题的跋文，钤朱文“字余曰牧仲”、“绵津山人”印章及白文“甲戌宋萃”印章。

宋萃跋文内容如下：

“余家西陂，去宋城数里，而近鱼藕菱芡。亘延于隋堤南湖，有江南之胜。老屋数间，粗庇风雨。拟归所居，为淶波村，为钓家，而堂以纬萧庵，以和松名邨之外，缚芰梁筑放鸭亭，盖踌躇数年于兹矣。顾宦游四方，仅托诸梦想。暇日为西陂杂咏，属和者累累，更乞虞山王翬写为图，装而藏之篋中，俟异日归老补葺焉。昔刘克庄欲构后村精舍，以周旋世故，终未能插一椽、施一椽，追为浩叹。即陈北山所书‘精舍’字，亦付之蛛网蠹蚀而已。则余于今日岂可仅托之图与诗，致令有后村之叹也。康熙戊辰（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夏五月十有六日，西陂钓叟宋萃牧仲氏题于平江官舍之漫堂”。

宋萃跋文后又有题诗及和诗五页。其中宋萃个人的题诗共六首：

#### 淶波村

芳洲鱼麦多，全家就来久。  
门岗渚花参，眠食溪禽友。  
泱泱净兼天，色映五株柳。

#### 钓家

以作烟波徒，占断眼波境。  
篙根一纶竿，檐隙双苓管。  
时骨鸭觜船，长歌逐落景。

#### 纬萧草堂

蟹舍秋风吹，狄枝竖可截。  
织薄衡茅间，暂把鱼经辍。  
偃仰幽事多，好待鹿门说。

#### 和松庵

颓翁荫诗屋，萧瑟如空山。  
长风拂虬枝，天际来潺湲。  
操弦哪能和，此曲非人间。

#### 芰梁

水栗纷横塘，远接劳虾步。  
采采刺我衣，平桥踏凉路。  
竚立闻荷香，月挂迥低树。

#### 放鸭亭

鳧泛殊容与，衔苔弄溪沙。  
空亭镇相向，何须能言夸。  
风标两公子，伴尔栖蒹葭。

这6首诗每首后分别有数人和诗，包括朱彝尊、汤右曾等人。

《西陂六景册》创作于1688年夏天。这一年宋萃正任江苏布政使，繁忙公务中他怀念起故乡西陂的景致，恰逢王翬途经平江，宋萃于是请他绘制了此图。

宋萃在《王耕烟画西陂六景册》所题的组诗6首，亦被收入《西陂类稿》中，组诗名称为《西陂杂咏》。惟一有出入的地方是在《西陂类稿》中，组诗序文中提到的写作时间为“康熙丙寅仲冬廿有九日”，即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冬，地点为“淶沙官舍之漫堂”，画册跋文中提到的时间是“康熙戊辰夏五月十有六日”，即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夏，地点为“平江官舍之漫堂”。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宋萃于康熙二十五年在直隶顺天府担任分巡道员时，怀着对故乡的眷念之情创作了《西陂杂咏》六首，两年后在江苏担任布政使，恰逢王翬在江苏（根据现有的《王石谷年谱》<sup>④</sup>内容，可知康熙二十五年及康熙二十七年两年王翬均在江苏、浙江两省活动，康熙二十七年时更亲临“平江”），于是请这位老友根据《西陂杂咏》六首诗的内容创作了《西陂六景册》，以抚慰自己的思乡之情。宋萃在康熙二十七年的年底，将之前所有诗稿予以整理，更定为《绵津山人诗稿》，在本年夏季王翬已完成《西陂六景图册》，所以一定是宋萃在整理诗稿时，结合了原来写的组诗及本年新得画册的内容，而组诗的创作时间地点又是必须保留的，这就导致了诗稿序文与画册跋文内容完全相同而题款的时间地点完全不同的情况。

由此可见，《西陂六景诗卷》与名为《王



耕烟画西陂六景册》的画册，虽然定名要素的主体部分都是“西陂六景”，但是在内容上并无关联。

#### 四、结论——新的名称及理由阐述

上述王翬《王耕烟画西陂六景册》及《六境图卷》两件文物，与宋莘《西陂杂咏》、《六境图咏》组诗分别相对应，是以先有《西陂杂咏》，后有《西陂六景图》，先有“六境图”，后有《六境图咏》。虽然这两者图与诗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但均属图与诗相互印证，相辅相成的情况。《六境图卷》现存四段中的四首诗，应该是宋莘《六境图咏》组诗最早的出处；宋莘在组诗题跋中写道“今岁夏，乌目山人王翬过我，俾作六境图，叙述其事，各系五言诗一章，要一二故人和之，庚辰立秋日”，言之凿凿，此诗是为“六境图”而作。而且首都博物馆藏《西陂六景诗卷》在序文及诗文内容上与《西陂类稿》中所收入的《六境图咏》组诗是高度一致的，而它与《王耕烟画西陂六景册》并无内容上的关联性；在《西陂六景诗卷》卷末落款处宋莘写道“书呈西堂先生教和，西陂弟宋莘具草”，这说明，此卷是作者特地将《六境图咏》组诗誊录、装裱成卷，意在请好友尤侗和诗，因此而成，这件文物虽然产生在宋莘在“六境图”上题跋之后，却是由此得来。因此，若以《六境图咏诗卷》来命名首博所藏此件文物，或许可以更加清晰地体现上述几件文物之间及其与相关诗作之间的关系。

①《漫堂年谱》，《续修四库全书》第55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4月，第177-178页。

②《漫堂年谱》，《续修四库全书》第55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4月，第178页。

③宋莘曾祖父宋纘是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进士，官至户部、吏部尚书；其曾祖宋旸以“笃孝友”闻名乡里；其祖父宋沾曾任山东福山知县，为官清正

爱民；父宋权为明天启五年（1625年）进士，顺治三年（1646年）拜内翰林史院大学士。详见《商丘县志》记载。

④《清朝通典》卷34《职官十二》：“通判……分掌粮运、督捕、水利、理事诸务，均量地置员，以佐知府之政治。其有兼理民事直隶于各省者，其职如各府各直隶州之制，而品级则同。”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1935年。

⑤《漫堂年谱》，《续修四库全书》第554册，《漫堂年谱》：“忆余家居时，尝命作苏子瞻相貌，已侍其侧。及筮仕，竟得黄州。”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81页。

⑥《筠廊二笔》，《清代笔记小说大观》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0月，第61页。

⑦《漫堂年谱》，《续修四库全书》第55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4月，第186页。

⑧白钢主编，郭松义、李新达、杨珍著：《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某些守、巡道员或兼兵备，或兼水利，或兼驿传，或兼茶马，或兼屯田等事。无论专职道员或分巡二道，都是藩、臬二司的辅佐官，因时裁设，员额无定，系衔与品秩都按其原有官职分别而定。……由各部郎中、员外郎、主事、同知补授者，系金事衔，称为金事道，正五品。此时，道员只是作为藩、臬二司派出的临时差使，带有上述虚衔，并非地方实官。这种情况到清朝中期才有了改变。”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99页。

⑨《漫堂年谱》，《续修四库全书》第55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97页。

⑩《西陂类稿》，《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2008年12月，第107页。

⑪《续修四库全书》第55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4月，第251页。

⑫《西陂类稿》，《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2008年12月，第163-164页。

⑬《中国绘画全集》第24册，第37（图版说明），文物出版社、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144页（图）。

⑭赵平：《王石谷年谱》，《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7期，第123-124页。

（作者为首都博物馆藏品保管部馆员）

# 慧思与静琬“师徒”关系考辨

张爱民 尤李

“房山云居寺石刻佛教大藏经”，简称“房山石经”。隋代幽州（今北京及附近地区）智泉寺僧人静琬为备“法难”、“拟充经本”，发起石经刊刻事业。房山石经的刊刻历经隋、唐、辽、金、元、明六个朝代，绵延 1039 年。目前发现完整的石经板，共计 14278 块。房山石经是中国唯一的一部石质佛教大藏经，不仅是研究佛教的宝贵资料，还是研究华北区域社会史的重要文化遗产。

静琬正是为了防备末法时代的到来而刊刻房山石经。<sup>①</sup>不少学者撰文探讨过静琬刊刻石经的动机及其师承关系。特别是静琬到底是不是南岳慧思大师的弟子，引起学界的广泛争论。的确，南岳慧思大师与石经刊刻发起人静琬之间的“师徒”关系及其建立过程，还有一些“未发之覆”。对这些问题，本文将一一揭示。

## 一、慧思与静琬之间的关系被“发现”

从目前所见的材料来看，正是明代的紫柏达观大师让慧思与静琬建立了联系。而紫柏又是明朝后期复兴佛教的名僧及重要人物。

明嘉靖皇帝狂热崇奉道教。在嘉靖一朝，皇宫或朝廷几乎是道教的天下。佛教受到打压。<sup>②</sup>在嘉靖皇帝死后，朝廷才开始整肃道教。<sup>③</sup>明神宗万历年间，兴起佛教思想再革新的复兴风潮。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是新、旧佛教轮替的重要时期，而万历时代正是“新佛教”蓬勃发展的时

代，其代表人物有：云栖株弘（1535—1615）、紫柏达观（1543—1603）和憨山德清（1546—1623）。<sup>④</sup>

在这一时期，明神宗的母后慈圣太后是万历年间推动佛教复兴的关键人物。她推行了许多崇佛的措施，修缮了京师地区的许多佛寺。<sup>⑤</sup>在万历二十年（1592年），慈圣太后划拨国库的 50 两银子造云居寺石经山雷音窟的大石函。<sup>⑥</sup>

紫柏大师在《房山县天开骨香庵记》中叙述了发现隋代大业年间舍利函的过程，并且特别点出了静琬继承慧思的刻经事业：“予闻石经山，自北齐慧思尊者，镌大藏于石，以寿佛慧命，随静琬继之，至元慧月终焉。”<sup>⑦</sup>

在晚明的佛教复兴运动中，紫柏追慕隋代静琬的护法之功，热衷于云居寺佛教事业的复兴与发展。他在云居寺发现了隋大业年间的舍利函，慈圣太后供养舍利并再次安置舍利，使得巡拜石经山的信徒增加了，这为云居寺的兴盛提供了机会。他还求助于慈圣太后和一些朝臣，筹资赎回了被豪右所占据的云居寺静琬的塔院，重建此寺废弃的佛殿等。可以说，明万历年间正是云居寺复兴的关键时期。<sup>⑧</sup>

在复兴云居寺的过程中，除了上引《房山县天开骨香庵记》，紫柏留下的其他诗文也频频提及慧思与静琬之间的关系。如万历十四年（1586年），紫柏所撰《秋夜石经山礼琬公灵骨》云：“隋琬公阅《南岳思大师发愿文》，知未（末）法运穷，三灾倏起，一切法藏，皆当尽灭，喟然叹曰：‘有天地不可无日月，有作息不可无衣食，

有人生不可无佛法。然日能照昼，不能照夜；月能照夜，不能照昼；衣能遮人之寒，不能使时不寒；食能济人之饥，不能使年不饥。惟佛法之妙，不惟使天地终古，长且群有，死生无患，以至铸凡为圣，即暗为明，达生无生，以大愿力，兼万有而普济之，则广大殊胜，岂可思议者哉？’乃刊石为经，续佛法寿，延及慈氏，行恐古今代谢，岩壑变迁，以佛舍利，并己骸骨，藏诸石窟，填抚兹山，矢大法藏，永劫无毁。予感公之忧深而虑远也，含涕赋此：‘月夜青山谒琬公，石堂无语对千峰。莲花片片皆心血，贝叶行行夺化工。灵骨可埋名不朽，法身非相用常通。哪堪更向苍崖上，凿室藏经示不穷。’”<sup>⑨</sup>

在这首诗的序言中，紫柏大胆地推测：静琬因为阅读了慧思的《南岳思大师发愿文》，知道末法即将来临，便心生感慨，才刊刻石经，以使佛法永存。

万历十四年，紫柏在《过西云居寺有感》这首诗中感叹道：“万里峨嵋去复来，古碑无字洗苍苔。琬公慧命谁将续，泪洒青山染劫灰。”<sup>⑩</sup>

“琬公慧命”即暗示静琬与慧思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这首诗中，紫柏欲延续静琬未尽的刻经事业的心情溢于言表。

紫柏达观积极交结权贵，获得慈圣太后的礼遇与敬重，借助政治权力推动佛教的发展。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达观卷入中央政治斗争的漩涡，因为“立储”之争的牵连被捕入狱，冤死于狱中，沦为政治斗争的替罪羊。<sup>⑪</sup>紫柏死后，另一名高僧憨山德清所撰《径山达观可禅师塔铭》仍然称颂他复兴佛门圣地云居寺的功劳：“师返都门，访石经山，礼隋琬公塔。念琬公虑三灾劫坏，正法渐灭，创刻石藏经，藏于岩洞。感其护法深心，泪下如雨。”<sup>⑫</sup>

憨山所撰《复涿州石经山琬公塔院记》这样追溯房山的刻经事业：“昔尝阅藏教，睹南岳思大师愿文：‘愿色身常住，奉持佛法，以待慈氏。’斯已甚为希有矣！及观光上国，游目小西天，见石经，何其伟哉！

盖有隋大业中，幽州智泉寺沙门，静琬尊者，恐三灾坏劫，虑大法湮没，欲令佛种不断，乃创刻石藏经板，封于涿州之西白带山。山有七洞，洞洞皆满。”<sup>⑬</sup>显然，憨山大师也认为静琬刊刻石经的行为是对慧思的愿望的继承。

《复涿州石经山琬公塔院记》还特别表彰了紫柏复兴云居寺的功业：“初达观可大师，于万历丙戌（万历十四年）秋，访清于那罗延窟。北游云居，至琬公塔，一见则泪堕如雨，若亡子见父母庐墓也，抱幢痛哭，徘徊久之而去。”<sup>⑭</sup>

憨山所撰《涿州西石经山雷音窟舍利记》详细讲述了万历二十年紫柏大师发现佛舍利的经过，<sup>⑮</sup>其中特别提及：“且此石经，乃我琬公乘南岳愿轮，以待慈氏，经三灾历穷劫，岂值亿世？”<sup>⑯</sup>所谓“琬公乘南岳愿轮”，则明确点出静琬刊刻石经系继承南岳慧思的事业，这在隐约地暗示二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总之，在明万历年间，在佛教力图振兴之际，达观等名僧发挥了重要作用。以紫柏和憨山在佛教界的崇高威望及其社会影响，他们所提出或宣扬的慧思与静琬之间的密切关系，定能产生不小的影响。

## 二、慧思与静琬“师徒”关系被建构起来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帝京景物略》首次明确提出慧思与静琬是师徒关系。在明朝末年，刘侗、于奕正合撰的《帝京景物略》曰：“北齐南岳慧思大师虑东土藏教有毁灭时，发愿刻石藏，闭封岩壑中，以度人劫。岳座下静琬法师，承师付嘱，自隋大业迄唐贞观，《大涅槃经》成。”<sup>⑰</sup>既然静琬是“承师付嘱”而刊刻石经，这当然系明确宣称二人是师徒关系。《帝京景物略》的两位作者对京城的许多景观做过实地调查，对相关素材进行了谨慎取舍和反复推敲。这本书的史料价值很高，影响很大。<sup>⑱</sup>因此，《帝京景物略》的这段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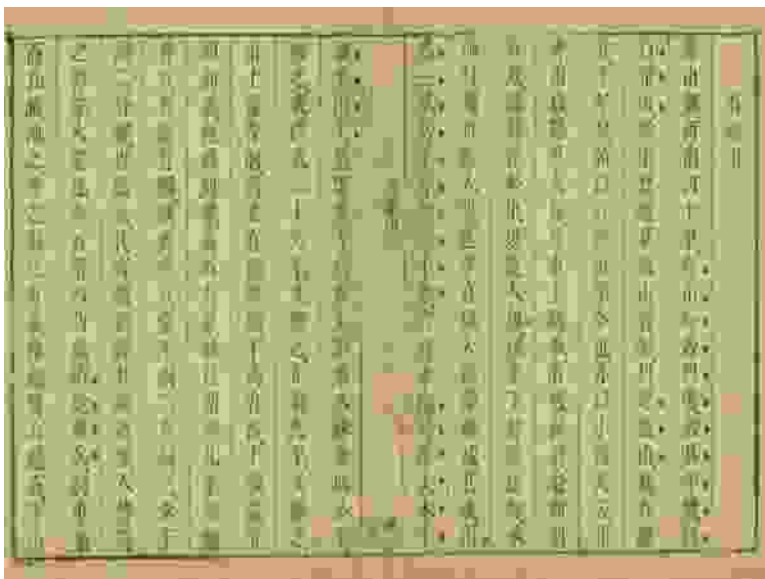
录至少显示：当时社会上的确存在慧思与静琬是师徒关系的说法。这一说法的出现及流传或许就跟紫柏大师直接相关。

清乾隆年间纂修的《钦定日下旧闻考》所载白带山、云居寺的情况，有相当一部分是直接袭自《帝京景物略》的记录，其中就包括静琬遵循其师父慧思的嘱托而刊刻石经之事。<sup>⑭</sup>

连清高宗本人也认同静琬是慧思的弟子的说法。他所作诗《寄题石经山》曰：“将谓石经始静琬，谁知更复有知苑。又云慧思付其徒，淆讹记载终难案。吾意三乘十二部，汗牛充栋多无限。先后写成历藏之，事有宜然理易显。虽然教在天地间，天地不变教不变。奚愁教有毁灭时，石塞铁镕贮洞满。即今取之已弗易，教毁有谁取而衍？一切执着佛所呵，诸人被呵应不免。”<sup>⑮</sup>其中诗句“又云慧思付其徒”之后有小注云：“其徒即静琬，见《帝京景物略》。而《冥报记》则称沙门知苑于隋大业中凿岩为石室，磨壁写经，又取方石，别更磨写，藏诸室内，每一室满即以石塞门、镕铁固之云云。究未知孰是。”<sup>⑯</sup>清高宗在这段小注中虽然对究竟是静琬还是知苑开始石经刊刻事业未做定论，但是他所吟的诗句中提及“慧思付其徒”、小注中明说慧思的徒弟就是静琬，而且明确道出自己的这种认识就是来自《帝京景物略》。由此可见，弘历本人是认可这种师承关系的。

撰修于清光绪年间的《顺天府志》引《帝京景物略》云：“苾苾山藏石经者千年，故曰石经山。北齐南岳慧思大师发愿刻石藏。座下静琬承师嘱，自隋大业迄唐贞观，《大般涅槃经》成。”<sup>⑰</sup>

同样撰修于清光绪年间的《畿辅通志》



《帝京景物略》关于“石经山”的记载

又引《帝京景物略》称：“北齐南岳慧思大师虑东土藏教有毁灭，时发愿刻石，藏闭封岩壑中，以度人劫。岳坐下静琬法师承师付嘱，自隋大业迄唐贞观，《大涅槃经》成。”<sup>⑱</sup>

撰修于民国时代的《房山县志》曰：“静琬，隋人，其姓氏、里居不可考。初，北齐南岳慧思大师虑东土藏教有毁灭时，发愿刻石藏，闭封岩壑中，以度人劫。岳座下静琬法师承师旨，遍选名胜。至燕涿鹿山之北曰白带山，睹层峰灵迹，因采石造十二部石经。”<sup>⑲</sup>

《顺天府志》和《畿辅通志》明确注明关于慧思与静琬之间为师徒关系的说法引自《帝京景物略》。时代更晚的《房山县志》未明确记录这种提法源自何处，笔者推测这可能仍然依据《帝京景物略》。

总之，自明清至民国时期，慧思与静琬是师徒关系的说法主要依靠地方志来传播。

陈燕珠先生也认为静琬可能为慧思的弟子。其根据是：慧思的《南岳思大禅师立誓愿文》中显示的末法思想与静琬的思想一致；静琬最早镌刻的石经中，《妙法莲华经》占有突出地位，这是天台宗信奉

的最主要经典，证明慧思与静琬信仰一致；唐临的《冥报记》称静琬为智苑，与慧思的大弟子“智颢”均为“智”字辈。但是，陈先生又认为二人究竟是否确为师徒关系，仍然有待进一步确切考证。<sup>⑤</sup>

### 三、灵裕与静琬之间的关系推断

日本学者塚本善隆先生首次提出：南北朝高僧灵裕的“末法”学说和思想影响了静琬。<sup>⑥</sup>静琬刊刻石经，也受到北齐盛行的刻经事业的影响。<sup>⑦</sup>石经山的石刻经典，也是在佛教徒对大藏经的关心特别高涨的背景中产生的。<sup>⑧</sup>静琬的刻经事业与灵裕的刻经事业极具相似性。<sup>⑨</sup>

吴梦麟等先生通过对比慧思、灵裕、静琬三人的“行状”、分析佛理、佛法，进一步提出：灵裕是静琬的师父，正是静琬继承了灵裕在宝山大住圣窟开创的刻经事业。<sup>⑩</sup>罗焯先生则更详细地论证道：《帝京景物略》关于静琬是慧思的弟子的说法纯属杜撰，没有任何史实根据。静琬不是慧思的弟子，而是北齐至隋代的高僧灵裕的事业与思想的继承人。罗先生提出5点理由来反驳静琬是慧思的弟子：从时间和地域上、从教理和教派传承上看，这一说法不成立。有关房山石经与静琬的最重要的原始资料中没有任何关于慧思的痕迹。

《帝京景物略》所载石经山之事错误甚多，《帝京景物略》所记静琬是慧思弟子之事，很可能是根据慧思的自传《立誓愿文》附会出来的。而且，罗先生通过将静琬在房山雷音洞的刻经与灵裕曾经修行的大住圣窟，静琬与灵裕之间的生平对照比较，指出：在灵裕与静琬之间，存在着非同寻常的一致性。罗先生推测：静琬极有可能是灵裕的弟子。不过，因为在原始资料中没有有关的直接记录，为慎重起见，将静琬视为灵裕思想与事业的继承人，应是比较稳妥的。<sup>⑪</sup>罗先生举出的证据和论证过程都颇为有力。

### 四、结 语

综上所述，静琬的思想和行为与慧思或灵裕具有相似性。但是这种相似性就表明一定是谁受谁的影响吗？即使静琬的刻经事业受到慧思或灵裕的影响，那就表明他们之间一定具有师承关系吗？这一切都是需要更充分的证据来论证的命题。无论如何，在明朝末年，慧思与静琬之间的“师徒”关系被一层层地建构起来，体现了人们的一种心理遐想和当时的社会观念。这种说法又频频被清代和民国的地方志引用，充分证明后世的人们“愿意相信”慧思与静琬就是“师徒”关系。总之，这种观念主要通过地方志文献进行传布。

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说：“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sup>⑫</sup>这就是著名的“层累地构造”学说。顾先生的这一学说虽然重在分析上古史的情况，但对分析其他问题仍然具有启发意义。慧思与静琬为“师徒”关系的说法，时隔将近1000年才出现，这种师承关系随着时间的流逝反而越来越清晰，恰好证明它系后人杜撰的结果。从中可以窥见明朝末年，紫柏等佛教徒通过为云居寺建构悠久的历史 and 清晰的师承谱系，书写这座寺庙辉煌的“历史记忆”，促进云居寺的复兴所做的一系列努力。在某种程度上讲，正是对慧思与静琬之间的“师徒”故事善意、生动地杜撰及广泛传播，成就了云居寺佛教事业的再度兴盛。

① [日] 塚本善隆：《石经山云居寺与石刻大藏经》，《东方学报》（京都）第五册副刊，1935年，第36—47页。

② 参见陈玉女：《明华严宗派遍融和尚入狱考》，原载《成功大学历史学报》第24号，成功大学历史系所，1998年，第215—259页，此据陈玉女著：《明代的佛教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

156—163页；周齐：《明代佛教与政治文化》第一章《明代佛教与帝王及其政治文化环境》，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8—85页；何孝荣：《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上册）第三章《明代帝王、后妃与北京佛教寺院的修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73—279页。

③陈玉女：《明华严宗派遍融和尚入狱考》，陈玉女：《明代的佛教与社会》，第164—165页。

④〔日〕酒井忠夫：《中国善书之研究》第三章《明代的三教合一思想与善书——佛教与三教思想》，弘文堂，1960年，第296页。

⑤陈玉女：《明万历时期慈圣皇太后的崇佛——兼论佛、道两势力的对峙》，原载《成功大学历史学报》第23号，成功大学历史系所，1997年，第195—245页，此据陈玉女著：《明代的佛教与社会》，第96—146页。

⑥释德清：《涿州石经山雷音窟舍利记略》，（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一三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117页。

⑦紫柏大师著述：《紫柏老人集·记》，曹越主编、孔宏点校：《紫柏老人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329页。

⑧塚本善隆：《石经山云居寺与石刻大藏经》，第225—227页；戴继诚：《紫柏大师与云居寺》，王志远主编：《宗风》，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178—185页。

⑨紫柏大师著述：《紫柏老人集·诗》，曹越主编、孔宏点校：《紫柏老人集》，第702页。

⑩紫柏大师著述：《紫柏老人集·诗》，曹越主编、孔宏点校：《紫柏老人集》，第767页。

⑪详见（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七《释道》“紫柏祸本”条，中华书局，1959年，第690—691页；陈玉女：《明万历时期慈圣皇太后的崇佛——兼论佛、道两势力的对峙》，陈玉女：《明代的佛教与社会》，第136—143页。

⑫曹越主编、孔宏点校：《紫柏老人集·附录一》，第845页。

⑬⑭憨山著述：《复涿州石经山琬公塔院记》，曹越主编、孔宏点校：《憨山老人梦游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400页。

⑮憨山著述：《涿州西石经山雷音窟舍利记》，曹越主编、孔宏点校：《憨山老人梦游集》，第

402—405页。

⑯憨山著述：《涿州西石经山雷音窟舍利记》，曹越主编、孔宏点校：《憨山老人梦游集》，第404页。

⑰（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八《畿辅名迹》，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47—348页。

⑱详见王灿炽：《〈帝京景物略〉及其作者考》，《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第54—60页。

⑲《日下旧闻考》卷一三一《京畿·房山县》二，第2106—2107页。

⑳㉑《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三五，《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集》第六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39页。

㉒（清）周家楣、缪荃孙等编纂：《光绪顺天府志》卷一二八《金石志》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740页。

㉓（清）李鸿章等修：《畿辅通志》卷五七《舆地》一二《山川》一，商务印书馆影印清光绪十年刻本，1924年，第2603页小注。这段小注称根据“于奕正记略”。于奕正即《帝京景物略》的作者，因此此处当指引用《帝京景物略》的记载。

㉔冯庆澜等修，高书官等纂：《房山县志》卷六《人物》，铅印本，1928年，第34页。

㉕陈燕珠：《房山石经中通理大师刻经之研究》，觉苑出版社，1993年，第21页。

㉖塚本善隆：《石经山云居寺与石刻大藏经》，第43—46页。

㉗塚本善隆：《石经山云居寺与石刻大藏经》，第54—58页。

㉘塚本善隆：《石经山云居寺与石刻大藏经》，第59—63页。

㉙塚本善隆：《石经山云居寺与石刻大藏经》，第106—110页。

㉚吴梦麟、徐自强、张永强：《房山石经题记内容初探》，载《百年敦煌文献整理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2010年，第733—736页。

㉛罗昭：《房山石经之源与静琬的传承》，《文物》2003年第3期，第86—92页。

㉜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全集》第1册，中华书局，2010年，第45页。

（作者为云居寺文物管理处科员、圆明园管理处馆员）

# 《宋辽金元建制城市研究》读后

于德源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韩光辉教授主攻历史人口地理和历史城市地理，由于受业于侯仁之教授，所以研究中大多以北京作为案例进行剖析，所得所见虽不仅限于北京历史，但对北京历史研究助益甚大，其新作《宋辽金元建制城市研究》本人读后颇有所得，愿在这里和大家共享。

所谓建制城市虽然和我们平常说的城市有关，但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建制城市是一个行政区划的概念，城市则是在原始中心聚落的基础上产生，以政治、经济、交通中心为特征的中心居住区。

在我国，早在距今4000年前的龙山文化后期就已经产生原始城市，高大的城墙和表示权力中心的高大建筑群，是这些遗址中的突出特征。汉唐时期的中国城市建筑已经进入成熟的时期，对城市的规划和布局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至宋元时期，中国城市建筑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得更加开放。自北宋中叶以后，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诸大城市封闭的坊里制度已经彻底崩溃。金中都城既然仿照宋都汴梁之处甚多，自然不再保持旧的坊里制度。考古勘察发现，金当时仿照北宋东京制度营建的中都城的中心部位，其布局仍保持辽南京时的坊制格局，这是因为营建中都时对旧居民区不曾重建的缘故。但是在金中都城的扩建部分，则完全采用开放式的坊巷制。金中都城西南部，经钻探发现，这里的东西方向街道大多是一些平行的、等距离的胡同。另外，仍保留在今北京宣武区的故金中都

城东部，即宣武门外大街及其东部的一些南北方向的胡同，如椿树胡同、陕西巷等，也是金中都街道的遗迹。这些平行的胡同都是以城市的主干道为轴线在两旁排列的。金中都的城市布局，混合着坊巷和坊两种新老格局，这是在当时中国南北城市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反映着中国古代城市由封建社会中期向后期的过渡。商铺和居住区混杂在一起，这表明封建社会前期封闭的坊里制度至此已经彻底瓦解。但是旧的市墙、市门也并没有拆除，只不过是徒具形式，工商业的经营已不受“市”这一固定封闭范围的约束。中国城市建筑的布局由封闭的坊里制度变成开放的坊巷制度。元明时期中国城市的布局已经基本固定化了。

可是建制城市却不然。建制城市是指城市行政建制，亦即城市行政区划与管理体制，以城市拥有明确的行政界线、市域范围和职能完善的城市行政管理机构为标志。这种拥有明确的行政界线和专门行政管理机构并实行独立行政管理的城市，才是建制城市。中国古代城市虽然出现得很早，但在封建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城市并不是独立管理的。质言之，当时的城市并没有实行独立的行政管理。例如汉唐时期的都城长安都设有京兆尹，但京兆尹并不是长安城的专门主官。当时京兆尹的官秩和郡守相同，辖长安以下十二县，属官有长安市、厨两令丞，都水、铁官两令丞。唐代，设雍州牧为长安的屏障，一般都是以亲王为州牧，下有长史。后来改长史为

京兆尹，其机构称京兆府。京兆府下辖长安、万年两京县及畿县。总而言之，这时的城市管理都没有独立的机构，城市和周围郊区的管理都由京县一以贯之，京兆尹既管理城市又管理属县。次一级的府州县也是如此，各个城市只不过是各级政府机构的驻在地，即所谓治所，其主官知府、知州、知县等不是单独这个城市（城镇）的主官，而是这个行政区域的主官。当时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开始从周围的农村剥离出来，于是便出现建制城市。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建制城市，在学术界还是一个有不同看法的问题。作者认为城市建制是城市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由个案建制城市出现发展为城市群体或城市体系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首先是城市从区域行政区划中分离出来，完成城市全面管理的过程即建制城市出现；进而在一定地域空间或国家形成不同等级规模和职能分工、联系紧密、分布有序的城市群体，这就是城市体系。它是在自然、经济、社会、交通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历史形成并处于发展中的动态系统。

作者认为在城市管理制度上，宋代以拥有专门行政管理机构府属都厢为标志，出现了个案建制城市。宋代由封闭的坊里制到开放的坊巷制的城市革命打破了旧的城市布局，城市商业的发展，打破了城市坊墙的限制，商人纳税开设铺店形成了新的商业街道与市场，出现了商业与居民区混杂交错的现象。在城市内部区划上出现了厢、坊、街、巷管理制度。北宋、南宋之际，随着坊市制度的瓦解，开放的街巷和临街的商铺代替了封闭的坊市，称之为坊巷。由此坊巷制代替了坊市制。北宋政府为了管理开放的坊巷，设置了“厢”一级机构。《宋会要辑稿·方域一》载：北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年）十一月，“诏改京城内外坊名，旧城内左第一厢二十坊……第二厢十六坊……右第一厢八坊……第二厢二坊……新城内，城内城东厢九坊……城西厢二十六坊……城南厢二十坊……城

北厢二十坊”。由此坊巷制又发展为厢坊制。“厢”有厢使等官和小吏，维护辖区数坊内的治安、防火、防盗等事项。《宋史·职官志六》记载：北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知府事钱勰上言：都城开封城内，在神宗熙宁之世于旧城内设左、右厢，分管东、西两城；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复在新城内增置左、右两厢，以后废，“今请复置”。他这里记错了，把宋开封设厢的年代推后了，把开国时期至道年间的事情说成是熙宁时期的事了。但从他的话中可以看到，新城内的厢制曾一度罢废，到哲宗时才又恢复。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厢”一级机构在开封城外设置。当时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吸引了大批商贾、工匠和从事服务业的劳动者。城内居住不下，就在城外靠近城门处居住下来，形成新的居民点，也就是后世的所谓“关厢”。“关厢”一词虽然出现在元代曲剧家关汉卿的杂剧中，但其社会现象的实际出现是在两宋时期。《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北宋政府鉴于“都门之外，居民颇多”，旧例是由附京的京县县尉管理，现在事务繁杂，形同一个单独的乡邑，于是在新城城外设置“城外八厢”，“特置厢使”，由开封府管领。

赵宋王朝最终受金朝武力颠覆，被迫将都城从开封南迁到浙江杭州，称临安，史称南宋。南宋政权在临安也是实行的北宋开封的制度。南宋前期孝宗时的《乾道临安志》记载：绍兴十一年（1141年）因临安城外“人烟繁盛，各比一邑”，于是置南、北两厢，又分设左、右厢，共计4厢。城内则置“在城八厢”即“宫城、左一、左二、左三、右一、右二、右三、右四”。南宋后期理宗时的《淳佑临安志》记载：由于城市人口的扩充，这时临安城内已经增加到9厢，原来的左一厢又分为南、北两厢；城外仍然是城南左、城北左、城西、城东4厢。南宋临安城内外总计设置13厢，其中相当于后世关厢的是城外4厢。



如前所述，两宋政府之所以先后在开封、临安（今杭州市）设置“厢”一级机构，就是因为在这些原属附郭京县管理的地域聚居了大量商贾、工匠和其他以服务于城市为生的外来人口，以致于不得不单独设置“厢”一级行政机构加以管理。“厢”在宋朝本来是军事单位，用在民间基层管理机构上体现了其最初的强制色彩。这些城外的居民点大多靠近城门，也就是后世的关厢。关厢的出现，一方面是城市坊市制的瓦解，一方面是城市人口的不断膨胀和商业经济不断发展的结果。关厢的居民除少数是在荒年逃难到京城求生，以后滞留京城的灾民外，大多数是来自各地的商贾、工匠和餐饮等服务业人员，以及从城市中迁出的下层市民。如乾道年间，楼钥随南宋使节出使金朝时，其于《北行日记》中记述到虹县（今安徽泗县）“城门不容车，乘马入驿，市井多在城外”。实际上，这种情况在晚唐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元祐七年（1092年）苏东坡在向朝廷请求罢免宿州（今安徽宿县）扩展城郭工役时说：“宿州，自唐以来，罗城（按，即指州城外城墙）狭小，居民多在城外。本朝承平百年，人户安堵……诸处似此城小人多，散在城外，谓之草市者甚众，岂可一一展筑外城？”

与北宋同时并隔界河（今拒马河）而治的北方契丹辽政权，其城市管理中也开始出现了建制城市的个案。契丹是渔猎民族，其取得政权以后，统治的方式也是采取辽帝以四时捺钵的方式统治全土，政治中心本无定处，而以皇帐临时所在地为统治中心。辽朝虽然也设立了五处都城即辽太宗以皇都为上京（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南），升幽州（今北京）为南京，改原南京为东京（今辽宁辽阳），辽圣宗又城中京（今内蒙古宁城附近），辽兴宗升云州（今山西大同）为西京，但均为陪都性质。辽五京中的诸京警巡院是独立的城市行政实体。《辽史·兴宗纪》载，至重熙十三年（1044年）三月，“置契丹警巡院”。警巡院与京府所属京县、县皆

属于京府，形成辽代五京府行政管理系统。作者认为，尽管宋代只有东京（今河南开封）和临安（今浙江杭州）两个建制城市，辽代则有上京、东京、南京、中京、西京五个建制城市，但它却标志了中国古代建制城市的出现。

金朝是女真族建立的政权，女真族兴起于东北，大军南下灭辽，进而逼北宋南迁，一举占领了黄淮以北地区。赵宋政权几迁之后终于落脚临安（今浙江杭州）。金朝行政区划分路府、州、县三级制，相应形成了不同行政等级和户口规模的城市，按城市行政建制与等级规模也划分为三级，即警巡院城市、录事司城市和司候司城市。其中六京府置有警巡院；十三个总管府和所辖诸府节镇置有录事司；防刺州则置有司候司。

金朝置有警巡院行政机构的只有中都（今北京）、上京（今黑龙江阿城）、东京（今辽宁辽阳）、北京（今内蒙古宁城附近）、西京（今山西大同）、南京（今河南开封）六个京城。《金史·百官志》记载：“诸京警巡院，使一员，正六品，掌平理狱讼，警察别部，总判院事。副一员，从七品，掌警巡之事。判官二员，正九品，掌检稽失，签判院事。”城市社区则有警巡院所属（厢隅）坊巷管理。

录事司城市66个，都是诸府节镇所在的城市。诸府节镇城市中设有录事司和兵马司或都军司，共同管理府镇城市，前者管民事，后者掌军事巡捕。城市录事司、附郭县和县平行隶属于府镇。由此可见，府镇录事司城市在金代的重要地位。录事司城市，作为金朝诸府节镇行政区划的治所，是府镇区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对于金朝国家属于中等城市，又是府镇行政区域的中心城市。

在诸府节镇城市之下的就是防御州、刺史州城市，概称防刺州城市。防刺州皆设司候司，故称为司候司城市。据《金史·地理志》，金朝本有防御州22、刺史州73，金章宗泰和以后尽升军为防御州或刺

史州，所以后来总计有 112 个防刺州。其属下除传统的附郭县和县外，还置设司候司。作为金朝的一项官制，按《金史》，诸防刺州治所城市，均置有司候司。只要建置了防刺州，就在治所城市置设司候司，如明昌三年（1192 年），抚州复置刺史，翌年，即置设了司候司。作为金代官制，诸防刺州司候司，置“司候一员，正九品。司判一员，从九品。司吏、公使七人”，形成城市管理机构。此外，诸防刺州，置“军辖一员，掌同都军，兼巡捕，仍与司候同管城壁，军典二人”。在诸防刺州以下同时设置了司候司与军辖，分别管理城市民事和军事。诸防刺州下，管理城市民事的司候司，与属县和附郭县平行地隶属于防刺州。

我们看到，金代出现了三个层次的建制城市，初步具有建制城市的体系。

元朝创建的行省是地方最高行政机构，也是一级行政区，同时保留了宋、金时代的路、府、州、县地方行政机构和相应的行政区。在拥有一定规模的行省和路府治所建置了城市行政机构。除大都、上都等警巡院建制城市外还有诸府录事司建制城市，共同形成了完善的城市体系。元代的地方行政区划实行省、路（府）、州、县四级制。在《元史·百官志》和《元史·地理志》中，明确记载城市行政机构警巡院和录事司，把建制城市分为两级。

从元世祖忽必烈开始，元朝确立了上都和大都（今北京）的两京制，而以大都为京师。元朝在两京设置了警巡院，大都是 2—5 个，上都是 1 个。警巡院机构的设置数量主要是根据当地城市的人口。

忽必烈至元初年置诸路总管府即所谓路府，置达鲁花赤，总管以下治民事路政，兼管劝农事。路府治所城市则置“录事司，秩正八品。凡路府所治，置一司，以掌城中户民之事。中统二年（1261 年），诏验民户，定为员数。二千户以上，设录事、司候、判官各一员。二千户以下，省判官不置。至元二十年（1283 年），置达鲁花

赤一员，省司候，以判官兼捕盗之事，典史一员。若城市民少，则不置司，归之倚郭县。在两京，则为警巡院。独杭州置四司，后省为左右两司”。这一条文献反映了录事司如下几个方面的历史信息：（1）在路府治所城市设录事司，秩正八品；（2）设置标准在于城市民户多少，城市民少则不置司；（3）职责在于“掌城中户民之事”，与管理城外乡镇居民的州县一样是亲民行政机构；（4）机构由达鲁花赤、录事、判官、典史及司吏组成；（5）若治所城市不置录事司、省司候，城市管理则归之倚郭县；（6）录事司与两京警巡院相类似；（7）至元二十年，置录事司达鲁花赤一员应属普遍设置，而至元三年（1266 年）定随路府州县官员职田，“录事司达鲁花赤三顷”，这时达鲁花赤的设置当尚不普遍；（8）城市规模较大，则可以同时建置几个录事司。

在元朝“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的广大版图上，先后在 127 个路、府、州治所城市建置了管理民事、治安的专门行政机构录事司，即出现了 127 个录事司建制城市。127 个录事司城市和两都警巡院城市一起形成了以大都为首位城市、上都及杭州等为次首位城市的全国性完善的古代城市体系。同时，在各省区，各路、府形成了区域性城市体系。

作者描绘出的中国古代建制城市成长的轨迹就是：第一，城市社会由唐代的坊市制转变为宋代的厢坊制；第二，宋代、辽代出现了个案建制城市，即拥有确定的行政区域和专门行政机构并实行独立行政管理的城市；第三，金、元时期形成了古代城市体系，即拥有不同等级和规模、职能分工、联系密切、分布有序的城市有机联系的体系。这些方面的变化无疑是值得学术界深入研究的问题。

（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 前公用胡同 15 号调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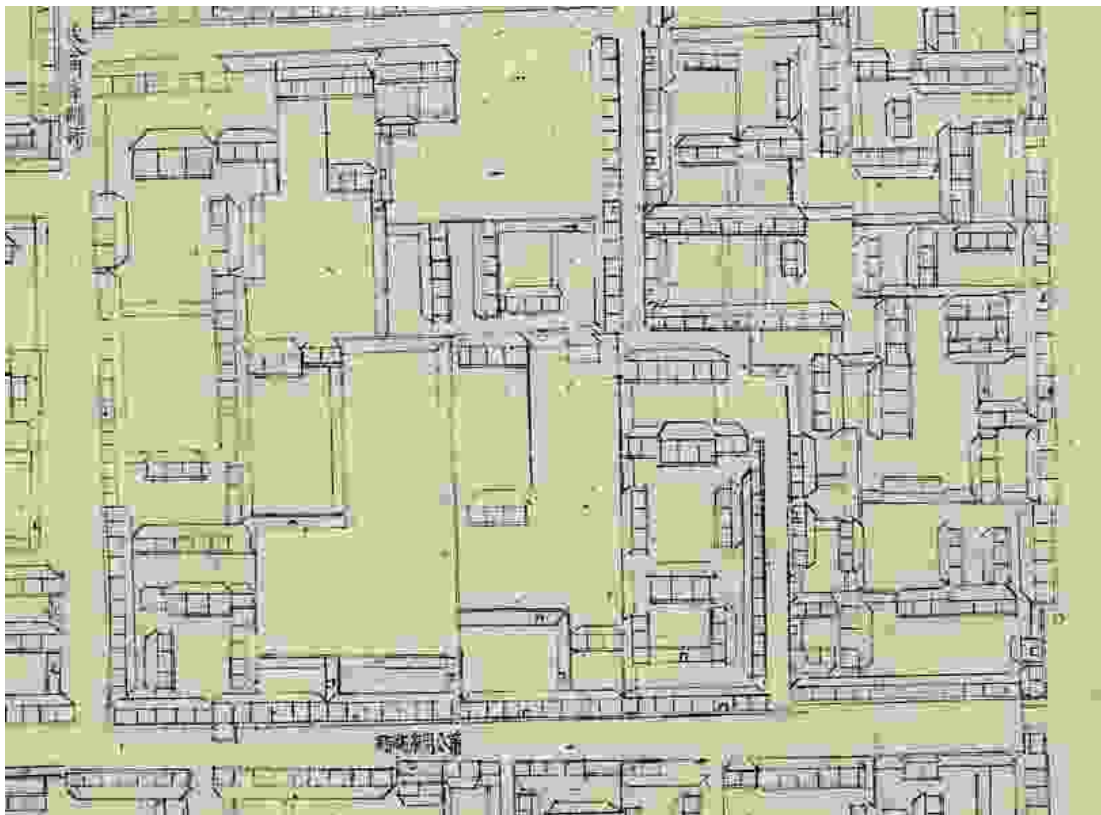
——兼谈四合院调查和分析方法

李卫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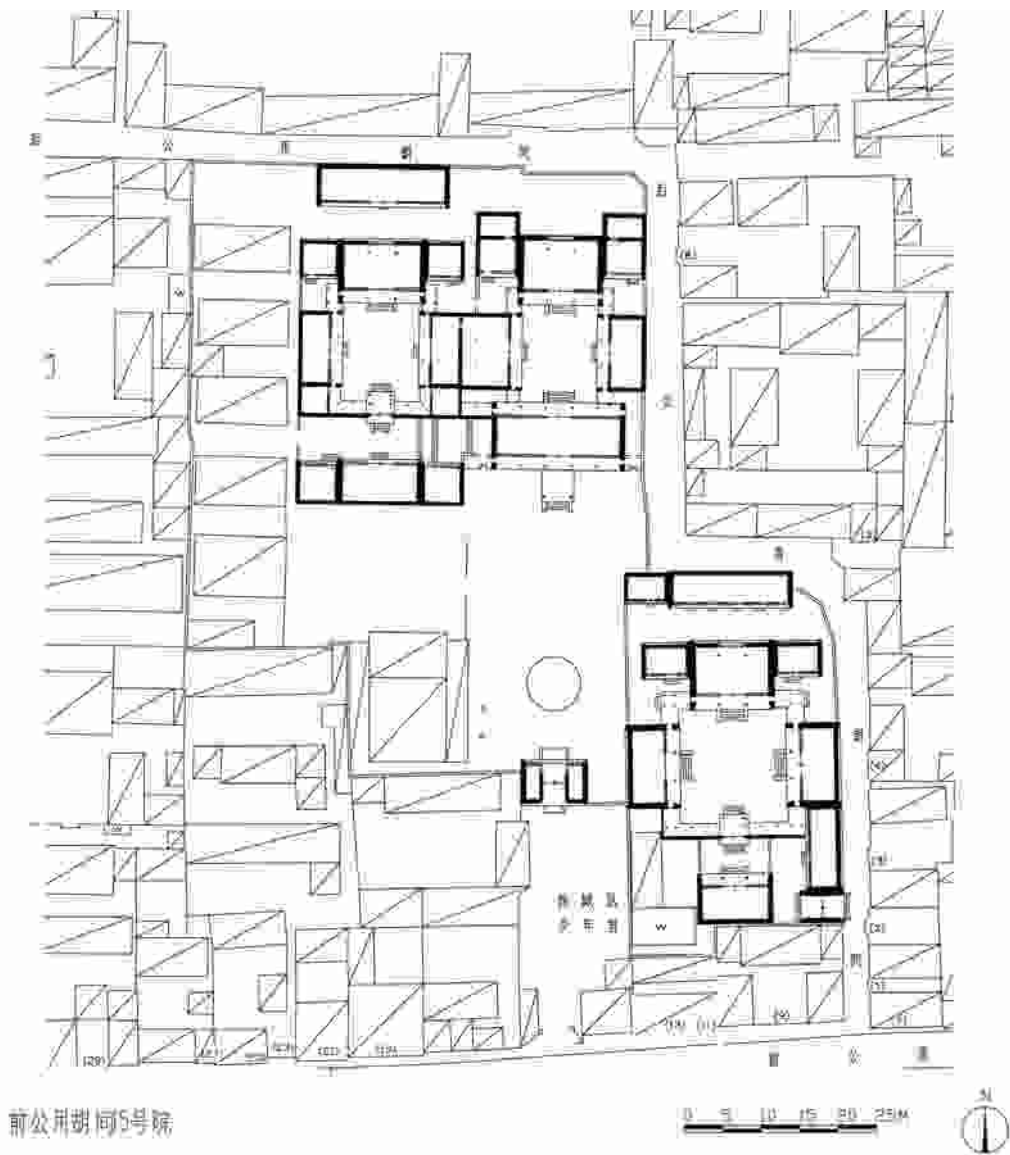
## 一、前公用胡同 15 号四合院历史考辨

前公用胡同原名前供用库胡同，因宫廷供用库位于此条胡同而得名。至迟在明代时该条胡同的名称已经是供用库胡同。明人张爵撰写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西城”条记载该胡同名称即为“供用

库胡同”<sup>①</sup>。而这个名称有可能始于元代，据《元史·百官五》记载：“供用库，秩从九品，大使、副使各一员，受徽政院札。国初，为绫锦总库。至元二十一年，改为供用库。”<sup>②</sup>至元二十一年（1284 年）时，大都城已经完全建成，所以明代的名称有可能是沿袭自元代的名称。尤其是明代的北京城是在元代的大都城基础上建造而成，



图一 《乾隆京城全图》上的前公用胡同 15 号



图二 前公用胡同 15 号总平面图

而且此处元、明两代都属于鸣玉坊，街巷格局没有大的变化。但是这个推测目前还没有发现确凿证据加以证实。

根据《明史·职官三》：“其外有内府供用库，掌印太监一员，总理、管理、掌司、写字、监工无定员。掌宫内及山陵等处内官食米及御用黄蜡、白蜡、沉香等。凡油蜡等库俱属之。旧制各库设官同八局。”<sup>④</sup>在明代，供用库分为供用库和外供用库。供用库位于皇城以内，而根据明代的胡同

名称，外供用库在此条胡同的可能性极大。而至于是否为该院的地基所在也尚不能找到证据确认。

至清代乾隆年间，《日下旧闻考·京城总记一》记载：“四牌楼大街西边所有之卫衣胡同、太平侯胡同、五王侯胡同、车儿胡同、石碑胡同、宝禅寺胡同、帽儿胡同、宫衣库胡同，此八胡同为五参领之十四佐领居址。”<sup>④</sup>其中宫衣库胡同就是明代供用库胡同的演化名称。据清代朱一新

撰写的《京师坊巷志稿》记载：“前、后宫衣库亦称公用库，井一，桥一。神机营所属右前护军马队及右骁骑营抬枪队，均置厂于此，详兵制。”<sup>⑤</sup>这两条记载都说明这条胡同已经改为八旗官民的居住之处。清代乾隆年间绘制的《乾隆京城全图》上描绘的此胡同已经称为前公用库胡同（该条胡同上开辟了一条南北向小胡同称为后供用库胡同）。而且更为可贵的是，《乾隆京城全图》上该院在当时的详细建筑情况完整无缺（图一）。将《乾隆京城全图》与现状之建筑格局、建筑单体（图二）对照得出如下观点：首先，该院目前所处的地跨前公用胡同和后公用胡同的地盘形状在乾隆时期已经形成。其次，该院东路在《乾隆京城全图》上与现状之格局非常相似，只是乾隆时期为四进院落，大门朝南在前公用胡同开门；现状为三进院落，大门朝东在后公用胡同开门，且当时比现状多了一进前部的院落，目前前部的这部分已经不在院落范围内，而是另辟成院。目前的二进院和三进院的格局与乾隆时期的三进院和四进院的格局一致。最后，目前中路的前部为空场，与乾隆时期非常相似，当时亦为一座庭院，只是当时比现状多建有临街房屋和一道围墙。除了以上的相似之处外，其余建筑均不相符合。由于《乾隆京城全图》是乾隆十五年（1750年）成图，故而该院之现状格局必定是乾隆十五年以后改造而成。但是从乾隆十五年的图上表现出的该院布局和单体建筑看，该院当时应该已经是住宅建筑了，而不是仓库的建筑形制。

前公用胡同15号四合院现状之建筑为住宅和花园相结合的大型宅院形式，显然为某位官员的宅第，而乾隆十五年后最有可能将宅院改造成现状形制的主人便是清代后期曾购置此宅的满族官员崇厚。

《清史稿》记载：“崇厚，字地山，完颜氏，内务府镶黄旗人，河督麟庆子。……咸丰十年，署盐政，……明年，充三口通商大臣。又明年，迁大理寺卿，仍留津与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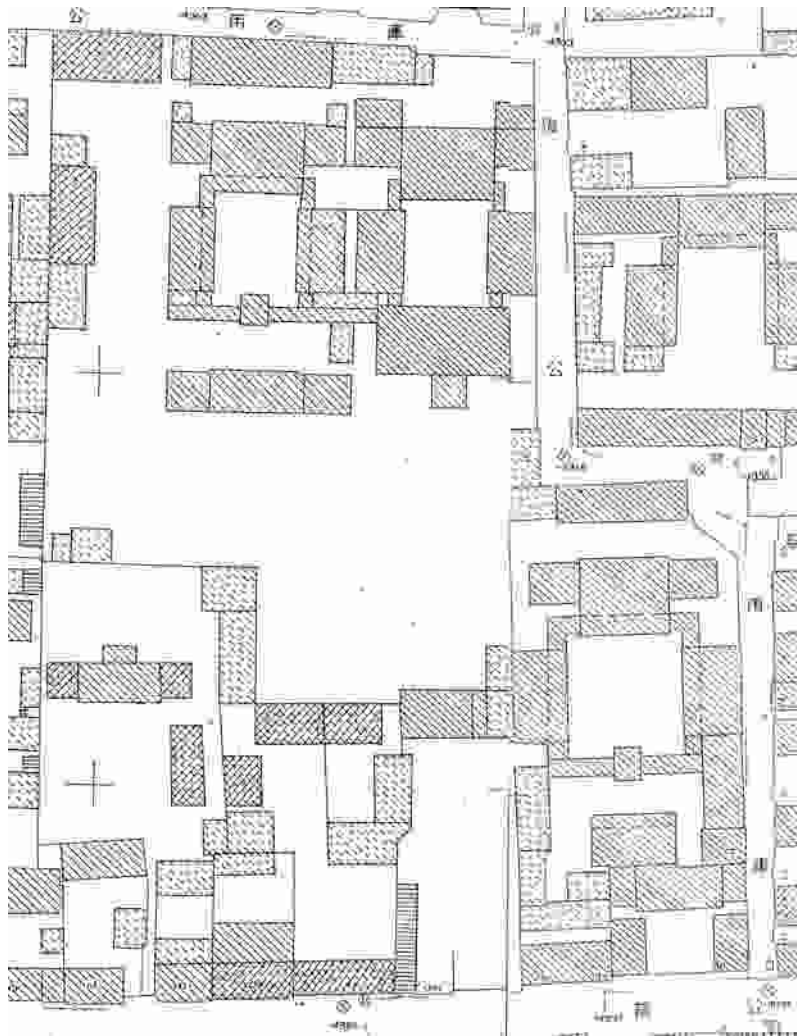
法重修租界条约。同治改元，以兵部侍郎参直隶军事，寻署总督。……九年，津郡民、教失和，被议。事宁，朝廷遣使修好，命充出使法国大臣，是为专使一国之始，然事毕即返。历署户部、吏部侍郎。光绪二年，署奉天将军，……四年，……授出使俄国大臣，加内大臣衔，晋左都御史。明年，赴俄。初，左宗棠进兵伊犁，乘俄土战争，要俄人退去库尔札，俄人多所挟求。至是，崇厚抵利伐第亚谒俄皇达使命，贸然与订和约。……上大怒，下崇厚狱，定斩监候，以徇俄人请，贷死，仍羁禁。更遣曾纪泽往俄更约，争回伊犁南路七百余里，嘉峪关诸地缓置官。十年，崇厚输银三十万济军，释归。遇太后五旬万寿，随班祝嘏，朝旨依原官降二级，赏给职衔。十九年，卒，年六十有七。”<sup>⑥</sup>需要赘述的是，完颜崇厚为金世宗完颜雍的第二十五世孙。崇厚的八世祖达齐哈因为立有战功随从顺治皇帝入关进京。由于清代和金代为前后沿袭的同宗同族关系，故而其家族被誉为“金源世胄，铁券家声”。

鉴于以上崇厚的简历，对于此院由崇厚建成的推测主要有以下几个理由：首先，现状之宅院的规模和格局为三路三进四合院，这并不是是一般官员能够拥有的宅院规模。其次，单体建筑上，宅院大门为广亮大门，在清代是一品和二品官员才能允许使用的宅门形式，而且花园部分采用了三间一启门的形式，更不是一般官员能够使用的单体建筑形式。最后，该宅院主体建筑年代为清代后期。纵观清代乾隆以后，仅曾使用此宅的崇厚最符合这些条件，且现存建筑年代也与崇厚的生平大体相符。另外，崇厚之父麟庆的住宅筑造有半亩园，是京城著名私家园林，此宅也带有花园，有受其父影响的可能。

而根据以上之分析，更进一步的推论宅院建成年代，由于该宅的规模和单体建筑上都表现出应为二品以上官员的宅第，其最早也应该是在崇厚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升任三口通商大臣（从二品）之后才

能按照这样的等级规制改造宅院。或是更晚一些的同治元年(1862年)任大理寺卿(二品)之后改造而成。

民国以后,据资料记载,张作霖部将傅双英曾居此宅,直至建国后才搬出。但是很可惜,傅双英生平尚未能查到。由于民国时期住宅上已经没有了等级的限制,所以傅双英时期也有改造该住宅的可能性。尤其是中路在大门前还有类似停车场的前庭,崇厚住宅时期不太可能将乾隆时期临街房屋和大门拆掉而形成院前空场,使花园前部显得突兀。这可能是民国时期为进出汽车方便,将临街房屋拆除并将清代崇厚花园的厅堂改造成目前花园大门。



图三 20 世纪 50 年代测绘的地形图

建国后,根据 20 世纪 50 年代测绘的地形图(图三),可以看出建筑格局、单体建筑平面与现存建筑一致。仅中路多出一座花坛。这也进一步说明该院的改建是在 1950 年以前。

## 二、前公用胡同 15 号四合院建筑形制与特色

### (一) 建筑形制

该院跨前公用胡同和后公用胡同之间,院落坐北朝南,分为东、中、西三路,三路院落并未对齐平行,而是呈现东路突出向前、中路退后、西路再退后的阶梯状排列。

东西两路三进院落,中路两进院落加一座门前庭院(如图二所示)。现存建筑年代为清代后期。

中路最前方为类似三间一启门的王府大门形式,铃铛排山脊筒瓦屋面,明间大门门扇开在中柱位置,圆形抱鼓石一对,前檐柱和后檐柱装饰雀替。门前两侧上马石一对,雕刻花卉和海兽图案。在古代,一般东侧用来上马,西侧用来下马。大门前有一座庭院,无建筑物,类似停车场。大门内第一进院为花园,中间有现代添建的叠石花坛。其北侧有花厅五间,过垄脊合瓦屋面,前檐部分明间隔扇门装修,前接六檩卷棚抱厦,次、梢间为槛墙、支摘窗,窗前各有假山石一方。后檐为老檐出后檐,明间开隔扇门,十字海棠

棂心。花厅东侧月亮门通第二进院。二进院正房三间，披水排山脊，合瓦屋面，前后出廊，前檐明间为隔扇风门，前出垂带踏跺四级，次间槛墙和支摘窗，步步锦棂心。正房东西两侧耳房各二间。东、西厢房各三间，披水排山脊，合瓦屋面，前檐明间为隔



图四 西路正房

扇风门，前出如意踏跺三级，次间槛墙和支摘窗，步步锦棂心。其中西厢房与西路的东厢房形成两卷勾连搭形式。院内建筑以游廊相连接。

东路广亮大门一间开辟于后公用胡同，东向，现已封堵。一进院内南房（倒座房）三间，披水排山脊，合瓦屋面，大门北侧有厢房四间。院落北侧有一殿一卷式垂花门一座，垂莲柱形垂柱头，垂柱头间装饰雀替，方形门墩。垂花门两侧南面为看面墙，北侧为抄手游廊，四檩卷棚顶，筒瓦屋面，绿色梅花方柱，柱间步步锦棂心倒挂楣子、花牙子。二进院内正房三间，披水排山脊，合瓦屋面，前后出廊，明间为隔扇门，前出垂带踏跺四级，次间槛墙、支摘窗。两侧耳房各二间。东、西厢房各三间，披水排山脊，合瓦屋面，前出廊，装修同正房，明间前出如意踏跺三级。院内房屋以游廊相接。三进院为后罩房五间，过垄脊合瓦屋面。西侧接耳房二间，过垄脊合瓦屋面。此路的建筑彩画均为箍头包袱彩画。

西路一进院南房三间，披水排山脊，合瓦屋面，明间隔扇门，次间槛墙、支摘窗。两侧耳房各二间。院落北侧为一殿一卷式垂花门一座，垂莲柱形垂柱头，垂柱头间装饰雀替，方形门墩。垂花门两侧连接看面墙，看面墙上开什锦窗，墙北侧为抄手游廊，四檩卷棚顶，筒瓦屋面，绿色梅花

方柱。二进院内正房三间，披水排山脊，合瓦屋面，前后出廊，前檐明间隔扇门，前出垂带踏跺五级，次间槛墙、支摘窗（图四）。正房两侧耳房各二间。东、西厢房各三间，披水排山脊，合瓦屋面，前出廊，前檐装修同正房，明间前出如意踏跺三级。厢房南侧带厢耳房各一间。院内建筑装修均为步步锦棂心。三进院后罩房五间，披水排山脊，合瓦屋面。此路的建筑彩画均为箍头包袱彩画。

#### （二）建筑特色

此院为北京四合院中具有代表性的大型四合院，一方面它规模大，传统四合院中的各种建筑要素较为齐全。另一方面它格局保存完整，单体建筑保存状况较好，且现代补做的装修也基本上是按照传统题材和形制恢复。其建筑特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建筑融住宅与园林为一体。此宅以中路为花园，东路和西路为住宅，花园内以一座花厅作为主体建筑，花厅前的庭院内较为空旷，没有太多建造，仅种植高大树木，在夏日形成绿叶蔽日的环境，未利用太多造园手法，建筑氛围朴实。

2. 此院建筑使用功能较为明确。此宅东路应为主路，因其整座宅院的大门开辟在此路。在古代可能作为宅院主人的起居室和会客室。中路为花园部分，建筑功能

上属于游赏区。花园中的主体建筑为第一进院的花厅，花厅一般可以作为主人会客、观看演出和平时消夏纳凉之用，尤其是花厅前檐接出的抱厦更可以作为演出戏剧的戏台。花园后院为一正两厢格局，与东、西路第二进院相同，其使用功能可以作为宅院主人夏日避暑小住。西路的建筑在建筑格局上与东路几乎相同，只在单体建筑上与东路有一定区别。西路没有临街大门，要从中路或东路进入，空间相对较为私密。另外，西路的二门位置的看面墙上开有形式各异的什锦窗，其建筑形式上和空间氛围上更为活泼（图五）。由此可以推断可能为宅院的女眷居住。

3. 宅院建筑等级较高。宅院大门为四合院中等级最高的一种宅门形式——广亮大门。这种大门在封建社会只有二品以上官员才能使用。其花园大门更是采用了类似王府大门的形式，在宅院正中开三间一启门的大门，只是屋面没有采用一般王府常用的硬山调大脊的形式。除了上文所说的民国时期改造成目前的形制外，也有另一种可能，虽然在清代除了王公亲贵外，任何一级的官员宅院不能使用三间的大门和筒瓦屋面的建筑，但是宅院的花园部分往往例外，由此推测这座三间的大门可能就是临街大门之后花园里的第二道大门。亦或是清代末期的宅院主人崇厚因为这样的建筑等级容易招来逾制的罪名而遭弹劾，所以并没有将其建在临街位置，而是建造了一个前庭作为遮挡。当然，这种可能性相对前两种要小一些。一则因为清代对于花园之中的建筑并没有严格的建筑等级限

制，很多大臣的花园都使用了较高等级的建筑形式。二则这种堂而皇之的建筑是不可能可以掩盖的。

4. 北京四合院的各种建筑要素齐全。此院除了等级高外，还可以看作是北京四合院建筑的代表，该院有大门、倒座房、垂花门、看面墙和廊子、正房、耳房、厢房、后罩房和花园，具备了北京四合院建筑的几乎所有单体建筑要素。

5. 宅院基地随形就势布局合理。由于该宅院处于前公用胡同和后公用胡同之间所形成的弯曲形地块内，东部南北进深短，西部南北进深长，宅院也采取了梯形的布局。而且将花园置于中路，这种布局较为方便东路和西路的居住者进入花园，较之一般的宅园相结合的四合院将花园安置在偏居宅院一侧的方法更方便进入。

### 三、四合院调查和分析方法

笔者对北京地区大量四合院进行调查之后认为，由于前公用胡同 15 号四合院具备了北京四合院的各单体建筑要素的大部分要素，而且建筑历史悠久，那么对其的调查和分析可以看作是考察四合院的一个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例子。具体的考



图五 西路看面墙上什锦窗



察方法上，本文借鉴了祁英涛先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出版的《怎样鉴定古建筑》一书中调查和鉴定古建筑的方法，<sup>⑦</sup>并结合四合院的实际情况，将北京四合院的调查方法归结为三步走，即一查，二看，三分析。

#### （一）一查，调查前的准备工作

一查是调查前的必要步骤，也就是在现场调查之前先查阅相关资料，了解所调查院落的大概历史沿革和重要历史节点。由于四合院多处于街巷之内，故而对记录城市街巷史籍的查找应作为重点。另外四合院多数为住宅功能，那么它必定涉及到相关的宅院主人。故而对有关人物方面的史籍也是查找重点。

#### （二）二看，现场调查和记录

二看也就是现场对四合院建筑及相关附属文物的调查、记录和拍照。在这一流程中要详细记录建筑的基地环境形势、建筑整体格局、单体建筑形制、装饰装修和附属构件情况以及庭院旧有绿化。除此之外，标画出四合院的总平面图是现场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往往图纸更直观和清晰地表达建筑格局和单体建筑之间的关系，有条件的可以标画建筑单体的立剖面草图。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对现存建筑的年代做出初步判定。

#### （三）三分析，对所掌握资料的综合分析

第三个流程就是将一查和二看两部分所得到的资料，利用归纳总结、对比、推理等方法进行综合分析。以前公用胡同 15 号四合院为例，首先在一查部分已经找到了较为详尽描绘该院的《乾隆京城全图》和 20 世纪 50 年代的图纸资料，将之与二看部分得到的资料对比，《乾隆京城全图》与现状不符，20 世纪 50 年代地形图与现状相符，也就是第一点可以判定建筑在乾隆十五年（1750）后和 1950 年之前改造。其次二看部分调查所得，其宅院大门为广亮大门，与一查部分所查得的宅院主人对比，有记载的在此居住过的一品、二品官员只有清代后期的崇厚，且现场调查认定建筑年代

为清代后期，故可以判定是崇厚住宅时期基本形成现状情况。又现场调查发现，宅院中路部分在院落的大门前方有一座空场，类似停车场，这与一般清代四合院不相符，而这恰是民国时期某些大型宅院为了停车的设置之一。其与一查部分资料对比分析，于是得出了上文所述的两种可能性的推断。最后，将二看部分所调查的资料放在其所属的北京四合院这一类型中比较，可以得知该院属于大型带花园建筑，单体建筑类型丰富，建筑特色明显，可以作为北京四合院代表院落。

以上的调查和分析方法更偏重于流程性质，它也可以视作不作精密测绘情况下调查四合院的一种工作方法或基础方法，因为四合院调查和分析方法不可能是一概而论的，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如一些四合院还要具有辨识复建和古建筑的能力；再如四合院中的附属构件包括砖雕、石雕和木雕等，对它们的分析也有助于更为全面地了解四合院。因此具体调查和分析过程中应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

①（明）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年 1 月，第 12 页。

②（明）宋濂：《元史》，中华书局，1976 年 4 月，第 2263 页。

③（清）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 年 4 月，第 1820 页。

④（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年 2 月，第 583 页。

⑤（清）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年 1 月，第 143 页。

⑥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 年 12 月，第 12476—12477 页。

⑦祁英涛：《怎样鉴定古建筑》，文物出版社，1981 年 6 月。

（作者为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副研究员）

# 清末各省捐资修正阳门之始末

贾若钺

屹立在天安门广场南端的正阳门，始建于明永乐年间，距今已有近600年历史，漫长岁月中遭遇数次兵创火毁，多次重建。如今我们见到的正阳门城楼与箭楼这两座古建（图一），早已非明初的正阳门，而是1907年由袁世凯主持重建的正阳门遗存。在近现代的历史风云中得以完好保存的正阳门实属难得，但还有一件难得的事情是，保存至今的正阳门乃是清朝末年举全国之力兴建而成，因为彼时国库无银，重修所需的银两是由当年各行省“报效”，即捐资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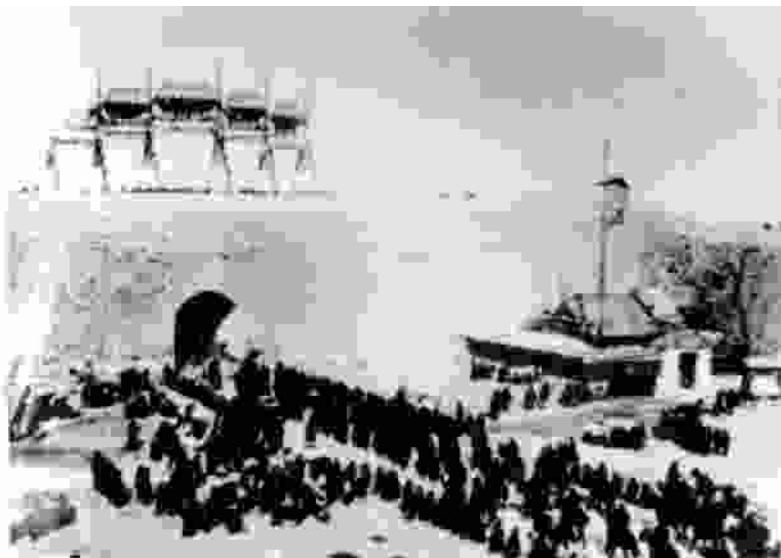
## 一、各省的艰难“报效”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挟光绪仓皇出逃西安，北京城惨遭践踏，正阳门的城楼与箭楼也均被毁坏，只余下光秃的城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慈禧太后拟启銮回京之际，特别钦点了两人负责京城蹕路工程的修缮，其中一位就是之后首倡捐资重修正阳门的顺天府尹陈夔龙。作为回銮必经之处的正阳门虽然是蹕路工程的重要一部分，且已经残破不堪亟需重建，却因实在筹措不到足够银两只能暂且作罢。为讲求皇家礼仪与体面，主管工程的陈夔龙不得不在残存的正阳门城台上搭建起彩牌楼以勉强应景（图二）。



图一 今日的正阳门城楼与箭楼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年中,已调任漕运总督近半年多的陈夔龙,却依旧心系踬路工程中因资金不足未能重建的正阳门,特地折朝廷提出“京师正阳门门楼工程重要,竭诚报效银两以济工需,开各省大吏如能踊跃输将,不难同襄盛举”,倡议各省督抚合力出资重建正阳门,并率先奉上廉银一万两以作表率。虽然陈夔龙一片赤忱,但是响应者寥寥无几,“詎皆置若罔闻”<sup>①</sup>。督抚们冷漠的态度在时局中不难理解,本来所谓的“报效”就不过是捐资、捐款比较好听点的说法,直白地说无非是代表中央伸手向各地要钱。从经济上而言,清末国家战乱频繁,对于国民经济的影响相当巨大,财政窘迫的估计不只中央,各地经济或多或少也受到了冲击,更有不少省份可以说遭遇重创,所以后来各省巡抚、总督、将军等封疆大吏在报效折中所言“度支奇拙”<sup>②</sup>、“搜刮一空,度支万窘”<sup>③</sup>、“库储支拙,无款胜挪”<sup>④</sup>、“帑藏奇拙”<sup>⑤</sup>等语,也并非尽为夸张,时局维艰确是事实。再者,从政治上来看,依照当时的形势,光绪末年清王朝已经明显呈现日薄西山之象,清廷中央集权的影响力已经渐渐被削弱,各省各地能够对中央的号令响应到怎样的程度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此清廷能否筹到钱不说,还极可能引起各地封疆大吏的不满,加速地方与中央的离心。另外,除却经济与政治的因素,就个人而言,相对于陈夔龙这位曾经的“北京市长”与踬路工程主管,各省督抚对于重建这座与地方无半分关联的正阳门又能抱有多大的热情,又是否赞成这一大工程?陈夔龙在其自己所著《梦蕉亭杂记》中提到:“南省某督素负盛名,至谓如此巨款,



图二 迎接两宫回銮的仪仗与正阳门上的彩牌楼

可惜徒事工作,何不移作兴学之用,较有实际”<sup>⑥</sup>,证明对于捐资一事不仅有督抚全无热情,甚至直言此举不务实际。陈夔龙的首倡捐资成为一场几乎无人响应的困局。

一筹莫展之际,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出面打破了这场困局。继陈夔龙之后,袁世凯以“北京正阳门四面门楼及城被毁,中外出入,殊损观瞻。工极浩大,尚望各省同力合作,以成要工,能筹解若干迅速电示”<sup>⑦</sup>为由,再次向全国倡议“报效银两”、“共襄盛举”。

结果如何?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一份奏折给出了答案,上面详细记载着倡议报效的结果:“谨将各省筹解正阳门楼工款数目缮具清单恭呈御览。计开:一收直隶总督解到库平足银五万两;一收察哈尔都统解到库平足银五千两;一收库伦办事大臣解到库平足银六千四百八十两零三钱;一收两江总督解到库平足银二万五千两,一收常镇关解到库平足银一万两;一收江海关解到库平足银二万两;一收漕运总督解到库平足银一万两;一收安徽巡抚解到库平足银二万两;一收山东巡抚解到库平足银三万两;一收山西巡抚解到库平足银一万两;一收河南巡抚解到库平足银三万两;一收陕西巡抚解到库平足银二万

两；一收陕甘总督解到库平足银一万五千两；一收伊犁将军新疆巡抚共解到库平足银三千两；一收闽浙总督解到库平足银三万两；一收福州将军解到库平足银一万五千两；一收闽海关解到库平足银二万两；一收浙江巡抚解到库平足银四万两；一收江西巡抚解到库平足银一万两；一收湖广总督湖北巡抚解到库平足银四万两；一收荆州将军解到库平足银三千两；一收湖南巡抚解到库平足银二万两；一收四川总督解到库平足银二万两；一收云贵总督解到库平足银一万两；一收两广总督广东巡抚解到库平足银三万两；一收贵州巡抚解到库平足银六千两，总共收库平足银五十二万三千四百八十两零三钱。”<sup>⑥</sup>

根据《清代职官表》的记载，光绪二十八年未至三十一年初全国常设有9位总督、11位巡抚（不含总督兼职巡抚者），依照奏折看来基本全数为修正阳门“买单”。作为近畿省份，直隶在“庚子事变”前后应该是各省中遭受冲击最大的，而袁世凯携直隶一省共捐资五万两，为各省最多，这一方面是作表率之用，另一方面也是袁世凯实力的昭示。紧接直隶的是浙江巡抚四万两，湖广总督兼湖北巡抚四万两。报效三万两的分别是山东巡抚、河南巡抚、闽浙总督、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河南巡抚报效的三万两居上等水平，新任河南巡抚正是前任漕运总督陈夔龙，倡议之事正是他最先提出，报效之事自然倾力为之，实属一片忠心。两江总督、四川总督、陕甘总督兼甘肃巡抚、陕西巡抚及湖南巡抚分别报效二万五千两到一万五千两不等。山西巡抚、江西巡抚和云贵总督的报效银两相对较少，为一万两，贵州巡抚捐资最少，为六千两。这也基本上反映了各地经济水平的真实对比，江浙、福建、两广、山东等沿海地区的经济实力相对较强，报效多；贵州、云南及甘肃等地经济发展则相对落后，报效则少。

除却行省外，海关与军防大员也有不少响应的，常镇、江海、闽海三关及察哈

尔都统、荆州将军、福州将军等军防大员也响应倡议，报效银两几千至上万不等。其余特殊行政统辖的边疆地区如新疆、蒙古各地捐资均在万两以下，其中伊犁将军、新疆巡抚合计起来也只有三千两，是26份捐资中最少的，这有经济发展水平的原因，同时清廷在边疆的统辖力度与影响力不及其余各省应该也是一个原因。

全国没有报效银两的除却盛京、奉天、吉林、黑龙江等“满洲自留地”可能有清廷的特殊照顾外，便只有江苏巡抚与广西巡抚，原因难以详明。不过管辖这两地的两江总督与两广总督均有捐资，也不能说江苏、广西全然未报效。然而不管报效银两的多与少，经济实力的强与弱，总之各位封疆大吏给足了袁世凯面子，袁世凯也筹足了重建正阳门所需的银两。

## 二、正阳门的重建与报效银两的分配

因为袁世凯的插手，重建正阳门所需的银两得以成功筹足，同时清廷又顺水推舟将正阳门的重建筹划工作一并交付于他：

“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命着派直隶总督袁世凯、顺天府府尹陈璧估修正阳门工程”<sup>⑦</sup>。因为战乱的缘故，工部的工程档案丢失不少，其中就包括正阳门的相关工程卷宗。因此袁、陈二人在筹划正阳门重建工程时便参考了当时的崇文门与宣武门的形制，在这两座城门的基础上加高、加宽而最终确定了正阳门的形制。如袁世凯向朝廷呈报的正阳门重修勘察结果所奏：

“钦遵会商办理。伏理正阳门，宅中定位，气象巍峨，所以仰拱宸居，隆上都而示万国，现在奉旨修复，其工费固宜核实樽节，而规模制度究未可稍涉庠隘，臣等一面遴委天津道王仁宝，敬谨驰往详细勘估，一面咨部调查旧卷，稽考原建丈尺，以便有所遵循，旋准工部覆称，该部自经庚子之变，从前案卷全行遗失无存，臣等迭次往复函商，博采舆论，原建丈尺，既

已无凭稽考，惟有细核基址，按地盘之广狭，酌楼度之高低，并比照崇文、宣武两门楼度酌量规划，折衷办理。查崇文门大楼（笔者注：大楼即指城楼）面宽十丈一尺五寸，高八丈二尺八寸，箭楼现尚未经修复，宣武门大楼面宽十丈二尺二寸，高八丈二尺二寸，箭楼面宽十丈九尺五寸，高六丈八尺四寸二分，以上楼度尺寸皆系自地平至正兽上皮止计算，城身均不在内，查正阳门大楼旧址面宽十三丈另六寸，较崇文、宣武两门大楼面均增二丈有奇，其箭楼旧址面宽十一丈八尺五寸，较正阳门大楼面宽已窄一丈二尺二寸，较宣武门箭楼面宽仍增九尺，自应准宽为高，格外崇隆，以宏体制。今拟除城身不计外，正阳门大楼自地平至正兽上皮止，谨拟九丈九尺，较崇文门大楼高一丈六尺二寸，较宣武门大楼高一丈六尺八寸。正阳门箭楼自地平至正兽上皮止，谨拟七丈六尺三寸（合门尺改为七丈六尺七寸），较正阳门大楼低二丈二尺七寸（改为低二丈一尺三寸）。较宣武门箭楼高七尺八寸，后仰而前俯，中高而东西两旁皆下，似与修造作法相合，而体格亦尚属匀称……”<sup>⑧</sup>，又据奏折所述，重建的正阳门城楼高度拟为“九丈九尺”，由此也可知老北京民间俗语之“前门楼子九丈九”一说是确实实的数据，而并无修饰夸张的成分。

在重建的形制得到“依议钦此”的批复后，袁世凯等也很迅速地将工程所需材料、钱银及丈尺分缮清单等再次向朝廷奏报：“……当经咨查工部，因旧卷遗失，原建丈尺无可稽考，现在重新修建，既已详筹，程度尤须慎选良材，庶足以固若金汤，垂之永久。派据正任天津道王仁宝，指分安徽试用道尹家楣，查得此项工程，需用大小木植数千件，内以金柱、中柱为最重，详加商酌，惟黄梨木体坚干直，极为合用。其次则用角梁，稳中有降件亦需任重之材，宜用铜梨木。余若翹飞斗科各件宜用樟木。椽、梁、额枋各件宜用黄花松木。檐柱、铜柱以及装修各件，宜用杉木。如此分别

配用，庶节慎度支之中，仍寓保固工程之意。至于琉璃瓦件、木叶铁等项由户、工二部行取，所费转钜，今拟统归商办，以期核实。该道等饬厂商据造具作法、钱粮、丈尺清册，呈送前来，臣等会同详核，所拟作法系照部定‘营造章程’办理，尚属妥协，其楼度、库门、炮窗各尺寸，遵照门尺计算度数，均得吉星，所估钱粮悉心核计，按照市价再四删减……现在物料、人工无不增昂，此项钱粮委系核实估计，并无浮冒，由各省报效项下先行发给银十八万两购措材料，余俟陆续具领……以上大楼工程共拟给工料二两平十成足银二十万四千二百二两四钱二分……以上箭楼工程共拟给工料二两平十成足银十五万五千六百九十八两八钱七分。”<sup>⑨</sup>

重修工程中除却最主要的城楼与箭楼外，其余附属建筑也有不少需要重建或修整，为此捐资银两中也分拨出不少给这些工程：“再查正阳门原有堆拨房两座，东马道门楼一座，现皆拆毁，大楼下前后二面城身，上面宇墙，两山礮擦，外口海墁，东西马道礮擦，地面象眼、城墙并箭楼下罩门圈、千斤闸，两边将台之台帮、台面礮擦皆有塌裂情形，均应一律修复……谨将估修正阳门罩门窗，千斤闸，城台、宇墙、东西马道、礮擦、象眼墙、门楼栅栏并堆拨房、海墁等工程，所有丈尺，作法，各项工料钱粮数目，缮具清单，恭呈御览……以上九项工程共拟给工料二两平十成足银一万三千九十八两七钱一分……计大楼（城楼）二十七万四千二百另二两四钱二分，箭楼十五万五千六百九十八两八钱八分，附属建筑一万三千九十八两七钱一分。总计用四十四万三千两，正阳门重建工程知照钦天监择定吉期即行开工，立限三年，自光绪二十九年五月承揽工程起，至三十二年五月止全工程齐。”<sup>⑩</sup>

在工程开始前实际收到的报效银两总额如奏折所呈报：“查各省报效正阳门工款，共银五十二万三千余两。内直隶报效银五万两，济京师医学堂经费。滇

省报效银一万两，因军务缓解外，计银四十六万三千四百余两”<sup>⑬</sup>，照预计工程费用来看是完全够用。报效的银两除用于正阳门外，最先就已将直隶报效的五万两补贴给京师医学堂作为经费使用，再在用于修建工程的款项中拨出八百多两用于西直门的维修，“再各省筹解正阳门楼工程银两，除前京师工巡届奏拨医学堂经费库平五万两外，实收库平银四十七万三千四百八十二两零三钱，申合京平银五十万零三千七百零二两四钱四分七厘，开除大楼门楼东西闸楼等工给价银四十九万八千九百二十二两，又拆平西直门角楼工价银八百四十九两外，尚余京平银三千九百三十一两四钱四分七厘。”<sup>⑭</sup>最后还有近四千两的剩余，由邮传部尚书、原顺天府尹陈璧具奏上报敬候圣旨办理。

以上报效银两主要用途均在于采购重建所需的材料，另外修建工程中的木料采购及各项人工、劳务等费用则是从这四十多万两白银的利息中支付的：

“邮传部尚书臣陈璧跪奏，为核销工程息款藉充经费银两，恭折祈圣鉴事。窃正阳门楼工程，派员设局监修为时甚久，驻工委员供事人役薪工及一切杂支，若动用正款所费不皆请由各省解到工款暂存，未放项下发商生息，即以所得息银开支员司人役薪工杂项，一俟工竣实覆奏报，于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经臣会同臣袁世凯奏奉谕旨允准在案。查此项息款，陆续共收银二万九千二百一十三两六钱四分，开除项下：一、采办木料支发奉天大东沟及英国伦敦南洋新加坡等处电报，各费银一千九百五十两三钱；一、派员前往各埠催办木料，发给川资银二千九百一十四两；一、大楼阁楼竖柱供梁合龙，犒赏工匠头目四次，及抚恤跌伤工匠三次，共银六百一十两；一、自光绪二十九年五月起至三十一年九月止，连闰计二十九个月，每月开支驻工委员薪水四百十四两；又自三十一年十月起至本年四月止，连闰计十九个月，

酌减经费，每月开支驻工委员薪水二百零四两，计发银一万七千九百十二两；一、自光绪二十九年五月起至本年六月止，连闰计五十一个月，每月开支公所房租、调派巡警及消防队月饷并供事听差薪工纸张笔墨各项，每月约用银一百十五两，计发银五千八百六十五两。以上统共发银二万九千二百五十一两三钱，不敷银三十七两六钱六分，由臣垫发并未动支正款。”<sup>⑮</sup>由奏折得知利息款一共是二万九千二百一十三两六钱四分，最后合计支出是二万九千二百五十一两三钱，差了三十七两六钱六分，由陈璧本人垫付。

正阳门的重建工程并未能如预计的那样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完工，根据《清实录》的记载，工程是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一月完工，比预期晚了一年半。由当时的局势结合现存资料推断，工程中原材料的采办不顺利应该是延期的一大原因。正阳门重建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清廷内外交困的局面加剧。一方面受国内动荡不安的局势影响，原料的采办相较平时会艰难许多，《清实录》里记载光绪三十二年四月，时任户部右侍郎的陈璧向朝廷奏称正阳门楼各项工程厂商办料为难，耗费甚巨，拟在原先估算的费用之上添加一成以示体恤之事，可见采办确实不易。另一方面，在国际上清王朝地位一落千丈，任人宰割，往来物资运输都不得畅行。在现存的一份奏折中可以看出因为清王朝的积弱，以致影响了所需原材料的交通运输：“再查正阳门楼工程，前经承办厂商具结，限于光绪三十二年五月间竣工，业已奏明在案。此项工程厂商等运到之樟杉各木，现均次第成做，琉璃瓦砖块亦已陆续到齐；所办新嘉坡（笔者注：即新加坡）大木已报装船起运。惟黄花松木，因该商前向奉天安东县属大东沟购买，上年秋间正拟运回，旋被日本军队拦阻，嗣经外务部照商日使方允放行。该处不通轮船，复值冬令，风潮未顺，民船不便行驶，现委分发四川知县张煦春驰赴大东沟照料，

一面饬商进山转运到沟，趁此水旺风顺之时即行开船运津，赶紧成做……”<sup>⑧</sup>，由奉天海运回京的木材遭遇日本军队的拦截，由秋天耽误到第二年正月，白耗了小半年的时间。

虽然有着诸多不易，不过从各项奏折来看，整个工程规划有条有理，各项开支清晰明了，各省的报效得到了很好的利用，正阳门虽未能在预计的时间内修好，但仍是顺利兴建完毕，屹立至今。

### 三、袁世凯的意图

从提倡报效银两到重建正阳门的整个事件中，最初倡议者陈夔龙忠心可嘉，在此等困局中直言要求各省捐资报效，满腔热情确属牵挂京师建设之诚意。在其晚年所著《梦蕉亭杂记》中详细记下了从他主管踬路工程到倡修正阳门的这一过程：

“庚子京师拳匪之乱，正阳门城楼化为灰烬。辛丑两宫回銮有期，余奉命承修踬路工程。以規制崇闳，须向外洋采办木料，一时不能兴工。不得已令厂商先搭席棚，繚以五色绸绫，一切如门楼之式，以备驾到时藉壮观瞻，然费帑已数万金。余旋外任，此项工程无人过问。漕督岁支养廉约九千五百两，公费亦有万两。余素崇节俭，不尚奢靡。当节省岁入一万两，作为报效重修正阳门城楼之需，以为各疆吏倡。计全国二十一行省，大省报效二万，小省报效一万，可凑集数十万，保难克日兴修。詎皆置若罔闻……”<sup>⑨</sup>。回忆中不难看出陈夔龙用心做事的负责态度，以及事与愿违的痛心。

而本与此无干的直隶总督袁世凯对此事同样十分用心，这份积极的态度则颇有可探究之处。陈夔龙回忆袁世凯还曾就报效之事严厉质问各位封疆大吏居心何在，“某督入觐，面奉懿旨，谓门楼为中外观瞻所系，急须修建，‘漕督曾报效银一万两，各省督抚受恩深重，而竟置之不理，不知是何居心’……”<sup>⑩</sup>，之后在倡议各省报效

银两之时更是捐出白银五万两以作表率，大大超出各省平均捐资额度，其热心程度与各位督抚的冷漠无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对照晚清局势，袁世凯与督抚们大相径庭的表现其实不难理解。陈夔龙是真心实意想做事情，袁世凯则是心不止于此，在这件事情上夹带了自己的政治意图，或者更真实地说，其实是为政治意图而夹带着重修了正阳门。重修正阳门不是袁世凯接手此事的理由，或者说不是全部。事实上，身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亲自负责管理城门的筹款与重建，颇有不务正职与大材小用之嫌，但是这位当时政坛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并不做赔本的买卖，这件事情有他自己的考虑：一方面正阳门地位重要，完成其重建可以作为个人的一项功绩。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对于袁世凯而言此事还有着“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意，由他主持重建的正阳门本就蕴含着“宅中定位”的深意，会商报效之事更需全国响应。当时的袁世凯已有掌控朝局之势，此次重修正阳门正是宣示并验证自己影响力的良机。如果清廷出面不能做到的事情而袁世凯有能力做到的话，正是其有能力制霸天下的一大证明。陈夔龙约在光绪二十八年七、八月间上折朝廷请求重建正阳门，除十月有荆州将军上折报效两千两外，朝廷大员均无甚反应。从十二月开始各省督抚陆续上折响应报效，奏折中几乎都有类似“京师正阳门工程浩大，前准直隶总督臣袁世凯电，议各省筹款修建……”<sup>⑪</sup>，“准直隶总督臣袁世凯电，开北京正阳门四面门楼及城被毁，中外出入，殊损观瞻。工极浩大，尚望各省同力合作，以成要工，能筹解若干迅速电示……”<sup>⑫</sup>，“并准直隶督臣袁世凯来电，以工极浩大尚未举办，催令合力筹解……”<sup>⑬</sup>，“漕运总督陈夔龙奏京师正阳门门楼工程重要竭诚报效银两一折，奉朱批：户部知道，钦此。由部抄录原奏，飞咨查照酌办，旋准直隶总督袁世凯电商前因……”<sup>⑭</sup>之类的话语，明显是因为有了袁世凯的再次倡议报效后，各督抚才纷纷开

始响应的。

又根据《清实录》与奏折的记载，光绪二十八年袁世凯开始倡议报效，到二十九年（1903年）底关于重建正阳门的相关工程做法、钱粮分配等各项筹建事项安排妥当后，正阳门的重修工程便完全由陈璧负责，“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谕军机大臣等：袁世凯奏差务太繁，请酌量开去各项兼差一折。前因庶务殷繁，以该督向来办事认真，特加倚任，先后派充商务铁路电政大臣，并会订商约商律各事宜及督修正阳门工程。兹据奏称兼差太繁，力难兼顾，自属实情，除商约尚须续议，铁路时有交涉事件均关系重要，着毋庸开去。电政甫归官办，一切正资整顿，仍着该督督办。至商务商律现已设有商部，即着责成该部详议妥订。正阳门工程着陈璧就近督修，俾该督于应办各事专心经理，以示体恤，将此谕令知之”<sup>①</sup>。确实在最重要的事情得到确定后，袁世凯对于此项工程不会有兴趣也没有必要亲力亲为了。

各省捐资修正阳门圆满落下帷幕，袁世凯大获全胜，借修正阳门一事巧妙且成功地证实了他不一般的影响力。疆臣们有几分心甘情愿难以得知，只是袁世凯要向帝后表忠心，要证明自己的影响力，最后由全国各省替他买单。所谓报效朝廷，不过是迫于袁世凯的压力。时至今日，当年的各色人物不论是非成败均早已作古，惟独正阳一门依然屹立。某种意义上而言，依旧守望着北京城的正阳门才是真正大获全胜的。

①⑥⑦⑧（清）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71页。

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陕西巡抚升允奏报解赴户部交纳京师正阳门工程银两事》，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七日。

③⑦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粤省奏为报效微款以济正阳门门楼要工事奏折》，光绪

二十九年三月初二日。

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奎顺等奏为报效正阳门工程银两恩赏收折》，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荆州将军济禄等奏为报效微款稍济正阳门门楼要工事奏折》，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七日。

⑧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户部右侍郎陈璧呈各省筹解正阳门楼工款数目清单》，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十六日。

⑨《清德宗景皇帝实录》（七），中华书局影印，2008年，第61684页。

⑩⑪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直隶总督袁世凯顺天府尹陈璧奏为正阳门楼原建丈尺无案可稽谨会同酌拟办法请旨事奏折》，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

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袁世凯陈璧奏为正阳等门城垣楼座勘估情由事奏折》，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初八日。

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邮传部尚书陈璧奏为正阳门楼工竣所余银两恭候命下钦遵办理事单片》，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邮传部尚书陈璧奏为核销正阳门楼工程经费银两事奏折》，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商部左侍郎陈璧奏为正阳门楼工程所购黄花松木由大东沟即行开船运津赶紧成做事奏片》，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

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闽浙总督许应骙奏为闽省汇解京师正阳门工程银两事奏折》，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浙江巡抚布政使奴才诚勤）奏为报效正阳门工程银两恭折具陈仰祈圣鉴折》，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⑲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陕西巡抚升允奏报解赴户部交纳京师正阳门工程银两事奏折》，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七日。

⑳《清德宗景皇帝实录》（七），中华书局影印，2008年，第61894页。

（作者为正阳门管理处馆员）



# 文津街至景山前街沿路古建拆除纪实

孔庆普

清代以前，内城中部有皇城和紫禁城，东西向没有直通道路，民国元年（1912年）开通西安门、北上西门和北上东门。民国三年（1914年）在汉花园以东的皇城墙上开辟豁口，通过弓弦胡同和翠花胡同与猪市大街连通。从此，阜成门至朝阳门之间总算是有了一条连通道路。民国八年（1919年）拆除北上西门和北上东门，改修鸳鸯桥桥面，加宽汉花园桥，道路交通有所改善。

新中国建立后，1950年制定的《北京市城市道路建设规划》中包括阜成门至朝阳门及其延长线道路改扩建规划。

阜成门至朝阳门之间道路改扩建工程，影响到的古代建筑有：阜城门、白塔寺山门、帝王庙门前的两座木牌楼和三座石桥、西四牌楼、西安门、文津街三座门、金鳌玉蝀桥及金鳌玉蝀牌楼、团城、中南海北墙、团城东三座门、筒子河西北角、大高殿门前的三座牌楼和两座习礼亭、鸳鸯桥、北上门及其两侧的108间朝房、汉花园桥、东四牌楼、三官庙山门、朝阳门。

1954年10月中旬，市政府批准文津街至北池子北口道路改扩建工程列入1955年道路基建工程计划。同时批准文津街三座门和团城东三座门以及大高殿木牌楼拆除工程。

是年11月上旬，建设局开始安排施工准备工作，道路一公司和二公司开始勘查现场，核对工程初步设计图。此段道路上阻碍交通最严重的路段是金鳌玉蝀桥及团城南面。桥面净宽8.5米，最大坡度7%。金鳌玉蝀牌楼的明间净宽5.6米，边间净宽3.6米。团城和东牌楼之间最小距离是7米，路面最窄处是5.5米。

此段道路上有影响的古代建筑，除已批准拆除的文津街三座门（两道）、团城东三座门（两道）、大高殿木牌楼（两座）外，还有金鳌玉蝀桥及金鳌玉蝀牌楼、团城、中南海北墙、筒子河、大高殿南牌楼、习礼亭（两座）、鸳鸯桥、北上门及其两侧的108间朝房。

建设局遵照市政府指示，于1954年10月24日邀请部分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和有关工程界人士开座谈会，座谈会由都委会常委技术处主任林治远主持，出席座谈会的人士有：陈占祥、陈明绍、林治远、袁德曦、李善梁、王文俊、华揽洪、张开济、朱兆雪、华克专。会议记录人为孔庆普。

此次座谈会的内容主要是技术性研讨，讨论研究古代建筑物的处理方式方法。综合大家的发言，（一）团城和金鳌玉蝀桥必须保留。（二）金鳌玉蝀牌楼和大高玄殿南牌楼，民国年间已改建混凝土牌楼，可以拆除。鸳鸯桥可以改建。（三）北上门及其两边的朝房和习礼亭，必须拆除或易地重建，不然道路无法展宽。如何处理应该由故宫博物院安排。（四）关键问题是，金鳌玉蝀桥附近的道路改扩建工程，也是最大的难题，建议成立专业组，进行专题研究。

张友渔副市长批准成立专业工作组，要求制定出几个比较具体的解决方案。专业组的成员单位，以规划局及市政设计院为主，包括市政府文物组、建设局、公安局。专业组成员有：郑祖武（组长）、王文俊（桥梁副组长）、章泰报（道路副组长）、那祥、冯先松、强十洲。配合单位代表有：容肇祖、李尚德、孔庆普、王德成（配合单位代表

只参加会议，不参加具体工作）。

1954年11月上旬，专业组提出三个《北海大桥交通改善工程方案》。

方案一：保留金鳌玉蝾桥、团城，拆除局部中南海北墙。在石桥的南面新建一座混凝土梁式桥，承担全部交通流量。

方案二：保留金鳌玉蝾桥、团城，拆除局部中南海北墙。在石桥的南面新建一座较窄的混凝土梁式桥，新旧桥共同承担（上下行）交通流量。

方案三：保留团城，金鳌玉蝾桥向南加宽，拆除较多中南海北墙，加宽团城南面道路。

1954年11月12日，规划局受张副市长委托，邀请专家学者开座谈会，征求《北海大桥交通改善工程方案》意见。座谈会由周永源主持，出席座谈会的专家有：茅以升、罗英、梁思成、单士元、俞同奎、容肇祖、陈孝开、陈占祥、曹安礼、陈明绍、林治远、仇方城、袁德曦、王文俊、赵冬日、朱兆雪等。

大家一致认为，第一方案最为理想。一部分同志提出，如果第一方案不能实现，第二方案也能满足近期交通发展的需要。对第三方案，大家一致认为不可取。

在讨论新桥的结构与形式时，梁思成提出“新桥的结构和形式应该与古桥一致，应该建一座仿古拱桥”。梁思成主要从美学方面阐述桥梁造型美和环境美。王文俊和罗英两位桥梁工程师提出“建新桥是为了交通通畅，同意方案中所定混凝土梁式桥”。茅以升见意见难以统一，遂提出，待方案确立以后，桥梁设计问题另行研讨。

1954年12月26日至1955年1月14日，实施文津街三座门、团城东三座门、大高殿木牌楼拆除工程，由建设局养工所综合技术工程队施工。

(1) 文津街三座门（原有三道，1950年1月拆除中间一道，还有两道）是由三个门楼组合而成一道门楼式建筑，故称“三座门”。中间的门楼稍大（门洞宽5.85米，高5.9米），门楼顶是歇山式，两个边门

楼（门洞宽5.15米，高5.15米）的楼顶是三坡式，楼顶的内侧对接于中门楼的门垛墙。门垛全是磨砖对缝刷红色的墙面，下部有白石须弥座。门洞的上部结构是密排方形过木，木门框的下端有青白石门墩石。三座门拆下来的琉璃瓦件送给故宫博物院，其余旧料全部运至朝外赦孤堂材料场。

(2) 团城东三座门，在北海公园南门外东侧，是两道建筑结构与形式完全相同的简易门楼式建筑。建于清代，民国年间为通行车辆，于中门楼两侧的红墙上增开两个方形门洞，形成五个门洞。两道三座门之间，北面是北海公园管理处的南门，南面是中南海的北墙（曾有一大门，已封堵，留有痕迹）。

拆下来的琉璃瓦件送给故宫博物院，其余旧料全部运至永定门外首蓿园材料场。

(3) 大高玄殿木牌楼位于大高殿门前左右，是两座三间四柱七楼式（有人称九楼式）无佞柱木牌楼，明间的额枋上有白石匾，两面刻字，东牌楼的东面刻“孔纁皇祚”，西面刻“先天明镜”。西牌楼的东面刻“弘佑天民”，西面刻“太极仙林”。

拆除之前，北京大学和民族学院打算接收牌楼的旧料，重建在校园里。于是商定，东牌楼归北京大学，西牌楼归民族学院。

施工作业格外仔细，牌楼的楼顶全是黄琉璃瓦件，无一损坏。望板和木椽均保完整。木檩是红松木料，木质尚好。斗拱是红松木，已成脆性，难保全部完整。六道枋是黄松木，木质尚好，但是两端的榫接严密，无法退出，不得不采取断榫拆除。四根立柱是铁力木，但是，锁口石以下是体积很大的石灰土，十分坚硬，立柱未能全部拔出，实在拔不出的立柱，不得不采取锯断拆除。北京大学和民族学院见此情况，都放弃接受牌楼旧料。

1955年春季过后，规划局勘测处派人持市政府介绍信，前去中央警卫局联系在北海大桥南侧中南海内进行勘探事宜。警卫局请示首长后答复，允许在桥南10米范

围内作业。

市人民政府无奈，于是请示政务院可否拆除团城。周恩来总理得知此事以后，于1955年5月的一天，亲自登上团城察看。

事后，据建设局局长许京骐说，总理在团城上说：“仪天殿（承光殿）是元代建筑，一定要保留，这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遗产，宁可多占去中南海一部分地方。”

随后，规划局勘测处派人持市政府介绍信去中南海联系在大桥南侧进行勘探作业事宜，中央警卫局请示首长后答复，允许在大桥以南25米范围内进行勘探。

金鳌玉蝾桥加宽工程设计，最后设定桥面全宽（原宽9.5米）34.3米。为加宽团城南面道路，因为中南海的北墙只允许拆除一小段，所以必须切去团城南面一部分。经文化部社会文化管理局同意，切去团城南面一小片。

1956年4月初，文津街至北池子北口道路改扩建工程全面正式开工。

（一）金鳌玉蝾桥加宽工程：该工程于1956年5月16日正式开工，1956年7月3日竣工。施工期间，正值复兴门拆除工程施工，大桥所需土方，取自复兴门拆除工程。金鳌玉蝾桥加宽后，桥面全宽34.3米，其中，车行道宽25.7米，南侧步道宽4.46米，北侧步道宽4.16米。

（二）团城切片工程：此项工程，道路二公司不敢承担，于是请单士元先生协

助，单士元先生欣然答应，并派故宫博物院瓦工班实施团城切片工程，道路二公司配合。将团城的南面切去月牙形一片，接茬处理十分细致，一年后，接茬已无明显痕迹。

（三）筒子河西北角后退工程：筒子河的西北角原是90度直角，此处正是一段道路弯道，为加大道路转弯半径，经故宫博物院同意，将筒子河西北角向里收缩，抹去直角，改成两个大于90度的角。具体做法是，拆卸西北角两边的一小段河岸石板，利用旧石板，在原有石板海墁上重新砌筑河岸挡墙，石墙后面浇注一道混凝土墙。从此筒子河的西北角成为“缺角”。

（四）大高玄殿南牌楼拆除工程：大高殿南牌楼位于大高玄殿南门对过，是一座三间四柱七楼式混凝土牌楼，四柱和六道横枋是整体混凝土结构，夹杆石和锁口石是青白石。楼顶是绿琉璃瓦件，所有木构件均为红松木。明间的额枋上有白石匾，两面刻字，北面刻“大德曰生”，南面刻“乾元资始”。

该工程由养工所综合技术工程队施工，拆下来的旧琉璃瓦件送给故宫博物院，木构件均为红松木料，已成脆性，运至后门桥养路道班。四根混凝土立柱的底部未拆除，埋于地下。

（五）习礼亭拆卸工程：两座习礼亭坐落在大高玄殿南门对过，其建筑形式类似紫禁城上的角楼。习礼亭拆卸工程，由

故宫博物院派技术人员指导拆卸，随拆随将拆下来的构件运至故宫博物院。

（六）鸳鸯桥改建工程：鸳鸯桥是并排跨西板桥明渠上的两座石桥，北桥是一座单孔石拱桥，位于北上西



景山前街西段道路改扩建工程施工情况

门外，南桥是一座闸桥合一的单孔石拱桥。北桥的北侧有燕翅墙，燕翅墙以外的驳岸向东弯曲，与明渠的石砌河岸相连。北桥的桥台前墙与南桥的桥台前墙之间，有一小段石砌河岸，南桥的南侧无燕翅墙，有一小段石砌河岸与筒子河的河岸相连。鸳鸯桥拆除后，将明渠改建成暗沟，并设暗闸。

（七）北上门拆除工程：北上门位于故宫神武门外，是一座歇山顶单檐门楼式建筑，门楼建在一个长方形台座上，台座的四周有青石台明。门楼面宽五间，进深二间，中三间是通道，门道的中间有明柱和门框，门框以上有门头隔板，下面有青白石门墩和木门槛，每间有两扇木板门，门钉朝北。两端各是一间屋，南面的下部是砖坎墙，上部是窗户，在门道间里开设屋门，皆有一对木板门，东屋和西屋二门相对，室内铺墁大方砖地面。中三间内铺砌青白石地面，南北两边台明外各有一段青石板坡道。

按照故宫博物院的要求，施工作业很仔细，除板瓦和筒瓦采用杉篙下溜外，其余瓦件均采用装土篮人工传递方法送到地面上，无一损坏。北坡泥被的下面有两层油毛毡防水层，毛毡上面有压毡木条，用的是“洋钉”。南坡泥被的下面有一层锡板防水层，用的是人工锻造的方形铁钉。所有木构件均系红松木料。

望、椽、檩及柁架均为红松木料，均有钻生痕迹，基本上无腐朽，木质韧性较好。墙壁均采用城砖砌筑，壁厚 50 厘米，东西山墙内各有 3 根暗木柱，均系黄松木料，柱径是 32 厘米，下面有青石立方体柱基石，上面是 38×38 厘米，高 66 厘米。中三间内有 6 根明柱和 6 根半明柱，柱径 45 厘米。下面是青白石上圆下方形柱基石，上面直径 47 厘米，底面是 65×65 厘米，上部高 9 厘米，全高 49 厘米。柱基石以下是整体石灰土。

室内地面是尺二大方砖，下面有石灰土。中三间内地面铺砌青白石石板，石板厚约 35 厘米，下面是石灰土。中三间内的

木柱和门头过木、顶隔板以及门框均为红松木料。门墩石是青白石料。台座四周有青石台明，石板厚 22 厘米，宽 65 厘米，石板下面有四层城砖，下面有石灰土。拆下来的旧料全部移交给故宫博物院。

（八）朝房拆除工程：朝房在北上门的两边，各有 54 间，全是陶瓦屋顶。每三间为一套房，前（北）面有廊，廊前有两根明柱，明间有屋门，有一对木板门，边间各有一个方形大窗户。室内和廊下铺墁大方砖地面，廊前有青石台明，明间前面有一块青石板台阶石。后（南面）檐墙的底部有一道外出台儿，上面有青石台明，后山墙距筒子河 1.6 米。朝房的东端和北上东门南边的红墙之间有一段砖墙相连，朝房的西端和北上西门南边的红墙之间有一夹道。

朝房拆除工程由建设局养工所综合技术工程队施工，事先商定，拆下来的旧瓦件全部调拨给房管局，其余旧料由建设局处理。施工期间，房管局派工人拆卸屋顶瓦件。

望、椽、檩及柁架均为红松木料，均有钻生痕迹，有轻微腐朽。墙壁均采用城砖砌筑，壁厚 50 厘米，后檐墙两端和每间隔断墙内各有一根暗木柱，东西山墙和所有隔断墙内北端各有一根暗木柱，所有暗柱均为黄松木料，柱径 32 厘米，下面有青石立方体柱基石。每三间廊前有 2 根明柱，是红松木料，柱径 45 厘米。下面有青白石上圆下方形柱基石，上面直径是 47 厘米，底面是 65×65 厘米，上部高 9 厘米，全高 49 厘米。柱基石以下是东西向一条整体石灰土。室内和廊前地面是大方砖，下面有石灰土。廊前有青石台明，石板厚 22 厘米，宽 65 厘米，下面有四层城砖，以下是石灰土。

拆下来的旧瓦件由房管局运走，其余旧料运至朝外赦孤堂材料场。

（作者为北京市市政工程局退休副总工程师）

# 探索建筑文化的力作

## ——《王世仁中国建筑史论选集》读后

晋 宏 逵

一个多月之前，王世仁先生送给我一部新出版的《当代中国建筑史家十书——王世仁中国建筑史论选集》（以下简称《选集》）。拜读几篇，发现虽是旧作，但大部分在本次出版时又作修订。于是下班之后，每晚捧读，陆陆续续读过了全书。虽然并非研读，仍感到收获颇丰。所以不揣暗昧，把这部书介绍给大家，相信致力于建筑史学和文物保护的同仁们都能从书中获得启发。

《选集》共收录王先生的31篇论文，其中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和之前的11篇，发表于90年代的6篇，进入21世纪以来的达14篇，这三个阶段论文的主题各有侧重。《选集》把它们编成四个版块，分别是：建筑历史专题、北京建筑钩沉、地域建筑文化和审美经验探索。我读后感觉，论文也可以从另一角度归纳为三类：第一类，对中国建筑文化的发掘，和对中国建筑审美和建筑美学的探索，这是《选集》中最具有理论研究色彩的一部分，我感到其中一些思想贯穿了整部《选集》，构成了王先生学术思想基础。第二类，对古代建筑、文物建筑直至历史街区、城市及其历史遗迹的研判、记录，对它们蕴含的价值进行解读。第三类是对应该加以保护的木结构建筑遗址、遗迹进行复原研究。

王先生关于建筑文化和建筑美学的论

文，最集中地发表于第一个阶段，论文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命题。《中国建筑文化的机体构成与运动》和《中华民族的智慧与传统建筑的生命》两篇论文讨论中国建筑文化，篇幅都不大，但是提纲挈领地建立了中国建筑文化的“模型”，初步论述了建筑文化运动的规律。他认为，如果把建筑作为一种文化机体来观察，建筑最外层是物质层面，是物化生产的直接体现；中间层面是“心物结合”的部分，是规定文化机体类型的权威力量。核心层面是心理机制或本质力量部分，它又包括两大部分，一是价值观、思维模式等直观的判断方式，二是审美经验和审美趣味。建筑文化的这三个层面，分别显示了建筑的时代性、社会性和民族性。研究、评介和推进建筑文化，要分别从建筑工程学、建筑社会学和建筑心理学三个领域着眼。而中国传统建筑，“其文化的构架是，以天人共构的宇宙观为纲目，以情理相依的伦理观为内容，以刚柔相济的审美观为形式，以工艺合一的创作观为方法。”（《中华民族的智慧与传统建筑的生命》）

王先生多篇关于建筑审美和建筑美学的论文，则很生动具体地阐明了上述建筑文化的三个层面，论证了他所提出的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构架。换言之，他对于建筑审美和建筑美学的论述，是他对建筑文

化认识的深化和具体化。《中国建筑的审美价值与功能要素》和《中国传统建筑审美三层次》是需要对照阅读的姐妹篇，如果说它们是抽象的理论论述的话，那么《理性与浪漫的交织——中国传统建筑美学基础刍议》则用中国传统建筑屋顶的形态、中国园林、中国的佛陀建筑和乾隆风格四个中国建筑特有的现象，“探索产生建筑民族形式的内在特征和它的美学基础，即民族审美心理在建筑中的表现形式”。作者提出“构成艺术形象的基本概念是程式与规格，即严密的等级制度和数学模式”；而在此理性精神的世界里，人们又对人性作进一步探索，发挥特定的浪漫情调，阐述特定的伦理解释。这就是情理相依，是理性与浪漫的交织。这篇论文像是王先生关于中国建筑审美的总论，其他论文更像是分论，一一深入探索《交织》一文提到的中国建筑特征和建筑现象所折射的建筑文化。《天然图画——中国古典园林的审美进化过程》以“中国园林事实上成了东西方古典建筑艺术共同的最后高峰”的判断出发，描述中国园林发展的历史。请注意，这里所论述并非是“造园史”，而是造园活动中审美思想的发展历史。在“圆明园和避暑山庄的意义”一节中，王先生说，“中国传统建筑包括造园艺术的审美内容，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环境气氛给人以意境感受，造型风格给人以形象知觉，象征涵义给人以联想认识。”两个园林在这三方面都得到充分发挥。在象征涵义方面，使美的形式体现出寰宇一统和对历史传统文化的全面继承。《承德外八庙的多民族建筑形式》、《佛国宇宙的空间模式》、《塔的人情味》等论文揭示了中国佛陀建筑的特殊形式和人性化的审美要素，读来引人入胜，饶有趣味。如他说，外八庙的总体布局“是在传统平面的基础上，立体轮廓发挥了上述藏族寺院的特征，即对主体建筑采用加大体量、提高基座的手法，尽量使其形象突出”。“都纲法式：汉、藏、蒙建筑手法相互融会，相得益彰，名为模

仿，实际上是创造出了新的建筑风格”。“曼荼罗：十字对称、中心突出的形象，用以表现宗教内容”。而且从建筑形态的描述进一步推演到，“佛、道、儒都有各自的说教，但是它们互相补充、吸收，尤其是通过建筑加以融会的这个现象，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

我们还看到，王先生在探索建筑美学的过程中，提出了“象征涵义是天人同构宇宙观的进一步深化，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所有建筑都包含有象征内容”（《中华民族的智慧与传统建筑的生命》）。这是关于中国传统建筑特征的一个非常重要和有创见的命题。因此他把“重视表现建筑的性格和象征涵义”列为中国古代建筑的艺术特征之一（《中国建筑艺术》）。对于众所周知的中国古代建筑运用模式制设计与建造的特点，王先生也赋予其人文的内容：“对数的和谐关系的追求，构成了中国人审美标准的一部分主要内容”。这些论断，给我们认识、理解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内容提供了新的角度与视野。

《建筑美学散论》，似乎对《选集》中这类论文作了一个小结。最具哲学意味的是，王先生认为，“建筑美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可能形成完整的科学理论”，说明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具有广阔的空间。

对历史建筑及其遗迹进行记录和解读的论文中，最早的一篇发表于1963年，后来被刘敦桢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引用，可见其重要性。《明堂形制初探》和《北魏平城明堂形制考略》两篇讨论明堂形制的论文，应该是王先生开始于1963年的对长安大土门遗址复原研究的延续，和在新资料发现之后的进一步扩展，其中对“十字对称、中心突出”的特殊建筑形式的象征涵义作了充分的发挥。论文内容更多地集中于北京的题材，梳理了北京建筑文化的源流，通过实例勾勒了其特色。王先生主张，“我们不可能阻挡城市更新的步伐，与其扼腕叹息，不如去做一些实

际的调查记录，尽可能多留下一些历史的信息，不至于让这座古都失去记忆”（《遗痕七纪志皇都——北京市原东城区文化史迹综述》）。在他笔下，北京城市历史文化的特征是皇都文化。

在《雪泥鸿爪话宣南——北京市原宣武区文化史迹综述》、《遗痕七纪志皇都》和《北京近代城市的发展变化》三篇论文中，王先生论证了北京历史文化的源流。其源头在燕、蓟；而蓟的范围，则在今天“北至宣武门、和平门一线，南至南横街一线，西至广安门外护城河偏西，东至虎坊桥一带”。自周、汉以降，至唐、辽、金，这一地段是一个地方中心，今天的白纸坊桥成为唐、辽、金三代重要门户的标志。从元大都城开始到明清北京城，北京城市文化的特征就是皇都文化。从清代末期开始的皇室洋风建筑、国门被迫打开之后东交民巷的国中之国开始，北京城市功能发生巨变，直至走向现代化。这是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论文系统描述了作为文化载体的建筑及其遗迹的各组成部分，评估了它们的价值。

关于城市形态。《北京古城中轴线述略》认为，中轴线的文化价值包括政治价值、伦理价值、美学价值三方面。记录了盛清时期北京中轴线的主要界面建筑14处，其中永定门、天桥、正阳桥及牌楼、棋盘街、南皇城、雁翅楼及地安门的历史建筑已经不存在（永定门、正阳门牌楼近年已经复建）。《宣南龙脉述略》关注正阳门以南西侧的一片斜街，认为它们可能源于隋唐，正式形成于元代，是一片有着特别的和非常重要的历史地理信息的街巷。

关于北京城的历史建筑及其遗迹。《遗痕七纪志皇都》和《雪泥鸿爪话宣南》两篇将它们分为十一大类作了综述。即：一，城垣形制；二，皇城；三，宫殿；四，坛庙祠堂；五，衙署学校；六，宗教庙宇；七，府邸宅院；八，会馆；九，市井建筑；十，近代建筑；十一，现代标志。每一类都选择若干重点建筑及其遗迹进行介绍和点评。

坛庙是古代中国特有的进行祭祀活动的场所。北京的坛庙既为皇家专有、又是国家礼制活动的场所，是古代文化的载体。《明清北京十七坛述略》专论了北京祭坛的沿革、布局、形制与建筑，记录了它们的历史与现状。北京作为明清的都城，要接待来自外国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使臣，会同馆就是这种国家礼宾馆，也是皇都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明清会同馆考略》考证了明清两代多处会同馆建筑的沿革和地理位置，把建置几经变化而今天已无遗迹的原址标注在现代地图上。会馆是北京明清时期大量出现的民间建筑，集中存在于原崇文区和宣武区。戏楼或戏场是会馆中最有特色的建筑类型。《北京会馆与戏场杂考》考证了会馆与戏场的起源和发展。在建筑形制上，将会馆分为祠庙型、礼仪型和居住型三类。清代戏场则一直存在两种形制，一是由戏楼和周围房屋围合的形式，二是室内戏场，皇家和民间均是如此。在这类文章中，王先生特别善于应用历史地理学的工作方法，把历史地图和文献记载进行比较，最终确认那些如雪泥鸿爪般散布在京城遗迹点，标上今天的地图，复原它们的历史空间。

天宁寺塔创建于辽代，是北京市著名古迹，历史文献著录颇丰。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先生也专门做过调查，写过文章。1991年北京市文物局对这座辽代古塔进行了维修，发现一块小石碑，彻底解决了塔的建筑年代等相关问题。《北京天宁寺塔三题》是在这个基础上写成的。第一题考证塔与寺的历史，纠正了历史记载的误传。第二题讨论塔的造型的文化意义和艺术法则。第三题研究塔的宗教意义，认为天宁寺塔应该定名为“华藏密檐塔”。从这篇文章可以欣赏到作为建筑学家的王先生所拥有的深厚文史学功力。

《清朝江宁织造署、局与〈红楼梦〉贾府原型关系》一文虽然讨论的是原江宁、今南京的建筑遗址，但是因为与《红楼梦》中描述的贾府有关，因此也与北京的王府

建筑产生了联系。尤其重要的是王先生在讨论织造府建筑时发现，康熙时期的建筑空间格局与建筑形式表现出“北方特点”，与同治四年（1865年）以后重建的建筑有明显的区别。他推断，“以永乐时期兴建的北京宫廷建筑为主要代表，又延续而成为清代的北方官式建筑式样，其实是自明代初年（14世纪中）在江淮及江南一带形成的，其中由官方规定成为‘则例’的，正是这些地方建筑的通用法则”。无论这个看法是否为“首发”，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

将《北京房山金陵几处遗址原状推测》、《北京清代恭王府正殿原状推测》、《北京正阳桥及牌楼述略》和《房山大南峪别墅初勘记》等四篇文章归纳为一个类别，是因为它们都对历史上曾经完整、而今天仅余遗址或遗迹的古迹的原状进行了科学的推测。与对明堂的复原推测不同，这些文章的复原对象都是标准化、制度化的木结构建筑。

有趣的是，王先生把复原推测的原则和方法表达得极为简单直接：“简而言之就是有根有据”。根就是遗存，要注意排除假象干扰。据就是旁证。但这只是“会家不难”之语，其实复原是一种艰苦的研究工作，有着严谨的程序和科学的方法。以恭王府正殿为例，它遭火毁于20世纪20年代。复建前只存在“轮廓不清的台基残址”和考古学得到的数据。复原第一步进行了详尽的历史学研究，重点是清代官员府邸与王府制度的研究和建筑物主人的经历，从而对建筑遗存的性质与历史年代进行准确判断。第二步，根据清代官式建筑的标准尺度，对照遗址与考古报告，对正殿各部位尺寸关系做出权衡，选定标准。第三步，对建筑式样进行推测，包括屋顶、墙身、装修、栏杆等细节。最后根据推测绘制建筑图，表现建筑物的艺术与空间形象。

我国是文化传统不曾中断、连绵发展的文明古国，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了

不可移动文物点达76万6千余处，相当数量的遗址记录了历史曾经的辉煌。《文物保护法》总体上不支持对建筑遗址进行复建。但是从学术角度进行复原推测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王先生认为，首先是“展示”的价值，让人们直观了解建筑的形制结构。其次是“建筑史”的价值，尤其是对于存世甚少、有一定法式制度的元代以前的木结构建筑，更是如此。再次是“历史学”的价值，对于借以了解当时的礼制制度、建筑规制，都是重要的形象例证，连接了一部分缺失的历史链环。最后是“文化学”的意义，通过复原推测的过程了解当时的设计理念和美学倾向。所以复原推测的结果虽然只是给历史建筑的真实原貌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但它是严谨、科学的研究工作。王先生的研究，具有示范作用。

最后，我建议读者关注王先生为《选集》撰写的《前记》。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建筑史学的基本属性是社会人文科学。但是几十年来，这一性质还远没有形成学界共识，在学科建设上也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这位年届八秩的老学者通过自己的学术实践，始终不渝地开掘古建筑的社会文化意义，企盼自己的认识得到共鸣。“嚶其鸣矣，求其友声”，令人动容。

王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调到北京市文物局，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了5年。从那时起至今，我对他非常尊重，始终师事之。90年代最后5年，我们又在国家文物局领导下，与几位国内外学者一起合作编写《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他是实际的执笔者。《选集》中21世纪以来的论文达14篇，正表现了他在建筑文化方面不懈的探索，和令人钦佩的、旺盛的学术创作精力。我祝愿他学术之树常青，并以此不文的读后，回应他对于建筑史学科的主张。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



# 首都博物馆文物保存环境监控简述

● 何海平

中国是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拥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考古发掘和传世保存下来的文物品种多，数量大，其中大部分都保存在博物馆内。2002年至2005年，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中国文物研究所）组织开展了全国馆藏文物腐蚀损失调查，主要调查馆藏文物的损害情况以及产生损害的原因。经专家组调研和统计分析得出结论，全国共有50.66%的馆藏文物存在不同程度的腐蚀损害，大部分都是因为保存环境差，如不采取有效措施，有可能造成重大损失。正因为如此，近几年文物预防性保护被专家们经常提起。文物预防性保护的概念最早是在1930年罗马的国际文物保护会议上提出的，当时主要是指对文物保存环境的控制，尤其是对温湿度环境的控制。如今文物预防性保护概念已经发展到了领导的宏观决策、经费的长期投入、博物馆的选址、博物馆材料的选择、博物馆库房、展厅缓冲间的设置，以及对具体文物所采取的整体环境、保存展示小环境的恒温、恒湿照明、防空气污染、防虫害等多方面，甚至还涉及到考古现场文物的提取技术、工具、运输、包装、安全保卫设施、对自然灾害的预防等方面，作为文物保存、展示的场所，博物馆的环境对于馆藏文物的保存是决定性的因素，对文物寿命的影响很大。馆藏文物环境总体来说主要分为温湿度、光线、噪声、空气质量、微生物等方面。对博物馆文物来说，文物的预防性保护就是对博物馆文物所处的环境进行监控，确保文物处于合适的环境中，从而延缓其老化腐蚀的速度。因此，博物馆文物保存环境的监控非常重要。

## 一、国内外文物保存环境监控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外对文物保存环境的研究比较多,尤其对温湿度环境研究得较深入。在博物馆环境中,温湿度变化是最大的,也是对文物材质的老化起重要作用的。这主要是因为文物是由材料构成的,而材料都是由分子、原子按一定规律排列而成的,这些分子、原子在温湿度不适合或变化较快的环境里,会打破原来的排列规律,使材料老化变质。现在很多博物馆都意识到了温湿度环境对馆藏文物的重要性,采取了相应的温湿度监控措施。上海博物馆吴来明等为全面了解武汉博物馆的文物保存环境现状,科学评价该馆文物库房环境达标试点工程的成效,总结实践经验,服务我国馆藏文物保存环境改善工作,采用相关检测设施和仪器分析手段,针对该馆改造的新文物库房、未改造老库房、文物储藏柜、包装囊盒、陈列展厅、文物展柜内的环境质量,检测了其中的温度、相对湿度、甲醛浓度、板材的木材含水率、可见光照度以及紫外辐照强度等指标,并对环境中的酸性气体和VOC浓度进行了采样分析。检测研究表明,武汉博物馆达标改造工程对库房温湿度和光照水平的控制成效明显,基本达到了文物保护要求;增添使用的文物储藏柜、包装囊盒、活性炭吸附材料等具有一定的微环境调控效果。<sup>①</sup>由于装饰材料和橱柜材料等散发污染物的影响、恒温恒湿系统的间歇式运转模式、部分老库房和展厅采用无防护自然采光设计等原因,现文物保存环境中还存在主要污染气体浓度普遍偏高、相对湿度呈现短周期性波动、局部光照水平偏高等情况。这是一个博物馆环境监测技术在博物馆应用的例证,至少说明了博物馆环境对文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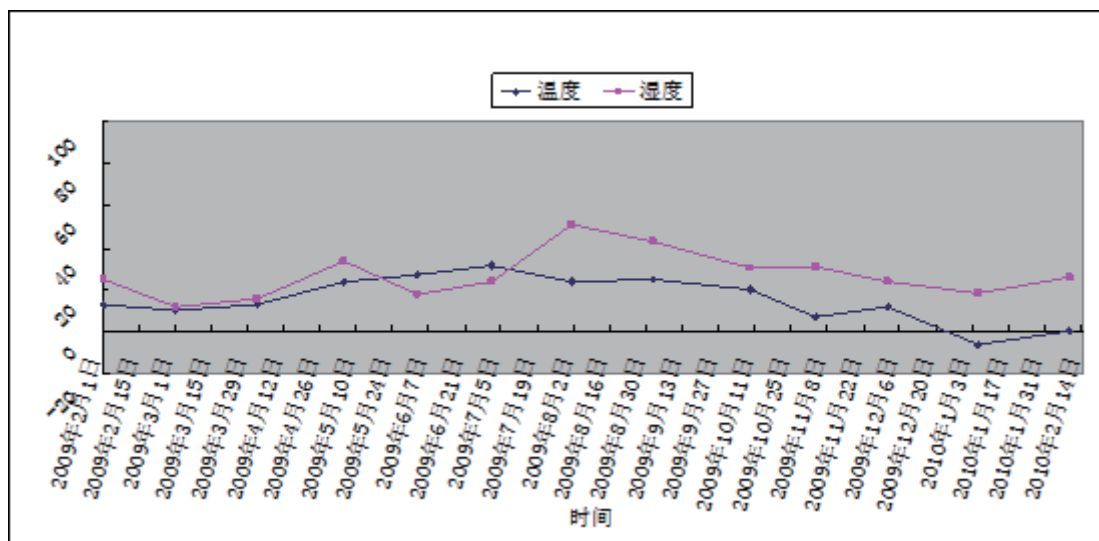
国外对于博物馆大气环境的研究相对较早,从1850年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观测到烟尘和气态污染物对伦敦国家博物馆中的油画产生不良影响开始,欧美等国家针对博物馆室内大气环境对文物的影响的研究陆续展开,结果表明,大气颗粒物、SO<sub>2</sub>和NO<sub>x</sub>等污染物对文物均有不良影响。<sup>②③</sup>空气质量检测过程中,目前国外采用悬挂试样检测法较多,这种方法是将一种特殊试剂悬挂在博物馆或库房等馆藏文物存放环境中,通过博物馆内有害气体与试剂反应产生颜色、质量等的变化而测量出有害气体的含量。<sup>④</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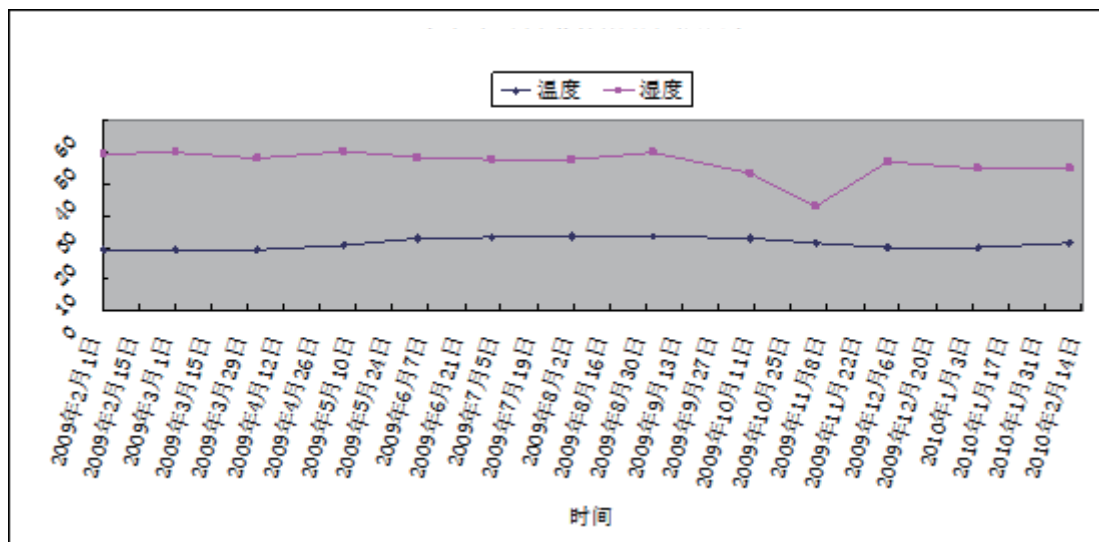
在国内,文物保存和展出环境的空气质量的 研究也受到关注。张月玲等对国家博物馆的环境空气质量进行监测,并指出需要重视各种氧化性污染物、酸性污染物的监测和控制,提出创造陈列室、藏品库乃至藏品箱、柜内的最佳小环境是治理改善博物馆环境的有效手段。<sup>⑤</sup>陈元生等对重庆市、广东省和上海市三家博物馆的空气中污染物进行监测,提出了中国博物馆文物保存环境质量分级标准。该标准建议,文物保存环境中氮氧化物浓度一级标准5μg/m<sup>3</sup>,二级标准10μg/m<sup>3</sup>,三级标准20μg/m<sup>3</sup>。<sup>⑥</sup>研究表明,氮氧化物可形成酸性物质,产生臭氧,也可能催化二氧化硫的转化,从而引起纸质文物的酸化,加快染料褪色,加速纸张、纺织品等有机质文物的老化,加速石质文物的风化,金属质地文物的腐蚀也会加速。<sup>⑦</sup>吴燕等人围绕竹碳对低浓度氮氧化物的净化效果展开研究,以备进一步开发适于文物保存环境空气净化设备。<sup>⑧</sup>李华等人对秦兵马俑博物馆陶器库房冬季室内空气质量进行监测,采集了大气悬浮颗粒PM<sub>2.5</sub>和NH<sub>3</sub>的浓度,实时监测了SO<sub>2</sub>和NO<sub>x</sub>的浓度变化,分析了污染物的组成、影响因素和变化规律,为文物保存环境的监控提供基础数据。<sup>⑨</sup>

## 二、首都博物馆文物保存环境监控现状

首都博物馆藏有文物十几万件,很多



图一 2009年2月至2010年2月首都博物馆室外温湿度曲线图



图二 2009年2月至2010年2月首都博物馆方厅三层文物精品展厅温湿度曲线图

都是精品，对保存环境的要求也较高。自从2005年底新馆开放后，首博成立了环境监测组，主要检测文物环境，将文物环境数据报告给物业部，让物业部根据数据调整环境控制设备，确保文物处于合适的环境。根据文物保护的要求，首博现在检测的环境指标有温湿度、光线、可吸入颗粒物、甲醛、苯、甲苯、二甲苯、氨气、臭氧、硫化氢、二氧化硫、一氧化氮、二氧化氮等。目前采用的环境监测方法主要有五种：

1. 采用人工检测的方式，由工作人员带上检测表去库房及展厅等文物保存的地方进行检测，这种方法比较费时费力，且人工进行操作误差较大；
2. 通过放置在库房或展柜内的温湿度表进行检测，工作人员只要去抄录表的数值，这种方法也比较费时费力；
3. 采用自动记录表，可以存储几万甚至几十万组数据，并能够进行简单的数据分析，但是在下载数据时必须将检测表拿出来操作，影响记录的连续性；
4. 采用数据线连接环境检测传感器，通过数据线将环境信息传输到办公室，这种方法需要布线，施工复杂；
5. 采用无线监测系统，采用无线电技术将库房及展厅的环境数据直接传送到办公室，不需要去现场检测，既节省了人力，又能实时记录全部数据。

检测方法中，第五种方法无疑是最好的，因为既没有复杂的工程，又不需要操作人员去现场操作，建设成本比前三种方法贵，比第四种方法便宜。这五种监测方法在首都博物馆都有应用，且各种不同的环境指标检测方法也不相同。在首都博物馆，环境监测指标最成熟的就是温湿度监测，以上的五种检测方法都有应用。从2005年底开始对首都博物馆温湿度进行检测，对首都博物馆室外、库房、展厅以及文物展柜内的温湿度变化规律都有较深刻的认识。

图一为2009年2月至2010年2月首都博物馆室外温湿度曲线图。从图一可以看出，室外温湿度变化较大，根据季节变化而变化。其中温度日变化幅度在10℃左右，根据季节的变化而变化，冬天最低温

度能到零下，夏天最高温度能到40℃。而相对湿度的变化更加剧烈，且与季节和天气有关。图二为2009年2月至2010年2月方厅三层温湿度曲线图。从图二可以看出，方厅三层温度在20℃左右，比较稳定，相对湿度在50%左右，总体也比较稳定，只是在十月底到十一月初有一个明显的下降过程，到十一月中旬又恢复到正常水平。从图一和图二比较说明，博物馆内的温湿度环境比室外要稳定得多，基本适合文物的保存。

首都博物馆文物保存环境控制主要依靠中央空调系统和恒温恒湿系统，其原理都是依靠机器生产出符合要求的空气，充入库房、展厅及展柜中，确保文物处于合适的环境中。一般中央空调系统和恒温恒湿系统除了控制温湿度外，还带有空气净化设备，可以提高空气质量。库房及展厅等大空间的环境主要依靠中央空调系统控制，展柜内的环境主要依靠恒温恒湿系统。其中恒温恒湿系统的设备有大有小，但都比中央空调机组要小。大的设备就是一个缩小版的中央空调机组，能精确控制展柜内的温度和相对湿度，功率较大；小的设备体积只有0.05立方米左右，功率较小，可以放在展柜下面，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如圆厅二层和圆厅三层里面的墙柜都是采用恒温恒湿机组，这是因为墙柜空间大，需要恒温恒湿设备的功率也大，小设备无法满足要求，且墙柜底下没有空间存放设备，只能采用恒温恒湿系统。对于独立展柜，毕竟展柜内空间有限，需要的功率也不大，一般采用小型恒温恒湿设备就可以保证展柜内温度和相对湿度。2009年首都博物馆举办考古展时就使用了恒温恒湿的独立展柜。当时从新疆借展的干尸需要温度在20℃-24℃，相对湿度在35%以下，与其他文物的差别很大。而当时展览时间是七、八月份，北京气温高、相对湿度大，很难满足要求。正是采用这种小空间的恒温恒湿独立展柜，使文物处于合适环境，才能保证文物的安全。

### 三、首都博物馆文物保存环境监控研究工作

首都博物馆自从搬入新馆以来,不但重视文物的保存环境监控,而且重视文物保存环境监控方面的研究工作。在2009年申报了北京市科委“馆藏文物保存环境监控关键技术研究”课题并获得资助,该课题目的是对馆藏文物环境进行研究,探讨影响馆藏文物的环境因素,研制出适合于博物馆使用的监测设备并将其应用于馆藏文物的环境监测,并根据首都博物馆和其他博物馆的监测结果,建立北京地区馆藏文物环境标准。该课题于2011年结题,研制出了一套博物馆环境监测方法,主要检测温湿度、甲醛、可吸入颗粒物、苯、甲苯、二甲苯、氨气、Tvoc、二氧化硫、一氧化氮、二氧化氮、硫化氢、臭氧、微生物等。其关键技术是对文物影响较大而浓度较小的二氧化硫、一氧化氮、二氧化氮、硫化氢等气体的检测进行了研究,这些气体浓度在10ppb的数量级,一般的仪器很难检测到。本研究采用进口灵敏度高的传感器,经过自行组装,形成了一套监测方法。这些检测方法应用到首都博物馆空气检测实践中,简单方便,准确度高,获得了专家的一致好评。2011年申报了北京市科委“馆藏文物温湿度环境控制关键技术研究”课题并获得资助,该课题旨在研究展柜内温湿度控制方法,采用半导体温差技术和无线监控技术,在办公室就可以监控展厅内展柜的温湿度,使展柜内达到恒温恒湿的效果,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为文物提供良好的环境。本课题的创新点主要在温度控制方面,小型设备温度控制比较难,采用半导体温差技术来调节展柜的温度,取得了较好效果。目前已经完成了研究工作,研制出了一套恒温恒湿设备,能精确监控展柜内的温湿度。

总之,在北京市文物局的领导下,在馆领导的支持下,首都博物馆文物保存环

境得到了改善,基本保证文物都处于合适的环境下。另外,关于文物保存环境监控技术的研究也一直在进行,研制出了一套硫化物、氮化物等酸性气体的监测方法和温湿度监控设备,为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做出了一定贡献。

① 徐方圆、吴来明、解玉林:《武汉博物馆文物保存环境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7年第1期。

② 斯蒂芬·哈克尼,汪建南:《博物馆内气态污染物的分布》,《中国博物馆》1987年第3期。

③ CAMUFFO D., GRIEKEN R. V., BUSSE H. -J., et a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 Four European Museums”,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Volume35, 2001.

④ L. T. Gibson, B. G. Cooksey, D. Littlejohn, N. H. Tennent, “A Diffusion Tube Sampler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Acetic Acid and Formic Acid Vapours in Museum Cabinets”, *Analytica Chimica Acta*, Volume341, 1997.

⑤ 张月玲:《中国国家博物馆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报告》,《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6年第2期。

⑥ 陈元生、解玉林:《博物馆文物保存环境质量标准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2年增刊。

⑦ Leendertse J. J., Alexander R. C., Liu S. K., “A Three Dimensional Model for Estuaries and Coastal Seas”, *Rand Corp. R-1417- OWRP*, Volume 1, 1973.

⑧ 吴燕、修光利、王大为等:《竹炭净化文物保存微环境空气低浓度氮氧化物》,《环境科学与管理》2009年第1期。

⑨ 李华、曹军骥、杨雅媚等:《秦兵马俑博物馆陶器库房冬季室内空气质量初步研究》,《中国粉体技术》2009年第2期。

(作者为首都博物馆馆员)

# 北京市文物局 2013 年二季度文博事业

## 大事记

4月3日 组织召开大运河申遗专题会议，向运河沿线有关区县传达大运河保护和申遗省部际会商领导小组办公室会议精神，部署下一步运河保护申遗相关工作。

4月9日 和市旅游委联合向各区县文委、旅游局、文物单位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旅游等开发建设中文物保护工作的意见》的工作方案，并要求各单位按照方案部署，狠抓工作落实。

4月16日 舒小峰局长与市宗教局赵宏生副局长共同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南堂、西什库教堂等宗教部门管理使用的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情况，特别对北京西什库教堂若瑟修女会房屋修缮工程方案进行了深入研究。

4月17日 国家文物局童明康副局长一行现场考察了房山区云居寺文物保护、文物安全、文物展示、南塔复建等工作并听取了市文物局、房山区政府和云居寺文物管理处的工作汇报。

4月19日 召开思想政治工作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部署2013年度思想政治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局属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组工干部、纪检干部及机关副处级以上干部110余人参加会议。局党组书记、局长舒小峰同志就做好2013年思想政治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提出六方面具体要求，三家基层单位从不同角度交流了党建工作经验。

与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北京市商务委员会联合召开拍卖监管联席会例会。

会议通报了2011—2012年度文物拍卖企业年审情况及《国家文物局、公安部、海关总署、国家工商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经营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并就外资拍卖企业的监督管理、网络拍卖的监督管理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4月21日—30日 组织首都博物馆、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大觉寺管理处、古代钱币展览馆、石刻艺术博物馆、文博交流馆以及北京古玩城7家单位参加“2013京台文化创意产业展”，展出了具有代表性的文博创意衍生产品。

4月24日 舒小峰局长前往西城区调研文物保护工作，与西城区政府就当前西城区文物腾退、文物修缮及名城保护等工作中面临的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

4月25日 召开机关“双示范”创建活动推进会，听取机关支部负责人介绍本支部创建活动开展情况，田淑芳副巡视员对各支部创建活动逐一进行了点评，并对下一步创建工作提出要求。

4月26日 组织召开“北京名人故居保护与管理”课题启动会，会议研究确定了课题的调研范围、撰写思路、各阶段完成时间。

与市规划、水务、环保、市政、建设、交通等相关主管部门及有关区县共同召开工作会议，就落实国家文物局关于迎检工作的要求及大运河北京段申遗点、段的保护、环境整治、水质管理、工程管理等进行了认真研究。

4月27日 组织召开房山区唐幽州节

度使刘济墓专家研讨会，邀请安家瑶、董新林、齐心、赵福生、韩扬等文物及考古专家实地考察了发掘现场，专家一致认为唐幽州节度使刘济墓具有非常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对云居寺申遗也具有很高的价值，应该予以妥善保护。

组织召开“文物保护单位的利用与管理”课题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对课题的调研内容、框架、进度安排、各单位承担的任务进行了讨论。

国家文物局董明康副局长一行检查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云居寺的文物保护和安全情况。

**4月28日** 对我市6处世界文化遗产的安全设施、安全制度、防范措施、应急预案等进行了全面检查，制发了《检查记录》单，要求各遗产保护单位务必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安全制度，确保世界文化遗产安全，万无一失。

**5月3日** 向各区县文委、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管理使用单位、局属各单位印发了《打基础、除隐患、创平安百日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在全市文物系统集中开展“打基础、除隐患、创平安百日专项行动”。

**5月8日** 市政协文史委组织市政协委员40余人视察了北京大学红楼、历代帝王庙、李大钊故居及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4处文物保护单位，听取了各单位关于保护利用工作情况的汇报。

**5月10日** 向各区县文化委员会印发《关于配合公安机关做好文物安全防范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文物主管部门会同各级公安机关开展文物安全防范工作和联合检查。

**5月17日** 在中国科技馆举办主题为“博物馆（记忆+创造力）=社会变革”的“5·18国际博物馆日”主会场启动仪式。此次活动以实现强国富民的“中国梦”为重点，推出了8家名人故居纪念馆的“20世纪文化名人的‘中国梦’”巡展等一系列主题展览和活动，继续举办“我看博物

馆——博物馆摄影大赛”、“博物馆系列文化讲座”及文物鉴定等公益性系列文化活动。

**5月17日—20日** 组织首都博物馆参加“第九届中国（深圳）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北京展馆的相关工作，重点展出了凤首扁壶系列产品、老北京老行当系列产品等文化创意产品。

**5月19日—25日** 组织大钟寺古钟博物馆“触摸钟铃，体味文化——大钟寺钟铃互动展”、石刻艺术博物馆“石刻传拓”、古代钱币展览馆“民俗钱拓片动手项目”和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鼎天高地’科普之旅”参与北京科技周主会场活动。

**5月24日** 与房山区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协商如何妥善处理建设项目与文物保护的关系、原址保护唐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墓等工作事宜，对在原址建设博物馆的可行性达成了初步共识。

**5月27日** 舒小峰局长与东城区朴学东常务副区长召开专题会议，研究东城区在中心城区棚户区改造中涉及的文物保护事宜。

召开局系统青年干部援藏工作动员会，会议传达了市第七批援藏、援青工作会议精神，对我局六批援藏干部的工作情况及取得的成绩作了介绍，同时对本批援藏干部选拔原则、选拔条件及福利待遇作了说明。

**5月30日** 舒小峰局长到通州区调研文物保护工作，了解了通州区文物及历史文化保护区专项资金项目实施情况、存在困难和问题等。舒小峰局长还视察了文化遗产日活动主会场，同时与通州区政府共同商议部署了7、8月份大运河国际专家考察申遗迎检工作。

**5月30日—31日** 在大觉寺举办文物安全与执法工作培训班，全市各区县、特区办事处文物安全与执法人员共计70余人参加了此次业务培训。

**5月份** 完成国家文物局2013年度文物保护领域科学和技术研究一般课题的初

审工作，共初审通过课题 80 项，其中局系统课题 3 项。

**6 月 1 日** 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一行调研门头沟区古村落保护工作，调研组实地考察了爨底下、灵水村等古村落，对我市古村落保护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并提出了改进意见和建议。

**6 月 3 日** 与大兴区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共同商议配合做好第二机场建设用地内地上、地下文物保护工作，研究加强大兴区团河行宫等大遗址保护事宜。

**6 月 5 日** 在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举办“北京市文物鉴定专业人才进修班”，全市文博系统 80 余名专业人员参加了进修班，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舒小峰，市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孔繁峙，市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于平出席开班仪式并作重要讲话。

**6 月 8 日** 在通州区大运河森林公园漕运码头举办“2013 年文化遗产日宣传主题活动”，启动了“骑行京杭大运河”活动，大运河遗产保护志愿者沿京杭大运河进行千里骑行，宣传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工作。

**6 月 18 日** 国家文物局宋新潮副局长、段勇司长及王莉副巡视员调研我市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市文物局舒小峰局长、郝东晨、刘超英副局长陪同调研。

召开 2013 年北京市文物艺术品交易产业发展座谈会，嘉德、翰海、保利等 13 家文物拍卖企业负责人就各自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实际困难等问题作了发言。

**6 月 19 日** 在大觉寺举办 2013 年北京市文物局外事外宣专项培训会。邀请市相关部门的专家分别对新闻宣传、政务微博运行及外事赴台申报、管理工作进行了培训。

**6 月 22 日** 与房山区委、区政府联合北京电视台对唐代幽州节度使刘济墓考古发掘进行现场直播，向观众全方位呈现了考古现场、文物保护、科学研究等成果和北京市悠久的历史文脉。

**6 月 25 日** 市文物局舒小峰局长等前往延庆县调研，实地考察了新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京张铁路南口至八达岭段及下阪泉、大营烽火台等不可移动文物。

**6 月 28 日** 为配合北京市中心城区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起草《关于不可移动文物列入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工作的指导意见》，通过局长办公会审议并进行网上公示。

召开“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 92 周年暨‘我的梦·中国梦’宣讲大会”，局系统 200 余名党员参加。局党组书记、局长舒小峰作了重要讲话；参会全体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文博宣讲团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宣讲团的 11 名宣讲员从不角度进行了“我的梦·中国梦”主题宣讲。

**6 月份** 在局系统开展安全保卫工作“应知应会”素质培训活动，使全体员工熟悉和掌握安全保卫技能，进一步提高综合安全素质。

向国家文物局上报《北京市开展文物拍卖专业人员聘用试点工作总结》。据统计，北京市现有取得《文物拍卖企业专业人员资格证书》人员 131 人，其中通过三门考试的有 23 人，通过两门考试的有 23 人；具有文物拍卖企业专业人员陶瓷资格证书的 81 人、文物拍卖企业专业人员玉石资格证书的 68 人、文物拍卖企业专业人员金属资格证书的 50 人。

确定第八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的主展场“文物及博物馆相关文化创意产品展馆”及分会场的活动方案，并报送市贸促会。

**二季度** 拆除白塔寺西路违法建筑，完成白塔寺西路腾退、移交中国佛教协会的前期准备工作。

完成对全市 82 场拍卖会 58324 件（套）标的的依法审鉴工作，确定国家一级珍贵文物 1 件，撤拍文物标的 86 件。

完成 2013 年第一季度北京文物拍卖市



## 资料信息

场报告，并开展 2013 年度文物拍卖数据录入工作。

梳理、修改完成《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草案）》，报送市法制办。

组织开展“北京市文物局 2012 年度学术论文评比”工作，共有来自 18 家单位的 61 篇论文参加了此次评比。经过 10 位专家的两轮评审，共 15 篇论文获奖，其中：一等奖 1 篇，二等奖 3 篇，三等奖 5 篇，鼓励奖 6 篇。

组织开展“我的梦·中国梦”学习征

文活动，举办机关党员干部理论学习大讲堂，组织机关党员干部收看学习辅导报告录像，学习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党章测试答题等一系列活动。

组织局机关 45 岁以下青年参加市直机关第一届青年技能大赛，其中，1 人获得公文写作竞赛二等奖，21 人获得公文写作竞赛优秀奖。

按照市直机关工会要求，对 129 名原有会员信息进行核对，对 14 名新调入人员的信息进行了补充录入。

2013 年第二季度市文物局属博物馆参观人数统计表

名称	入馆总人数	购票人数	免票人数	学生	老人
首都博物馆	223366	0	223366	32844	27557
大觉寺管理处	93553	61229	32324	3036	9839
正阳门管理处	118113	114111	4002	513	959
徐悲鸿纪念馆	0	0	0	0	0
北京文博交流馆	0	0	0	0	0
北京辽金城垣遗址博物馆	9296	0	9296	2934	2609
北京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	18699	0	18699	4919	2794
北京艺术博物馆	9768	5332	4436	2375	1016
团城演武厅管理处	3972	0	3972	629	1600
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	0	0	0	0	0
大钟寺古钟博物馆	0	0	0	0	0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	9150	2057	7093	3961	1438
白塔寺管理处	6504	2265	4239	119	1347
老舍纪念馆	9363	0	9363	3910	2082
北京市古代钱币展览馆	18122	14965	3157	362	2795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3097	1832	1265	454	932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	172220	153692	18528	27108	8573

注：部分博物馆闭馆，故参观人数为 0。

## 启事

各位读者、作者：

自 2013 年 5 月 1 日起，我编辑部已开始启用新的投稿邮箱：bjwb1995@126.com，原有雅虎邮箱停止使用。

《北京文博》编辑部